民國叢書

第四編

・79・

歷史・地理類

太平天國史綱　羅爾綱著

太平天國史叢考　羅爾綱編著

太平天國史事論叢　謝興堯著

太平天國的社會政治思想　謝興堯編

太平天國革命思潮　彭澤益著

上海書店

太平天國史綱

羅爾綱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版

(94112·2)

太平天國史綱一册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者 羅爾綱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本書校對者章德宜)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影印

湯序

每每翻閱一部西文的世界史，我們很難看到中國史在全書中佔到一個相當的地位，總是五六百頁的書中祇有五六頁或十頁，或是一萬頁的叢書中祇有二三十頁講到中國的過去。這種缺陷，僅有兩種解釋：一種是中國的文化在他們西洋人治世界史的眼光裏沒有地位，他們有成見看不起中國的文化，竟將史家的責任放棄而抹殺中國的歷史。一種是他們不懂中國的歷史，無從寫中國的歷史。

我們姑不論一般西洋史家的通病，但問中國史學界的自身如何？敘述中國歷史的書籍在那裏？二十五史是否算是歷史？從今我們有沒有中國史可讀？

歷史是隨着時代的進步，常常需要改造，各時代需要適合各時代的歷史。二十五史不但數量的浩大，不是人人可得而讀的歷史，那些帝王的本紀、英雄的傳記、和名臣的記載，總之歷史的內容和著者的眼光，與現在我們所要敘述文化的進步、經濟的變動、社會的變遷等等的歷史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以往的歷史是以帝王朝代為連繫，目的祇在紀載與帝王有關的言行，此後的歷史是以整個民族或各民族的發展為主體，紀載他們多方面的活動。這種不同顯然是隨着時代思想的變遷而產生了。

中國歷史在這種需要改造的情形下，目前我們最急切的辦法，當然是集合許多有志的史家作大規模有計劃的工作，每個人研究一個時代或一專門範圍。從時代劃分，我們有各朝代的研究，如唐史、明史。從性質劃分，我們有田賦史、貨幣史或更進一步的分析，如明代田賦史、清代貨幣史、太平天国史等等。我們先有許多專門的研究，然後纔有產生完整的歷史的可能，正如先有許多完好的磚瓦、棟樑，然後纔可以建築堅固的大廈。

爾綱兄的太平天国史綱便是依上述的意義和我們朋友們時常計議改造中國歷史的步驟而著作的，可是也是著者五六年來苦心孤詣研究的結果。所以全書結構的嚴密，資料的豐富，態度的謹慎，我以為在現代中國史學界裏，是一部難得的著作。但是，我們並不以此自滿，著者本人亦不以此自足。我們要建設一部健全的中國史，我們要增加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大家的責任是何等的繁重！太平天国史綱的寫成頂多不過大家要做的工作千百分之一二。這種信念是我們朋友和著者一致信守的，同時，我想也是一般讀者同情的吧！

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湯象龍謹序於倫敦。

吳序

過去的學者以爲一個好史家的必須具備的條件是史才、史學、史識和史德。我以爲一本好的歷史著作之出見，最主要的條件是時、地、人。才學識德都是屬於人的訓練。沒有好史家當然不能產生好的歷史著作，可是有了好史家，而不給以客觀條件的方便，不得其時，不得其地，也絕對不能有好的成績出來。

太平天国起義到現在已經過了八十六年了。太平天国的滅亡也已過了七十年。在這七十年的歷史進展中顯然發生兩種改變，第一是政治情勢的改變，太平天国所曾努力推翻而不能達到目的的淸政府，已爲其後一代的革命軍所推翻。第二是社會思想的改變，太平天国所曾努力建設而未完成的工作，已經在這幾十年中逐漸地部分地實施。淸政府所看作萬惡的叛逆到民國成立後被推衍爲革命的前驅，湘淮軍所斥爲異端邪教的設施，到後來也被恭維爲救世的碩謀。在湘淮軍或革命家的宣傳者的口頭和筆下，或失之矯，或失之誣，往往不免有扭曲史實和附會解釋的地方。到現在，距離民國的成立也已有二十五年了，意氣和感情的障蔽一去，自然可以比較淸楚地認識太平天国的眞相。同時，在這幾十年中，國內各地和國外倫敦、巴黎諸博物館所發見的太平天国新史料層出不窮，給予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以新途徑和新憑藉，這應該是寫一本好的太平天国史的時候了。

關於地道光三十年太平軍發難於廣西金田，此後十幾年的長期戰爭中都以兩廣子弟爲中堅人物。從另一方面看，這十五年戰爭簡直可看作兩廣和湖南的地方戰爭。過去所有的關於太平天国的著作，除清政府的官書對太平天国加以惡意的歪曲的記載以外，其他私人著作也大抵多出於兩廣子弟的敵人湘淮軍文士之手，投井下石，他們是不肯尊重他們的敵人的。在新式交通工具未輸入中國以前，兩廣在地理上和民俗上、文化上都自成一區，他們的生活習慣、言語、信念，都不易爲外省人所了解。例如太平天国何以能在兩廣起事？何以能在數月之間即蔚成絕大的勢力？兩廣的子弟何以一鬨而起，從亂如歸，客家人何以成爲太平軍的中堅的勢力？凡此都有其經濟的、社會的、歷史的、地理的原因。絕非湘淮文士所能了解，更不用說清政府的御用文士！以此，理想的太平天国史的作者應當是兩廣人，尤其是太平軍起事的策源地——廣西潯江流域的學者爲最合式。地方性的了解和史料的採輯的特殊方便是一本好著作的必要條件。

我的朋友羅爾綱先生是一個受過歷史訓練和文學訓練的人。他是廣西潯州的土著，在童年已經飽聽了關於太平天国的遺聞軼事，父老的傳說和太平軍名將的遺踪使他發生極大的興趣。五年前他回到他的家鄉去，寫了一部『太平天国廣西起事史』，他已經把一個廣西人所能利用的廣西材料盡量的採擷了。可是他不肯滿足，愈深入的研究使他愈感到史料的缺乏。同時，他也不肯相信片面的史料，他需要一個更大的園地供他活動。因之，他捨棄了他的固定職業，重新回到北平來，利用北平的公私藏書，點點滴滴地作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在祁寒酷暑

的困窮生活之下，在兒女哭鬧的包圍之下，他以一般朋友所笑爲「病夫」的體質，在爲生活而工作的八小時機械的苦工以後，往往寫作到午夜！在這五年不間斷的工作中，他陸陸續續地寫定了幾十篇嘔心瀝血的著作。每一篇寫成後，改而又改，往往費了好幾倍的寫作工夫，一直改到他自己滿意纔肯甘休。可是再過一兩個月後，他又在把已發表的經過幾多次删改的文章在塗改了。他的時代使他不肯用湘淮文士那種侮辱敵人的看法，同樣地，他的歷史訓練也使他不肯偏信太平軍自身和後來革命宣傳家的記載。他的鄉土觀念引起他的研究興趣和研究的方便，可是在他的著作中他絕不肯稍存「鄉曲之見」，替他的鄉先輩辯護或掩飾。他的細密的矜愼的工夫，加之以沉潛的冷靜的分析，廣博的深入的探討，結果成功了這本可貴的小書。他雖不爲新奇可喜之論，卻沒有一章，沒有一段，不具有他的獨特的見解。在這本書中所提及的人物和典章制度的研究，都只是採取他過去所做考證工作的結論。這一些考證文章是寫定這本書的基礎，也同時刊行，別名「太平天国史叢考」，讀者最好能取以參看，更能看出作者的學力和態度。

爾綱先生在友朋中是最虛心和最謹愼的一個人。他的理想中的太平天国史的完成預定在二十年以後。這本小册子之出版，完全出於史學研究會一班朋友的催迫，作爲史學叢書的第一種，稱爲「史綱」而不曰「史」，正可以看出作者理想中的全史的計劃。

病於萬壽療養院的第三十五天，承作者的好意，讓我能在玉蘭花下快讀一過，爲了醫生禁止讀書和構思，只

能替讀者簡單地在此爲這本書著作的時和地和書的作者作一介紹。至於這本被介紹的書的內容，還是讓讀者自己去細心領略吧！

一九三六，四月二十四日。吳晗於平西萬壽療養院十一號。

自序

寫太平天国史有兩件難事：第一，關於史料的考訂方面，前人是不曾替我們做過這一件工作的。每一種史料，差不多都要作者自己先去做一番考訂的苦工夫。沒有鑒辨史料眼光的人，便看不出史料的眞僞。史料的眞僞不辨，據以成書，則其書必去「信史」遠了。史所以紀實，史而不足以傳信，則何用於史？這是寫太平天国史的第一件難事。第二，關於寫作的態度方面，從來著作太平天国史者的態度大都可以分爲三種：在同治中興時代，則持「成王敗寇」之見，斥太平軍爲「髮逆」，貶爲「粵匪」；在辛亥革命以後，則歌頌洪楊諸人稱爲「民族英雄」，尊爲「革命先烈」；到最近，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又多成爲一種理論的解釋，內容羌無故實，跡有近於宣傳。這三種見解，都是爲着時代觀念所影響，而不盡由於著者的偏見。但是，一個歷史家的任務，是在求眞，是在傳信，故必須把握着時代的觀念而不要爲其所持。換句話說，著者的態度必須站在客觀的立場，在其著作中，著者不容有絲毫成見攙雜其間。這是寫太平天国史的第二件難事。

一個要寫作太平天国史的人，要打破這兩個難關，都得有相當的訓練。著者不敏，不敢說已經受過了多少的訓練。但對於太平天国史料的考訂工作，曾下過幾年的苦工夫。著者考證的結果，一方面對於向來所傳朱九濤之

與上帝會，張國樑之與洪秀全，所謂「天德王洪大泉」之被擒等等僞傳說、僞史案，都一掃而空。同時，對於史實的建設方面，如洪秀全、馮雲山入廣西宣傳的經過，客家人與太平天国興起的關係，金田起義的情形，「天朝田畝制度」的實施諸問題，都曾經過詳徵博考，然後據以寫作。在本書中，著者敢自信沒有一處地方是根據不曾考訂過的史料來寫的。至於說到著者的態度，既不歌頌洪楊，也不咒咀洪楊；既不借往事以宣傳，也不願掩飾史蹟的眞相。著者只求在眞確可信的史料中，寫出一部眞確可信的歷史。

不過，著者的棉力究竟有限，而太平天国事件，其起因、其經過、其影響，在中國近世史上都佔了一個很重要的階段，要寫作這一部歷史，豈是著者個人的能力所能勝任？所以幾年來，除了做考訂史料的工作外，對於寫作全史的計劃，遲遲不敢下手。去年冬，妻兒南歸，來與吾友湯象龍先生同住，吾友吳晗先生也時相過從。每當深宵圍爐快談的時節，這兩位朋友，就常常鼓勵我趕快把太平天国的歷史寫出來問世。以爲著者計劃中的「太平天国史」，不妨一點一滴地寫到十年二十年，而目前出版界中，關於這一件史蹟的著作，就是一部使人值得一讀，使人可以簡單的明瞭這次事件的起因、經過及其影響的綱要之作，也還不曾有，這是著者應該擔負起的責任，必須先把一部綱要的太平天国史寫出來獻給一般讀者。著者爲了好友的勸勉，所以纔有這部「太平天国史綱」的寫作。

著者在這部書中，要最感謝著者的朋友湯象龍先生、吳晗先生。假使不是吳先生幾年來對著者不斷的鼓勵，竭力的幫忙，隨時的指示，則著者對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老早已拋棄了。假使不是湯先生在著者寫作此書的時候，

隨時隨處加以指示，則著者以學力所限，此書中將不免有所蔽的地方。尤其是在第一章革命的背景上全章及第八章革命的影響的『財政經濟方面』一節裏，都是根據湯先生的指示去寫的。湯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學者，本書根據他的意見去寫成的地方，都是本書中最精彩的地方。這是應該特別爲讀者奉告的。全書成後，並蒙湯先生在百忙中吳先生在休養中爲著者細細改正一過。總之，假如不是得吳先生的鼓勵，今天壓根兒不會有此書；假如不是得湯先生的指示，此書決不會寫成今天這樣的內容。所以著者對於這兩位好友的鼓勵與指示，是萬分的感激！此外吾友谷霽光先生朱慶永先生也都爲著者改正幾處，著者對谷朱兩位先生也深表謝忱！至於著者所根據的許多專著，除在本書各章中一一註明以示所源外，在此，並同深感謝！

羅爾綱自序於北平 二十五年四月十三日

目錄

太平天国史綱

第一章　革命的背景（上）

一　豪富兼併

太平天国（註一）革命的背景，在經濟方面看，遠因可以追溯到自雍正乾隆以來的豪富兼併與人口增加，近因則起於道光中年金融的外溢，與道光末年的大災荒。

豪富兼併的情形，可分兩方面看：一方面是地主兼併，另一方面是商人富戶的積聚。地主兼併方面，在金田發難前一世紀的大概情形，我們還可以考見。康熙時代，稻穀登場時節，石米不過銀二三錢，到了乾隆初年，增到五六錢。乾隆帝以米價連年騰湧，屢下諭旨都斤斤以民食爲憂，復傳諭各省督撫詳求其故，據實陳奏。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湖南巡撫楊錫紱應詔復奏，他那篇陳明米貴之由疏論米價騰貴由於田歸富戶一節中敘述當日社會上兼併的情形道：

臣謂（米價騰貴）由於田歸富戶者，蓋國初地餘於人，則地價賤；承平以後，地足養人，則地價平；承平既久，

人餘於地，則地價貴。向日每畝一二兩者，今至七八兩，向日七八兩者，今至二十餘兩。貧而後賣，既賣無力復買；富而後買，已買可不復賣。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爲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必須買米接濟。而富戶登場之後，非得善價不肯輕售，實操糧價低昂之權。夫一物也，一人市之，價不能增也；十人市之，則一時頓長矣。十人出售，價不能求多也；一人獨售，則任其高勒矣；如是而米穀安得不貴乎？（註二）

按楊氏此疏並不是單指湖南一省，乃就各地一般情形來說的。所以我們可以從此疏中看出當日地主兼併的消息。

但是，我們要明白那時代地主兼併的趨勢，最好是從清廷不能保障旗人之人有其田的一件大事看去，更易看得出來。原來滿人入關之初，即定有圈佔民間房地安置旗人的辦法，並嚴定私賣與漢民的法令，來保障旗人使各有永業可耕。但不到百年，旗人土地已半爲漢人地主所兼併。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便有下諭動支內庫贖回旗地的事情。雍正上諭道：

八旗地畝，原係旗人產業，不准典賣與民，向有定例。今竟有典賣與人者，但相沿已久，著從寬免其私相授受之罪。各旗務將典賣與民之地，一一清出，奏請動支內庫銀，照原價贖出，留在各該旗，給限一年，令原業主取贖，如逾限不贖，不論本旗及別旗人，均准其照價承買。（註三）

這一個救濟辦法，只給富有的旗人以廉價收買土地的好機會，對於貧窮的旗人，卻絲毫無補，他們是「貧而後賣，既賣無力復買」，乃勢所必然。於是這個辦法，又成泡影。這時候，清廷竭力要重新給八旗營謀恆產，但終沒有良法。因爲土地問題的解決，乃是整個的，而不是局部的，清廷祇圖旗人之人有其田，而不知旗人所以無田可耕的緣故，正因國家大量的土地已漸集中於少數地主之手。那大多數舊日原是有田有地的漢人，已淪爲佃耕之戶，一小部分的旗人那能例外？所以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御史范咸的八旗屯種疏便說：

滿洲八旗生計久已上廑宸衷，而恆業至今未定，蓋以內地已乏閒田，而滿漢總歸一視，其間經畫固有甚難者。（註四）

明年，戶部侍郎梁詩正的八旗屯種疏也說：

臣比年以來，再四爲旗人思久遠之計，竊謂內地已無閒曠之田。（註五）

這可見清廷愛護旗人雖是無微不至，但帝王的權威終敵不過社會經濟狀況的推移。兼併的烈燄既吞沒了貧窮的旗人的土地，即帝王也無法可施。

我們從清廷無法保障旗人使人有其田這一件大事看起來，可知一般農民的被兼併當更甚。楊錫紱所述當日田歸富戶大約十之五六，從前有田的人今俱爲佃耕之戶的現象，當爲實情。所以乾隆年間的大地主，甚至有被稱爲「膏腴萬頃」者，如直隸懷柔郝氏（註六）以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全國總耕地來計，郝氏一家便幾

佔七百分之一。（註七）同郝氏這樣的大地主，大概不會有幾個，但我們從乾隆八年（一七四三）漕運總督顧琮請舉行限田的制度，每戶以三十頃爲限，以均貧富一事看起來，（註八）我們可以知道那時候擁有三十頃土地以上的地主的普遍。乾隆時代，地主兼併的情形，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嘉慶、道光年間，更不待說了。

在商人富戶積聚方面，有兩種普遍的現象：一、居奇，在乾隆時代，富商大賈挾其金錢，買賤賣貴，子母相權，歲入往往數萬金，富者貲財以數百萬計。（註九）甚至有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環麗，遊十日未竟，如京師米商祝氏，宛平查氏盛氏的商人。（註一〇）二、典當業及高利貸，以典當業起家至數百萬者，自乾嘉以後是一個常有的事。就著者所知，如太平天国發難的故鄉，廣西省潯州府貴縣林羅兩姓，在嘉慶、道光年間，便都以營典當業積貲至二百萬以上，並稱一縣首富，當時兩姓的當鋪，遍佈全縣各墟鎮。一縣的情形如此，全國各地的情形當相差不遠。與典當業性質相近者爲高利貸，高利貸的情形，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河南巡撫畢沅奏有山西等處富戶乘河南連年饑荒，凡有恆產的人家，往往變賣餬口的時候，聞風來豫，舉放利債，藉此準折地畝的事。（註一一）又乾隆年間，金石萃編的編者王昶寄友人書中記有吳中某縣令杖責欠債未還的窮秀才，以媚富戶之獄。（註一二）這兩件事情，一件是富戶隔省放債，一件是官吏媚富戶，替債主追勒寒士。放債遠及他省本地可知；秀才欠債未淸，還不免於杖責，平民可知。我們從這兩個事件中，可以看出當日高利貸的普遍與債主的威燄。嘯亭雜錄記乾嘉以來的富民，稱爲『海內殷富索豐之家，比戶相望』，這些富戶，他們的貲財，便是從這種買賤賣貴的居奇與剝削平民的典當業及高利貸中

得來的。

豪商富戶對民間的剝削，其情形至爲明顯，我們無須再加以闡說。至於地主對佃戶的剝削，佃戶生活的痛苦，我們須一考佃戶的負擔。考清代田租數額，普通爲每畝收穫的半數。(註一三)地主安坐而收其半，佃農則田租之外，還須擔負支出全部籽種、牲口、耒耜、肥料等費，與農忙時雇傭工人的工資。故所餘米糧，往往不够一年衣食。道光時人章謙在備荒通論裏曾經替當日佃農的生活作過估計，他論道：

> 夫農民之常困於他途者，他途貧，謀口而止，而農民不但謀口而止。一畝之田，耒耜有費，籽種有費，罱斛有費，僱募有費，祈賽有費，牛力有費，約而計之，率需錢千。一畝而需千錢，上農耕田二十畝，則口食之外，耗於田者二十千。以中年約之，一畝得米二石，還田主租息一石，是所存者僅二十石。當其春耕急需之時，米價必貴，折中計之，每石貴一千有餘，勢不得不貸之有力之家，而富人好利，挾其至急之情，以邀其加四加五之息，以八閱月計之，率以二石償一石。所存之二十石，在秋時必賤，富人乘賤而索之，其得以暖不號寒，豐不啼饑，而可以卒歲者，十室之中無二三焉。(註一四)

佃農的生活，在豐熟的年頭，還不免於負債，捱饑寒，一遇災荒，更不堪問了。

在這種情形下，一方面少數的地主富商過着『席富厚樂驕逸，詠調舞歌，窮園林亭沼倡優巧匠之樂』(註一五)的豪華生活，另一方面，大多數的貧農，則過着樂歲不免饑寒，凶歲塡溝壑的非人生活。太平天国革命的遠因，就深

深的種在這個社會關係上。

(註一)太平天囯的「囯」字，不作「國」而改作「囯」者，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洪賊改字删書條記道：「書太平天國之國爲「囯」，謂王居於中也」。故太平文書凡書太平天囯的「囯」必作「囯」。世人著作寫太平天囯的「囯」作「國」誤。

(註二)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九。

(註三)皇朝文獻通考卷五。

(註四)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五。

(註五)同上。

(註六)見昭槤嘯亭雜錄本朝富民節記道：「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貧乏，人呼爲郝善人。純廟嘗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王公近侍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饌，一日之餐費至十餘萬」。按「膏腴萬頃」一語，或疑爲中國文章中一種慣用的成語，而不能當作確定的統計，但據著者的意見，此人供奉乾隆帝一日之餐能夠揮霍到十餘萬之多，則其人的田地卽使不是萬頃，也和萬頃相差不多。

(註七)這年全國田畝爲七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頃五十畝，見皇朝文獻通考卷四田賦考。

(註八)見皇朝文獻通考卷四，田賦考。

(註九)見錢維城養民，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一。

(註一〇)見昭槤嘯亭雜錄本朝富民。

(註一一)見乾隆朝東華續錄卷一百三卷。

(註一二)見昭槤嘯亭雜錄王沭菴書。

(註一三)據張履祥農書，見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六。及曾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見曾文正公奏稿卷一。

(註一四)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九。

（註一五）見黃个園家傳，梅曾亮柏梘山房文集卷九。

二 人口增加

清代自雍正、乾隆以來，豪富兼併的情形，既如上述。而人口方面，也隨着時代而日增。

清初人口的統計，是不可靠的。因爲那時候的丁徭制度悉沿明制，有丁則有賦，民間或戶有五丁六丁的止納一丁，或戶有九丁十丁的止納二三丁，（註一）各省都未能以加增人丁確數造報，故政府所得全國人口統計的數目很不可靠。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始定丁額，自後所生人丁叫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惟五年一編審如故。雍正初，又定丁隨地起的制度，直省丁賦以次攤入地糧，於是夫徭口賦一切都取自田畝，編審之法既寬，自無減匿之弊。到了乾隆五年（一七四〇），戶部請停編審，更定以保甲丁額造報的制度，至此調查的方法漸密，戶口的數目纔大致得實。故雍正八年（一七三〇）人口統計數止二千五百四十八萬餘，而至乾隆六年（一七四一）便增至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萬餘，這並不是在十一年之間人口的數目會突增至五倍之多，而實因爲乾隆六年乃是保甲造報開始之年，纔得到一個比較眞確的數目。今考此年以後調查的結果，據東華錄記載每隔十年的數目開列如左：

年度	人口數目	附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	一四三、四一一、五五九名口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	一八一、八一一、三五九名口	
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	一九八、二一四、五五五名口	
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	二一四、六〇〇、三五六名口	
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	二七九、八一六、〇七〇名口	
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	三〇四、三五四、一一〇名口	
嘉慶六年（一八〇一）	二九七、五〇一、五四八名口	
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	三五八、六一〇、〇三九名口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	三五五、五四〇、二五八名口	
道光十年（一八三〇）	三九四、七八四、六八一名口	考道光朝東華續錄道光十一年無統計故以十年代之
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	四一三、四五七、三一一名口	
咸豐元年（一八五一）	四三二、一六四、〇四七名口	按金田發難起道光三十年但是時戰區尚僅限於廣西潯州一帶故咸豐元年全國人口總數仍有增加是年以後太平軍北出戰禍蔓延全國人口即銳減故本表統計列至是年爲止

我們從上表看起來，從乾隆六年（一七四一）起到咸豐元年（一八五一）止，每十年的人口，必有增加，中間只有兩次例外：一次是嘉慶六年較前十年減少六百萬，一次是道光元年較前十年減少三百萬，前者原因由於川楚

白蓮教之亂，後者原因則未明。但偶然的障礙一去，人口的增加還是仍然向前邁進。故乾隆六年全國人口僅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九名口，到咸豐元年便至四萬三千二百十六萬四千零四十七名口，計前後不過一百一十年間，便增加三倍有奇。據上述看來，人口增加的趨勢既如是的急劇，現在，我們要推求當日國家的耕地是否也增加，而其數額又是否和人口的增加相適應呢？

考清代道光前歷朝田額，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共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頃有奇，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增至六百零七萬八千四百三十頃有奇，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復增至六百八十三萬七千九百一十四頃有奇，但是這一年的上諭便已經說道：

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地只此數，苟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註二）

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楊錫紱陳明米貴之由疏中駁乾隆帝謂米價騰湧非因戶口繁滋之論也說道：

蓋戶口多，則需穀亦多。雖數十年荒土未嘗不加墾闢，然至今日而無可墾之荒者多矣。則戶口繁滋，足以致米穀之價逐漸加增，勢必然也。（註三）

這可見雍正乾隆間戶口增加已漸成為社會上的問題。故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時，便有湖廣、廣東、江西、廣西等省人民挈家向那曾經明末流寇大屠殺後人口稀少的四川移殖的事。（註四）乾隆初年以後，田額雖仍有加增，

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便增至七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頃有奇，至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更增至七百九十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有奇。但這個增加的比例，與人口方面的增加相比，實遠不相侔，而且到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卻減退回七百三十七萬五千一百二十九頃，反較乾隆三十一年的數額減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頃。以雍正、乾隆間人口增加率還不至十分劇烈的時代，那時土地復日有增加，朝廷已有土地不够分配的憂慮，社會上也呈出了因人口增加以致米價騰貴的恐慌。而當人口增加率最高的嘉慶、道光時代，不幸田額反減少起來，這時候，即使沒有豪富兼併，耕地已供不應求，何況兼併的火燄又與時俱長！

這些不斷的日在增加的人口，在當日，既沒有新興的都市來容納他們，而移民殖邊的政策，政府不但不舉行，反把滿洲封鎖，禁止漢人移殖，即蒙古、新疆等地漢人也不是輕易去得。所以他們之中，除了南方一小部分流浪到海外去謀生，或在內地尋得苦力的工作（如碼頭脚夫、長途擔夫、漕船水手等）外，其大部分沒有出路的便流爲遊民，爲流氓、爲煙販，以至爲鹽梟，爲盜匪。他們都是太平天国革命運動的預備軍。

（註一）見康熙朝東華錄卷八。

（註二）皇朝文獻通考卷三。

（註三）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九。

（註四）見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九。

三　金融外溢

我們從上述看起來，在十九世紀初年，太平天国開幕前的半個世紀，中國國內社會上的土地問題與人口問題已經到了嚴重的時代，革命的到來已成爲不可避免的命運。這時候，又因爲對外貿易的關係，引起金融外溢的現象。因爲金融的外溢，直接的造成了銀貴錢賤的大恐慌，間接的便促起了革命加速的爆發。

金融外溢的原因，由於鴉片輸入的劇增。鴉片輸入的情形，我們可以從下面的表中看出來：（註一）

年限	印度土耳其煙輸入的總數	中國消耗擔數	消耗的價值
一八二一——一八二二	五、九五九箱	五、〇一一箱	八、八二二、〇〇〇元
一八二二——一八二三	七、七七三箱	五、八二二箱	七、九八九、〇〇〇元
一八二三——一八二四	九、〇三五箱	七、二二一箱	八、六四四、六〇三元
一八二四——一八二五	一二、四三四箱	九、〇六六箱	七、九二七、五〇〇元
一八二五——一八二六	九、三七三箱	九、六二一箱	七、六〇八、二〇〇元
一八二六——一八二七	一二、二三一箱	一〇、〇二五箱	九、六六二、八〇〇元
一八二七——一八二八	一一、一五四箱	九、五二五箱	一〇、四二五、一九〇元
七年平均	九、七〇八箱	八、〇四三箱	八、七二五、六〇〇元

一八二八—一八二九	一三、八六八箱	一四、三八五箱	一三、七四九、〇〇〇元
一八二九—一八三〇	一六、二五七箱	一四、七一五箱	一二、六七三、〇〇〇元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	一九、九五六箱	二〇、一八八箱	一三、七四四、〇〇〇元
一八三一—一八三二	一六、五五〇箱	一六、二二五箱	一三、一五〇、〇〇〇元
一八三二—一八三三	二一、九八五箱	二一、六五九箱	一四、二二二、三〇〇元
一八三三—一八三四	二〇、四八六箱	一九、三六二箱	一二、八七八、二〇〇元
一八三四—一八三五	二一、八八五箱	?	?
七年平均	一八、七一二箱	一七、七五六箱	一三、四〇三、〇〇〇元
一八三五—一八三六	三〇、二〇二箱	—	—
一八三六—一八三七	三四、七七六箱	—	
一八三七—一八三八	三四、三七三箱	二八、三〇七箱	一九、八一四、八〇〇元
一八三八—一八三九	四〇、二〇〇箱	—	
四年平均	三五、四四五箱	—	—

我們從上表統計看來，可見從一八二一年卽道光元年起，鴉片的輸入是一年比一年增加，每年耗銀平均在一千萬以上。我們現在以十年計算，中國耗銀卽在一萬萬兩以上，以二十年計算，卽在三萬萬兩以上。試問當日中國輸出的價值能否與此相抵呢？我們看下列的中國與英美兩國的貿易統計表便可以知道：（註二）

年代	入口			出口		
	貨物	金銀	總數	貨物	金銀	總數
一八一八	一七、四八〇、三三九元	五、六〇〇、〇〇〇元	二三、〇八一、三三九元	一六、八四一、三三〇元	四、〇八〇、〇〇〇元	二〇、九二一、三三〇元
一八一九	一八、七六〇、四〇八元	七、三六九、〇〇〇元	二六、一二九、四〇八元	一九、六〇三、六八五元	三、一三〇、一四三元	二二、七三三、八二八元
一八二〇	一六、七七七、一〇四元	九、二二一、八五八元	二五、九九八、九六二元	二〇、七九七、三五八元	二、二〇六、五七一元	二三、〇〇三、九二九元
一八二一	一七、三八四、四九三元	二、五六九、六〇〇元	一九、九五三、九九三元	一八、三五〇、〇〇九元	四九五、一二三元	一八、八四五、一三二元
一八二二	一八、二八〇、五七五元	五、一二五、〇〇〇元	二三、四〇五、五七五元	二一、二二七、三四四元	四八〇、五六〇元	二一、七〇七、九〇四元
一八二三	一九、六四八、八八三元	六、二九二、八四〇元	二五、九四一、七二三元	二〇、四六五、九七二元	二三四、六〇〇元	二〇、七〇〇、五七二元
一八二四	一九、〇四四、一〇七元	五、一九四、二六一元	二四、二三八、三六八元	一九、〇四七、三一七元	二、六一八、五〇〇元	二一、六六五、八一七元
一八二五	一八、三六〇、三五九元	六、五三四、五〇〇元	二四、八九四、八五九元	二二、一五八、七七八元	一、七四三、三五七元	二三、九〇二、一三五元
一八二六	二三、四五九、四八七元	五、七二五、二〇〇元	二九、一八四、六八七元	二一、八五七、五〇一元	四、三四一、〇〇〇元	二六、一九八、五〇一元
一八二七	二三、二〇六、五九五元	一、八四一、一六八元	二五、〇四七、七六三元	一九、四二一、六五九元	四、〇〇九、〇〇〇元	二三、四三〇、六五九元
一八二八	二四、三〇五、三〇九元	二、六四〇、三〇〇元	二六、九四五、六〇九元	一九、五八一、八四四元	六、一〇二、一四六元	二五、六八三、九九〇元
一八二九	二四、一四四、八二九元	一、三八八、五〇〇元	二五、五三三、三二九元	一七、六三三、八〇〇元	四、四七七、八三〇元	二二、一一一、六三〇元
一八三〇	二六、〇八四、〇一〇元	一、一五八、六四四元	二七、二四二、六五四元	一八、二四五、七六八元	六、七三五、一〇〇元	二四、九八〇、八六八元
一八三一	二四、七一四、一八九元	二三八、六五五元	二四、九五二、八四四元	一七、六九一、九〇七元	六、五三四、八九五元	二四、二二六、八〇二元
一八三二	二二、九〇三、七一二元	六八三、四五二元	二三、五八七、一六四元	一九、二二六、二二五元	四、〇一三、〇〇三元	二三、二三九、二二八元

一八三三	二五、二〇五、一八九元	六九〇、〇一九元	二五、八九五、二〇八元	二一、二九五、五一〇元	四、八九〇、九三五元	二六、一八六、四三五元
十六年總數	三三九、七五八、四八八元	六二、二五三、八九七元	四〇二、〇二八、三八五元	三一二、四二五、九七七元	五六、一〇二、七七三元	三六八、五二八、七四〇元

從上表看來，自一八一八年卽嘉慶二十三年至一八三三年卽道光十三年，前後十六年間，英美兩國輸入中國貿易的總數爲四〇二、〇二一、三八五元，而中國輸至英美兩國貨物的總數不過三六八、五一八、七四〇元，中國共入超三三、四八三、六四五元。此表是從嘉慶末年統計起的，如果我們將一八二七年以前除外，只從一八二七年算起，則前後七年間，英美兩國輸入中國貿易的總數爲一七九、一九三、五七一元，而中國輸至英美兩國貨物的總數僅爲一六九、八四九、六〇二元，中國共入超九、三四三、九六九元。但中國輸出的貨物中還有金銀一項，七年出口總數爲三六、七七二、八九九元，而英美兩國金銀輸入中國者不過八、六四〇、七三八元，除了入口之數，中國金銀出口總數實爲二八、一三二、一六一元。這二八、一三二、一六一元全是鴉片的代價。所以從一八二七年至一八三三年，卽道光七年至道光十三年，前後七年間，中國實際上輸出紋銀當在三千七百萬以上。這種金融外溢的情形，道光十三年後更甚，我們再看下列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中英貿易統計表：（註三）

（一）英國輸入中國的貨物

貨物	價值	貨物	價值
鴉片	一三、三四四、〇三〇元	生棉	六、五六三、一二四元

金銀	七五一、四三五元	總計	二四、七八五、四六二元
其他	三、八九九、八七三元		

（二）中國輸至英國的貨物

貨物	價值	貨物	價值
生絲	一、九八六、五二八元	燒料	二七、〇二八元
茶	九、五六一、五七六元	其他	九四三、一七七元
金銀	八、九七四、七七六元	運費	四五〇、〇〇〇元
明礬	六一、六一五元	總計	二二、〇〇四、七〇〇元

從這兩表看來，道光十八年，英國輸入中國貿易的總數爲二四、七八五、四六二元，中國輸至英國貨物的總數僅二二、〇〇四、七〇〇元，中國應支出二、七八〇、七六二元，我們再將輸出的貨物中金銀一項除卻入口之數外共計八、二二三、三四一元加上，這一年，中國實際上輸出紋銀應在一千萬以上。

在道光時代，尤其是在鴉片戰爭前這幾年，中國金融這樣的源源地大量地向外流出，年復一年，銀兩外洩既多，內地銀根日短，於是銀價高漲，錢價低賤，社會上就發生了金融大恐慌。我們知道，清代幣制雖爲銀錢並用的雙本位制度，而民間則以用錢爲主，如地丁錢糧的輸納，市面的交易，工資的支付，都以錢折銀計算，故銀貴錢賤，民生

必受其害。道光初年，銀每兩換錢千一二百文，使已超出法定價格一二百文。道光二十五年，每兩京中易錢幾及二千文，外省則每兩易錢二千二三百文不等。此時銀錢價值比例，較昔錢價平時已兩倍，較貴時幾及三倍。銀貴錢賤對民生最重大的影響有兩方面：（一）自耕農無法完納錢糧；（二）傭工無法維持生活。因爲自耕農所自有的爲農產品，農產品所換得的爲錢，而國家錢糧則徵收銀兩，以錢折銀，在從前銀價賤時，折納自易，往往『民間完正銀一兩，加以隨徵之耗，以錢折銀，數常有餘，足以供州縣轉運之費與從易傾銷折耗之需，是以徵解無誤』。（註四）到了這時候，昔日銀一兩換不到錢千文，現在已換到二千有餘，國課徵銀，民間繳錢，折錢之數自不能不跟着銀價的日昂而加增。道光十九年，徵錢糧一兩，定價收錢一千八百八十五文，（註五）後漸增至二千餘文以至二千八九百文。（註六）而農產品的低賤，售錢且低於銀價平時。故民間完納錢糧，『動以昔日兩年之賦，足今日一年之額』，（註七）『朝廷自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註八）在此種情形下，那些無法完納錢糧的自耕農，推不了那『吏役四出，晝夜追比，鞭扑滿堂，血肉狼籍』（註九）的痛苦，只有拋棄了他們的土地，逃荒去。在傭工方面，情形也相類：當時人吳嘉賓在擬上銀錢並用議中論道：『銀每兩值錢二千，傭一年工，祇易五兩銀，傭值歲不過十千。流亡之衆，逋負之多，實由於此』。（註一〇）

自耕農與傭工，是在豪富兼併及人口劇增的社會裏倖存的人物。但是而今銀貴錢賤的大浪潮起來卻把他們吞滅了，他們無法保守他們的土地，維持他們的工作，而終歸不得不與那些無業的流亡一齊走上逃亡的路去！

(註一)H. 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 pp. 210。
(註二)同上書, Vol. I. pp. 92。
(註三)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 514。
(註四)經梓擬改銀幣折錢疏，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八。
(註五)據包世臣銀荒小補說，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八。
(註六)據馮桂芬用錢不廢銀議，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八。
(註七)經梓擬改銀幣折錢疏中語。
(註八)曾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中語，見曾文正公奏稿卷一。
(註九)見同上。
(註一〇)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八。

四　連年災荒

在土地問題、人口問題已經到了嚴重時期的時代，在外來的經濟侵略又使這個嚴重的時期更加尖銳化的時代，到了道光末年，中國社會再遇着了連年的大災荒。因爲災荒的到來，各地被災的人民，流離失所，餓殍徧地，於是大革命便從災荒聲中爆發起來。

這一場連年的大災荒，我們可以從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說起，到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止計被

災的省分，黃河流域有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六省，長江流域有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蘇、浙江六省。災荒的種類計包括有旱災、水災、水旱災、風災、風沙災、雹災、歉收等。其中尤以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河南全省的大旱災，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長江流域的湖北、安徽、江蘇、浙江四省大水災爲最嚴重。河南大旱災的來襲，正當兩次大工之後，民間元氣未復，戶少積儲，一遇大災，便致流離顛沛。我們從道光帝兩次上諭所述的緊迫情形可以看出此次災情的嚴重。七月癸卯諭道：

> 鄂順安奏豫省缺雨，災民亟應籌款賑恤一摺，已飭戶部速議具奏矣。因思河南兩次大工之後，元氣未復，民鮮蓋藏，當此苦旱異常，小民顛沛情形，不忍設想。若待該部籌議章程，恐緩不濟急，即使撥運近省庫款，亦覺難救燃眉。朕焦灼之餘，幾廢寢饋。（註一）

八月丁未又下諭道：

> 本年河南省開封等府雨澤稀少，二麥歉收，疊經加恩撫恤。昨又據鄂順安奏到該省亢旱異常，報災幾及通省。當即降旨飭戶部發銀十萬兩，並於鄰近省分籌撥銀二十萬兩，星速解往備賑。著領解各員無分晝夜，迅解該省驗收，毋得延誤干咎！（註二）

至於湖北、安徽、江蘇、浙江四省的大水災，又較河南旱災更爲嚴重。這一次四省被水災區，道光帝上諭稱爲「較歷屆尤爲寬廣」。（註三）清史紀事本末稱爲「水之大爲百年所未有」。（註四）水災起於夏初四月間，直到初秋江

水還未退，江南、浙江、湖北各省文鄉試都致改期舉行，災區被淹，前後差不多共四個月。水勢的情形，據駱秉章自訂年譜記所見武昌情形，城不沒者止一版，城內水深至簷，外出都須乘船。城內如此，城外被淹的情形可知；武昌一地如此，被災各地的情形，大致當相同。因爲大水淹沒時期的久長，與水勢的浩大，故災情極重。當日以武昌一地的災民計，便有十六萬三千人。（註五）四省災民之多，可想而知。這兩場大旱災大水災，其災情的嚴重自是少有。而上述其他各省各地連年的災荒，也不是輕小的。如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山東臨清等三十八州縣旱災風沙災，道光二十七年九月，直隸安州等三十六州縣水旱災雹災，十月，安徽泗州等三十九州縣水旱災等災情，都是徧連幾十個州縣的。據湯象龍先生的道光末年被災縣數表（註六）的統計，其時平均每年被災者有五百餘縣，其中災情嚴重需要賑濟者道光二十七、八、九三年平均每年都在百縣以上。計被災縣數佔中國本部縣數三分之一，需賑的災區則佔本部縣數十五分之一。這一場連年的災荒，災區地域之廣，與災情的嚴重，於此可見。

在大災荒的時候，清廷原是有賑濟的辦法的。但官吏辦理賑務，向來有兩個大弊端：一、浮冒剋扣；二、敷衍畢事。浮冒剋扣，則賑款惟中飽胥吏私囊，災民少沾實惠。雖嚴旨屢下，實等具文，而欽派查賑大員卽清廉嚴正如林則徐、陶澍之流，也只好有『災賑之弊，悉數難終』（註七）之嘆。這方面積弊深重，我們無須再說。至於敷衍畢事，大則匿災，小則遺漏，災民也同樣的得不到救濟。道光時人楊士達親見湖北大水災時賑災情形，曾痛論此弊道：『我國家紀綱整肅，庶政盡歸核實，於荒政獨寬，故救荒之善，度越前代。近日立法美意寖失，上則司農告匱，下則紳富凋殘，有

司奉行；惟務節省敷衍畢事而已。是故匿災之與冒賑，浮濫之與遺漏等罪也。今則州縣多出於匿災，大吏但防其浮濫，災黎所以重困也」。（註八）

在災荒中，自以農人爲最苦，而農人之中，又以佃農更爲痛苦。我們在第一節中曾估計過佃農的生活，知道他們在豐熟的年頭還不免於負債，挨饑寒，到了這個連年大災荒的時候，災荒既減低了他們的收成，剝奪了他們的農時，甚至沖蕩了他們的田廬房舍，而朝廷的賑濟，不要說因胥吏中飽災民少沾實惠，或州縣匿災致被偏遺，即使每人都得到賑濟，但領賑所得祇可以苟延性命於災荒流行的時候，至於災後一切善後的辦法，朝廷都沒有替他們設想，所以大災過後，他們更是沒有方法去生活。結果只好拋棄了耕地，攜妻帶兒逃荒去！這樣連年的災荒，便造成一批批的災民。這些災民，都是太平天囯的預備軍。

我們明白了這個情形，便可以知道太平軍北出湖南時不過數萬人，及到長江流域，沿途男婦蜂湧的加入，不一年，人數便逾二百萬。（註九）其原因有一部分是由於這次連年大災荒所釀成。

（註一）道光朝東華續錄卷五十六。
（註二）同上。
（註三）道光二十九年六月上諭，見道光朝東華續錄卷五十九。
（註四）卷四十。
（註五）據楊士達書張武昌救荒事，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八。

（註六）見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咸豐朝的貨幣。

（註七）林則徐覆奏直隸災賑情形疏中語，見林文忠公政書江蘇奏稿卷五。

（註八）見晉張武昌救荒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八。

（註九）據賊情彙纂卷十一，賊數的統計。

第二章　革命的背景（下）

一　滿人的壓迫與漢族祕密會社的反抗運動

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在經濟方面的背景，我們在上章已經加以說明。而在民族的、政治的、軍備的方面，也都有其深遠的背景，在本章中，我們再繼續敘述。

在民族方面，自清初以來二百年中，滿漢之間，是一個壓迫者與反抗者的對峙局面。滿人的壓迫漢族，入關之初，就首先奠定維持其軍事統治的基礎。滿人在這個維持軍事統治的原則之下，第一個政策便是握住全國的財源，因為握住了財源，然後纔可以實行一切統治的步驟。第二是實行圈地政策，順治元年（一六四四）上諭將近京各州縣無主田地及明代皇室貴族產業，一概給與滿洲諸王勳臣兵丁任人指圈，但事實上距京較遠的田地亦任人指圈，且有主的田地亦常被指圈。這個政策一方面是樹立八旗的勢力，以鞏固統治勢力中心的京畿，另一方面是使八旗在征服的地方維持一種經濟自立的根據地。後來八旗駐防政策便是承繼這個政策的意義。第三是鞏固關外的根據地，其意義有兩點：一是維持關外為滿族向外發展的策源地，將關外的富源與關內隔絕，不讓漢

人混入；一是將關外作爲滿洲民族經濟的後庫，盛京的戶部工部先後於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成立每年由中國本部輸出一部稅銀存於該處。這三個政策，都在經濟的方面建立了堅固的軍事統治的基礎，以控制漢族的命脈，使漢人輕易翻身不得。（註一）此外，在政治方面，全國的政權都握在滿人手中，計歷次軍興除入關之役不待論外，若平三藩、平準噶爾、平青海、平回部、平西藏、廓爾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蓮教、平喀什噶爾，出師十數次，督師主帥都以親王貝勒或滿大臣充任。至於平時，內而樞府，外而封疆，漢人備員而已，於政事無有所問，如順治、康熙間的洪承疇，雍正、乾隆間的張廷玉，雖位尊望重，但實則不過一弄臣，其餘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豐以前，將相要職，漢人從無居之者（將帥間有一二，則爲漢軍旗人）。在文化方面，自雍正、乾隆以來，文字之獄，禁書之令，一時紛起，文網密布，檢章摘句，稍有不當，卽指罪而誅，又企圖以高壓手段根本消滅漢人的種族思想。可見滿人處心積慮處處都嚴守着滿漢的大防，以征服者的地位來宰割漢族。

但是，漢族雖給滿人如此的任意來宰割，而這個源遠流長泱泱大民族，不但不因受異族的統治而稍有屈服，反之，內潛的民族意識，卻因受了異族的壓迫而發揚光大起來。我們且看：當滿人入關，在那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國破家亡的時候，漢族究有何表現？這些悲壯的往蹟，至今歷史上還給我們分明的保留着：在流寇方面，最著名的如李定國、白文選、劉文秀等，都轉與朱明後裔聯合，把他們對內的干戈轉而向外。在民衆方面，當清廷薙髮之令旣下，他們就都立刻起來反抗，不惜捨身家性命去保護那表現自己種族象徵的衣冠。至於士大夫方面，王夫之那

句「即使桓溫功成而篡，猶賢於戴異族以為中國主」的話，最可以代表一般士大夫的心理。這種內潛的民族觀念的表現，不出於亡國之前，而等到亡國以後，纔如萬丈火山一旦衝天爆發起來，這雖然無補於國家的淪亡，然而它卻播下了革命的火種，埋下了復興的根苗。後來由士大夫深入民間去組織的祕密會社的不斷起事，正是這個民族觀念的開花結果。

本來會黨的興起，原只是漢族反清運動中的一條路子。當滿人入關之初，薙髮之令既下，京師以南，民衆就紛起反抗。後來這舉義運動既次第失敗，亡國志士知道公開的反抗祇有徒把那無訓練無組織的民衆犧牲。於是有的乃著為文字來詔示後人，如王夫之的讀通鑑論，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就開了鼓吹民族思想與民權思想的路。有的或落髮為僧或出入僧寺，借方外做他們反清的機關，這一派人就開了祕密結社的路。如熊開元、汝應元、閻爾梅便是這一派最著名的人物。閻爾梅破萬金的家產，出入方丈，做光復祖國的事業，從他那首眞空寺餞別的詩裏很可以看出這班圖謀光復的志士的行動。詩道：

柳巷垂青旆，蘆溝漲紫塵。幾多亡國士，私送死心人。琨逖雙圖晉，荊高再擊秦。臨風徒握手，不覺淚沾巾。

崔盧爭仕宦，燕趙寢悲歌。故國淪如此，新亭泣奈何！暫投令父杖，遲待魯陽戈。試看長陵氣，青松樸樕多！（註二）

我們看此詩，可知在那柳巷蘆溝掩映的僧寺裏面，當時有多少的亡國志士在做那「私送死心人」的事業。他們

都看得很清楚，到了那『崔盧爭仕宦，燕趙竊悲歌』的時候，那班受了利誘而爭匍匐在異族新君的寶座之下的士大夫們已經無望，他們的光復事業是要向民間去活動的。民間有的是偉大的潛勢力，這種勢力是不曾為統治者所認識所利用的。所以這班志士們，他們雖然感慨『故國淪如此，新亭泣奈何』，但是他們目前不過只是『暫投夸父杖，遲待魯陽戈』，他們卻很樂觀的說：『試看長陵氣，青松樸棫多』，把無限的希望都寄在他們的新事業上。反清的秘密會社的起來，就是從這一類到民間去的亡國志士們的手裏創立起來的。

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甲寅，天地會成立。天地會是借無根的神話，引出反清復明的宗旨，以煽動羣衆復仇的熱情，採取水滸傳異姓一家的理想，以組成一個團結羣衆的大集團，而其目的則始終以推翻滿清的統治為對象。在天地會拜會的本子裏，其開宗明義的詩章上就鮮明的詔示道：

三點暗藏革命宗，
入我洪門莫通風。
養成銳勢復仇日，
誓滅清朝一掃空！（註三）

這樣的一個不以升仙作佛為歸宿，而以光復祖國為目的的秘密結社，自是滿清政府的大敵，因此在康熙年間的現行律裏，就定有一條專對付天地會的嚴厲的律例，治以『謀叛未行律』。後來續訂則加為『斬絞』，最後更加

至不問首從都「都立決」（按謀叛未行律法止絞決而止）。但是，清廷雖定有這種嚴刑峻法，而天地會所謂「洪家兄弟四海通」的組織，極易投合社會上貧苦羣衆的心理，尤其是爲流落江湖無家可歸的流亡者所歡迎。加以康熙以後人口日增，兼併愈烈，社會上無業的人也因而加多，又給天地會製造了會衆的來源。於是天地會就一天天的盛行起來：從福建深山中一個小寺，漸漸的蔓延到珠江流域，以至長江流域；從小小的幾個亡國志士的組織，漸漸的流衍成爲民間最大的一個反清會社。（註四）

天地會之外，白蓮教的活動也與反清革命有關。考白蓮教的興起，本是元末漢族志士假借佛教迷信以驅逐胡元爲宗旨而組織的一個祕密結社。明代天啓年間，這個會社曾經起來做過反抗暴政的運動。到了明亡以後，白蓮教又再重新樹起興漢滅胡的旗幟，領導着徒衆與天地會異途同歸擔負起這件反清的民族革命。

當日中國社會的下層羣衆，大多數是給天地會、白蓮教這兩個會社領導的。在北方的以白蓮教爲領導，在南方的以天地會爲領導。這兩個會社，都不斷的用鮮血造成一頁頁的反清記錄。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天地會由林爽文領導首先起事於臺灣，和清兵血戰一年之久。乾隆末年，白蓮教劉之協奉小童王發生假稱明裔朱姓，密謀起事，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事洩，同黨先後被捕。劉之協被解到河南扶溝，乘間逃走。清廷嚴責州縣大索不獲，荊州、宜昌等地被株連羅織的數千人，民間因這事破家亡命的不知多少。於是聶傑人、張世謀等起荊州，姚之富、齊林妻王氏等起襄陽，四川孫士鳳、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祿等一時並起。陝西張士龍、張漢潮、張天倫等也乘機

起事。一時西部各省望風響應，他們都以「興漢滅滿」做口號，很鮮明的表出爲民族而戰的鬪爭的意義。這一役，在白蓮教領導之下的反淸鬪爭，地域遍五省（湖北、河南、四川、陝西、甘肅），時間前後共十年（一七九三——一八〇二），淸廷耗戰費二億兩竭全國兵力纔得底定。這次白蓮教起事雖然失敗，但其徒衆還是再接再厲前仆後繼的。到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二），北京淸宮禁中又有白蓮教的支派天理教首領林淸的事變。南方的天地會乘着北方多事，便在這時候從福建、臺灣一帶傳播到廣東、廣西、江西、湖南各省來。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湖南、永州錦田猺趙金龍之亂，天地會便要乘機起事，後因猺平迅速，未及發難。但天地會的勢力在南方一帶已所在潛伏，道光末魏源痛論天地會的聲勢道：

> 楚粵邊郡，奸民爲天地會，締黨歃約，橫行鄉曲，小剽掠，大擅殺，各有名號。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諾，吏不敢問。金龍起事，即戕殺會匪，故會匪不附。而彬桂兩粵奸民已所在蠢動，州縣藉軍興，團練隨時禽治渠魁，又猺平迅速，故幸未生變。然黨與蔓三省，逋逃藪聚，論者謂邊防隱憂在苗猺之右。（註五）

可見當日白蓮教的勢力雖然暫時消沉，而天地會的潛勢力卻已代之而興起。但是天地會的機構是不統一的，各地山堂分峙，雖有交通而不相節制，所以起義者常絡繹不絕，而接應的卻少。因此，在廣大的鬪爭中天地會祇可以爲響應，而不能取得領導的地位。於是在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漢族反淸鬪爭的領導者便由那新興的有中心領導的機構的上帝會起來接受了這一脈相傳的反淸運動的歷史淵源，而匯合成爲廣大的太平天国的革命運

動。

（註一）請參看湯象龍先生的清初的經濟政策一文，見南京中央日報史學第一期。

（註二）閻古古全集卷二。

（註三）貴縣修志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第四號。

（註四）請參看拙著水滸傳與天地會一文，見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第九期。

（註五）聖武記卷七。

二　政治貪污

在政治方面，清代風氣，士大夫公然言利，不以貪汚爲可恥。這種風氣的由來，有三個主要的原因：一由於清初朝廷的提倡，二、由於賣官鬻爵，三、由於清初酬勞功臣的分贓制度。

清初朝廷的提倡士大夫務利，其用意有兩點：一、鑒於前明士大夫好名的流弊，二、企圖以利祿消磨漢族士大夫的氣節，使他們對故國的依戀改爲對新朝的效順。關於後者，清代人士有所顧忌，自不敢加以論列。關於前者，管同曾痛論道：

天下風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矯之，則治；不善矯之，則危且亂。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奉行文書而已。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科道不敢大有論列。明之時，多講學，今則結社聚徒杳然無聞。明之時，尚清議，今

則場屋策士涉時政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驕士橫，知其敝而一切矯之，矯之誠是也。然百數十年來，其難迺起於田野之姦，閭閈之俠，朝堂學校之間，安且靜也。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鑒前代者懲其末流，必觀其初意。故三代聖王有因有革，必舉而盡變之，則更起他禍。

代明人好名流弊而起的弊端是什麼呢？便是好利。管氏接着說道：

今之風俗，弊在好諛而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趨。（註一）

郭嵩燾也論道：

自漢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爲勝，吾總其要曰『名利』。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利，明人務名。二者不偏廢也，要各有其專勝：好名勝者氣必彊，其流也從權怙黨而終歸於無忌憚；好利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歸於不知恥。是說也，吾於數年前見及之，曾以告胡文忠公，自謂篤論。故明人以氣勝，得志則生殺予奪泰然任之，無敢議其非。本朝以度勝，得志則利弊賢否泛然聽之，亦無敢議其非。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註二）

士大夫到了『惟利之趨』，到了『倚勢營私而終歸不知恥』的地步，清廷豢養順民走狗的目的固然達到，而政治貪汚的風氣也從此造成了。

賣官鬻爵的制度對於政治的影響，更是明顯。因爲朝廷的爵祿還可以買賣，制度的本身就已經『使天下無

廉吏」，而況捐官納爵的人，他們無非為利祿打算，又怎能使他們不致侵漁百姓？考清自入關之初，便開捐納的例，順治六年（一六四九）戶部奏軍旅繁興，歲入不給，議開監生吏典等捐納，康熙、雍正兩朝，西北用兵也都藉捐納來補國用的不足。因此，捐納名目頭緒更多：京內捐納的官，初不過中書閒曹，後來便上及主事員外等項；京外捐納的官，初不過有司下僚，後來便上及道府等項。於是有『朝為白丁，上一千七百兩，而暮則堂堂縣令矣。再上一千兩而先用矣。再上一千兩而即用矣。通計不過三千七百兩，即授一小縣，而烟火萬家司其政令，光榮極矣』。更有『朝而白身，暮以五千兩而黃堂矣』。（註三）知縣知府乃是親民的官吏，捐納如此輕易，其他各項可知。這個捐納制度，清初有識的人士曾加以反對，如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侍郎宋德宜有請停捐納之奏，以為捐輸三年，所入三百餘萬，知縣最多，計五百多人，與吏治有礙。蔣伊甄捐納以恤人材疏也說：

> 從來親民之官，莫切於縣令。縣令賢，則一邑被其澤。推而言之，天下之民困矣。捐納知縣原出於一時權宜之策，乃有先用，又有即用，更有小京職之一途，以為終南捷徑。援其欲速之心，莫非取償之計。此猶望其毋侵漁百姓，豈可得乎？（註四）

而王命岳的懲貪議中更說得痛切，他論道：

> 臣聞致理必在懲貪，懲貪莫先旌廉。今天下吏治方飭，而糾舉之章日滿公車。議者謂小吏之不廉，大吏導之也。至大吏之不法，又誰導之？臣於是不能為在內部臣諱也。蓋其一能竊朝廷之爵，而使天下無廉吏；其一能

資朝廷之法，而使天下之貞良無所勸，汚黷無所懲也。夫天下無廉吏，而又善者無所勸，惡者無所懲也，幾何不縱千百虎狼於天下，而盡吮天下之蒼生哉！（註五）

當時議者的話雖然這樣痛切，而清廷生財無方，所以都不曾有停止捐納的決心。乾隆帝即位之初，曾一度下諭停止捐納事例。但不久，因江皖之災，捐例重開。後因河工軍需，也有特捐。又有常平事例捐，專捐貢監等項。及到嘉慶、道光兩朝，國力益敝，捐納事例，更屢開不已。又屢開特捐，川楚、土方、衡工、工賑、豫東諸例，相繼而起。軍需河工賑濟都多在這裏籌撥。清廷這時候差不多看捐納當作正項的收入，靠這筆款項來渡過財政上的難關，於是吏治更不可問了。

至於清初酬勞功臣的分贓制度對於政治的影響，前人不曾論及。最近我的朋友湯象龍先生纔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在論粵海關監督舞弊的起源中說道：

粵海關監督的權限是異常廣大的，對外貿易之操縱全在一人之手，對內稅收的報銷亦由一人包辦。這種包辦制在清代原是很通行的，即每年繳納政府所額定的數目後，其盈餘稅銀監督可以自由處分；換句話說，在額定數目以外政府容許監督有分肥的機會。這種包辦制的起源，一方面是因清初滿洲人與漢人的隔閡，採取這種制度在稅收上比較有效；一方面是利用這種制度以酬勞宗室親近及有功勛者，所以在清代各關的監督大半由滿人充當。明白一點說，這就是一種分贓制度。在這種情形之下粵海關監督的舞弊

當然是最易最多而不可免的了。（註六）

粵海關是這樣別的稅收機關也同這樣。這種分贓制度，清廷初時的用意原是酬勞有功助的人，但到後來，一切管理稅收機關的人，都視『分肥』爲應享的權利，推而至於軍需、河工、賑濟莫不如此。政治的貪污，是有一部的原因由於這個分贓制度所影響的。

我們看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裏，一方面朝廷有意以好利風氣養士，另一方面賣官鬻爵成爲一種國家經常的制度，並且稅收機關的分肥又被視爲一種半公開的分贓制度，於是在這種風氣與制度之下，政治的貪污，自是必然的現象。那時候官吏的汚蹟，實難以窮述。其最爲顯著的：如康熙年間司財政者侵漁虧空的事件。當日各省挪缺侵蝕，動輒千萬，督撫也串同作弊，幫助屬員容隱掩覆，朝廷勒限追補的功令，不過一紙虛文，而歸完的絕少。其新任者，上司逼受前任交盤，雖有虧空，不得不受，又使後繼的人輾轉效尤。至於乾隆時代，和珅當國，更不用說了。那時上司對於屬員有派買貂參金珠的明文，屬員對於上司有玄狐珍珠的饋送。當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伍拉納、浦霖等，都投託和珅門下，貪贓枉法侵虧公帑，動至數十百萬。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和珅伏罪，其家產先後查鈔，約其價值，或謂當不下八萬萬兩。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又有庫案發生，戶部銀庫計前後被司員通同盜蝕共銀至九百二十五萬二千餘兩。這些累累的萬千億兆的贓款，無論其爲侵蝕公帑的，爲搜括民間的，都是人民點點的血汗所累積而成。這班貪官汚吏們，一方面是多方婪索，窮括民膏，另一方面是貪贓枉法，使「富貴者諗惡不

究，貧賤者銜冤莫伸」。（註七）他們的貪婪甚於強盜，他們的殘酷無異虎狼，民膏民脂給他們括盡了人民的銜冤忍無可忍了，民間到處都埋下了革命的種子，等到金田一呼，被壓迫的民衆便到處響應起來了！

（註一）朱琦柏視山房文集書後。
（註二）養知書屋文集卷十。
（註三）顧琮請分繁簡重名器疏語，見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七
（註四）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七。
（註五）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九。
（註六）見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一卷第一期光緒三十年粵海關的改革一文。
（註七）見咸豐初元天地會領袖萬大洪討清檄文中語。

三　軍備廢弛與鴉片戰役的影響

在軍備方面，滿清政府的統治力，自乾隆、嘉慶以後，已經日漸衰弱。到了鴉片戰爭之役，滿清政府的顢頇無能，軍隊的驕頑疲弱，更完全暴露出來。

我們知道太平天国興起以前，滿清的軍隊爲八旗與綠營。八旗爲滿族的氏族軍隊，其額數約二十五萬以強半翊衛京師，以少半駐防各地。綠營爲國家的常備軍，其規制始自明代。順治初，天下已定，乃建各省營制，綜全國綠

營額兵共六十六萬人分爲七十一鎮，以駐守各地關隘。通計全國兵額共九十萬，額數不爲少，而八旗則屯聚於通都重鎮，綠營則分布列郡汛地，布置也很合機宜，以這樣的兵力，來控制全國軍備方面本來並非薄弱的。

但滿清的兵力，八旗便首先不可用。因爲八旗以游牧部落入據中國以後，以征服者的地位，踞養尊處優的環境，使他們逐漸的消磨了新興民族的銳氣。到三藩起事時，八旗的戰鬭力已遠遜於入關的時候。康熙帝平定三藩，實出自漢人趙良棟、蔡毓榮等效忠滿清者之力。其後平定準部、回疆、金川，雖仍八旗、綠營並用，但軍隊戰鬭力究竟以綠營爲主。所以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有增兵之舉，乾隆帝實有見於八旗之不可用，而不得不增加綠營兵額以應付他日非常的事變。

乾隆帝的先見是不錯的。但承平日久，綠營暮氣漸深：將弁則薰染官習，兵卒則驕頑疲弱。所以到嘉慶初元川楚白蓮教之役，綠營兵力也不可用。那個以鄉勇出身打平白蓮教出名的羅思舉在他的自傳裏給我們保留有兩段重要的史料，一段是自述鄉勇的戰功及淸帥欺謳滿廷的話道：

余於嘉慶元年充當義勇，累經三大帥額、勒、德行調，設謀得獲勝仗，擒獲首逆，俱奏係官兵攻剿生擒，未聲明是鄉勇攻破，如據實直陳，恐□□□□□□皇上生疑，諭飭官兵不能打仗之咎也。

另一段是記經略勒保率官兵二十萬圍攻白蓮教徒於香爐坪，坪上有四十八道口子，圍攻數月，未能打破一道。時思舉在開邑養傷，奉勒保八百里札飛調來大營。他到大營養傷愈後，謁見勒保時的問答道：

侯爺（即勒保）曰：『此股賊匪定要你打』。余曰：『將領調有千餘員，兵勇駐有二十萬，不能攻剿，叫余一人如何攻打，豈不是馬快反打加鞭耶？馬不快，反安逸耶』？勒公曰：『不快之馬，加鞭打亦不中用，此股賊猶問爾要定了，毋得推諉』！

我們參以嘉慶帝上諭所謂『勒保竟係擇一無賊處所紮營株守，直與木偶無異』，及『勒保昏憒糊塗，錯會朕旨，半載以來，惟在達州附近地方紮營株守，竟成一彙報軍情之員』（註一）的話，可證這個流氓英雄的自述並沒有誇張。所以白蓮教起事十年，最後還是靠鄉兵的力量纔得平定。滿清兵力的衰弱，此時已成為不可掩的事實。

川楚白蓮教平定以後，清廷對於軍備的廢弛並沒有整頓。由是年復一年，積弊更重。到了道光鴉片之役，清廷命將調師雲集廣州，這班綠營兵卒，『奉調之初，沿途刼奪。訴之領兵官，無從查問。甚至指罵官長，捶撻貧民，將弁瞠目視之，不能發一語。抵粵以後，喧嘩紛擾，兵將不相見。遇避難百姓，指為漢奸，擄取財物。教場中互相格鬬，日有積屍，莫之究詰。……夏初，楚兵晝奪十三行，背負肩擔而去。呼群結黨，散赴各鄉，累日不歸，不知所事。軍書雖在，從無按籍稽查者。時都守以上，駐紮城中，守壕兵丁，望見夷船，急發空礮數聲，捲包而遁。大帥許逃兵入城，而百姓不許出。一二守軍法恤民隱者，略加約束，忘平日糜餉之恩，銜一時肅法之怨，不變則潰矣』。（註二）以這種軍紀掃地的疲兵來當那以新式武器作戰的強敵，結果自然只有城下之盟。此時滿清兵力的衰弱，更完全暴露在民眾的面前。

反之，在民眾方面，正當清帥在廣州城上高高的豎了降旗以後，駐在廣州城的東北村中的英國軍隊，立刻就

給三元里一帶村民加以襲擊。民衆自動的表現了一幕英勇的鬬爭。這一次三元里事件，中國的記載與英國的記載頗不相同。我們即使相信英國的記載爲眞實，中國的記載爲誇張，但當日民間這種誇張的空氣，卻正使民衆一方面輕視清廷，另一方面卻養成了一種自信的心理，給後來太平天国的革命運動製造了革命的心理基礎。

這種現象，當時有識的人士是都看得到的。如廣東臬司王廷蘭致閩浙顏制軍書有說：

提庫中之黃鉞，惟有心酸；樹城上之白旗，能不髮指！……所慮者一蹶不振，從此爲外夷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內地。側身四望，天下當重任者更有幾人？（註三）

羊城日報記廣勇一節說道：

百姓以兵不擊賊（按即指英國軍隊），反阻民勇截殺，自是咸懷憤激，益輕視官兵矣。（註四）

後來夏燮在他的粵氛紀事一書中追述太平天国起事的來源也說道：

論者徒見其桀疾于粵西，而不知其階亂之在粵東也。方琦相之羈縻義律也，粵東之民謠曰：「百姓怕官，官怕洋鬼」。迨三元里之役，粵民起而創之，遂興團練之局。未幾，間撫事定，積不能平，遂有次年揭帖之變，而大府亟出示安撫之，又從而謝止夷人之入城者。于是粵東之民又謠曰：「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則粵東之民浸浸乎玩大府于股掌間矣。

夏氏這一段論鴉片戰爭前後人民對於滿清政府心理的轉變，最爲透澈。因爲鴉片戰爭以前，清廷軍備雖然

早已廢弛，但紙老虎還沒有十分戳破，人心還有所顧忌。到了鴉片戰後，紙老虎完全洞穿了，而人民又瘋狂一般自信「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自己確有不可侮的力量在，於是乎到了這個人民自以爲「能怕其官之所怕」、「淩乎玩大府於股掌間」的時候，人心便漸漸思變了。洪秀全到廣西去做他的革命事業，正是開始於這個年頭。

（註一）嘉慶朝東華續錄卷八。

（註二）王鈞宰金壺浪墨卷三引羊城日報語。

（註三）金壺浪墨卷二。

（註四）金壺浪墨卷二。

第二章　革命的醞釀及爆發

一　上帝會的創立與洪馮入桂

在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的春天元宵燈節過後，春潮初漲的西江下流，有兩個青年人，溯江而上，向那黔鬱交流苗猺雜處的廣西省潯州府進發（註一）這兩個青年人，一個叫做洪秀全，他是上帝會的創立者，手創太平天国的領袖另一個叫做馮雲山他是洪秀全的同窗書友，也是皈依洪秀全新教最早的一個信徒。

洪秀全廣東省花縣官祿㘵人，（註二）生於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即西曆一八一三年一月十日。（註三）秀全的父親叫做洪鏡揚，是個小農人家。秀全兄弟三人，長兄叫做洪仁發，次兄叫做洪仁達，他們是同母所生。（註四）他的家境困窮，家中只有耕牛一二頭，兩兄幫助父親耕田，一年四季，另養些豬、雞、鴨等，又種些少瓜菜，全家食糧都由此供給。他的祖先由嘉應州遷移到這個鄉村來，說的是客家方言，他的家族富有客家人的渴愛自由特立獨行的性格。（註五）

秀全幼聰明，七歲入塾讀書，五六年間，就誦熟了四書、五經、孝經等書，其後更自讀史書，了然於歷代興廢之所

以然。他的家族以拾取功名來期望他，他自己也以顯親耀祖爲己任。他到了大約十六歲的時候，就開始到廣州去應試。不幸每試都落選，從未考得中秀才。有一年，那是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秀全又去廣州應試，在街上遇見兩人，其中一人手持小書一部共九本名勸世良言。那人將全書贈與秀全。秀全考完了試攜回鄉間，稍一涉獵其目錄即便置之書櫥中。這部勸世良言，是基督教徒梁發所著，秀全無意中接受了此書，後來對他一生的思想及行動的影響至大，他所創立的上帝會教義以及由其教義所演出的種種政制，都導源於此書。

在接受此書後的第二年，秀全再赴廣州投考，結果又是名落孫山。於是在連年悲苦失意之中，秀全便得了一場大病。人家把他擡回他的鄉村。秀全在大病期間，連續的做了許多奇夢，見了許多異象。他夢見一個高坐寶座的老人，那老人給他寶劍一柄，叫他去鏟除鬼魔，但吩咐他愼勿妄殺兄弟姊妹；又給他印綬一個，叫他去治服邪神。在這些異象中，秀全又常見一中年人，他叫這個中年人做「長兄」。這人教他如何去動作，並帶他遨遊遐邇以追尋邪神，扶助他殺滅那些邪神。秀全病時，神遊四方，常在他的臥房裏走動跳躍，或如兵士戰鬪狀，往往大聲狂呼：「鏟妖，鏟妖，鏟呀！鏟呀！這裏有一隻，那裏有一隻，沒有一隻可以擋我的寶劍一斫的」。他完全變成了一個瘋子。到了這一場大病過了，秀全的身體恢復了康健，他的人格與外貌都日漸改變。他的品行謹愼，行爲和藹而坦白，身體增高增大，步履端莊嚴肅，其見解則寬大而自由，與病前比較判若兩人。後來他在隣近的鄉村中一連做了六年的塾師。

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秀全在隣村教館，時在五月，一天，有個中表李某在他的藏書中抽出那部塵封

巳久的勸世良言借去閱覽。李某讀完全書之後還給秀全，說這部書內容極奇，和中國的經書大大不同，秀全纔潛心去細細的閱讀。秀全讀了忽地大覺大悟，他在這部書中尋得解釋他六年前病中夢兆的關鍵，以爲書中所言和他夢中所見相符之處很多。這時，他纔明白高坐寶座之至尊的老人而爲人人所當敬拜者就是天父上帝；那個中年人曾教他助他誅滅妖魔者，就是救主耶穌。妖魔就是偶像，而兄弟姊妹就是世間的人類。有此覺悟，秀全如夢初醒，他覺得已獲得上天堂之眞路，與及永生快樂之希望，甚爲歡喜。洪李二人由是書而知受洗禮的必要，於是依照書中所言，及按這時他們自己所明白此典禮者，自行施洗。他們復向上帝祈禱，許願不拜事邪神，不行惡事，而恪守天條。他們於是自己灌水於頂上，自己說道：「洗除罪惡，去舊從新」。既畢，他們覺得滿心充滿快樂，秀全乃自製悔改詩道：

吾儕罪惡實滔天，幸賴耶穌代贖全，勿信邪魔遵聖誡，惟從上帝力心田。天堂榮顯人宜慕，地獄幽沈我亦憐，
及早回頭歸正果，免將方寸俗情牽。

自此以後，秀全便把偶像掃除，塾中的孔子牌位也丟去，並且，在村落中到處向人宣傳他的新教。他自信他自己確爲上帝所特派以拯救天下使回到敬拜眞神上帝之路的領導者。這樣，這個給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做團結民衆發動民衆的原動力的新宗教——上帝會，就如此由於一部宣傳耶穌教義的小册子——勸世良言——的啓示，在一個屢試落選的失意的窮書生的手中創立起來。（註六）

到了上帝會創立後的第二年，就是道光二十四年，在這一年的初春，秀全因爲既不事偶像，又將書塾中孔子牌位除去，所以本年便失了教席。他家計貧困，無以爲生，而且受了聖經「從來未有先知受人尊敬於本鄉及家中的」之句的影響，於是決意離鄉，與他的同志馮雲山作伴到隣省廣西去宣傳眞道。這兩個青年人，離了他們的家鄉，走上蠻荒的征途，在那邊疆的省分，荒山野嶺的村落裏，一點一滴地散播他們的種子，不到六年的功夫，就做出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出來。

（註一）洪秀全入廣西的年代，有兩種說法：一爲西人記載，簡又文先生譯韓山文（Theodore Hamburg）的太平天国起義記（The Vissions of Hung-Siu-ts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爲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正月燈節後失了教席，纔決心遠適異省。一爲中國方面記載，平定粵匪紀略定爲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龍啓瑞上梅伯言先生書則記爲道光十四五年。光緒貴縣志引潛齋見聞隨筆所記馮雲山入貴縣宣傳礦工年代，爲在楊曾惠做縣令的時代，考貴縣志職官欄楊曾惠曾三任貴縣知事，其最後一任年代爲道光十八年至二十年，據潛齋見聞隨筆所記，則馮雲山的到貴縣年代必在道光二十年以前。總之，中文記載洪秀全入桂年代都在道光十六年左右，道光二十年以前。按中文記載以潛齋見聞隨筆爲最有力，此書著者梁廉夫乃道光間貴縣人，其時居在貴縣，以當地人記當地當時事，其言當值得我們相信。但韓山文所記，乃據自洪秀全族弟洪仁玕的口述，且書中有一最要之點值得我們注意，即稱洪秀全創立新宗教乃在他大病夢見異象之後的第六年。按三字經記秀全做異夢之年爲丁酉年，即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韓山文所記亦同。則洪秀全之創立新宗教乃在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其入桂時代必不得在此年以前。中西記載都有可以致信之處，而韓山文所記似更可信。本書姑從韓記，並附記中文記載於此，以供讀者參考。

（註二）洪秀全本鄉村名據簡又文先生遊洪秀全故鄉所得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見逸經第二期。

（註三）洪秀全生日據賊情彙纂東王楊秀清通令官民進獻珍寶慶祝天王生日的誥諭。

（註四）洪秀全的父名及原生的母親都據簡又文先生遊洪秀全故鄉所得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李秀成供狀稱秀全兄弟三人同父各母，與此異，此處從簡文。

（註五）據韓山文太平天国起義記。

（註六）本節記載據韓山文太平天国起義記及洪秀全頒佈的三字經。

二　洪馮入桂時代的廣西

當洪秀全馮雲山入廣西的年頭，鴉片戰爭剛纔過去，未來的大難又行將到來，中國社會已經到了百孔千瘡大癰將潰的時期。這時候，客觀的革命條件已經具備，舊社會的崩潰已成爲不可避免的命運。而在僻處西南邊隅的廣西省更如向陽的園地一樣，革命的種子在那兒卻先已到處爆發，到處滋蔓，造成了一個無政府的暴民統治的世界。

大革命的醞釀與爆發所以起自廣西的原因，當日親見的人士論爲由於廣西官吏的放任。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嚴正基在論粵西賊情兵事始末一文中說道：

粵西……吏治之不飭，則由於十數年前院司以文酒徵逐爲豪舉，於地方懲辦盜案之員，目爲俗吏，或加之擯斥，有司諱匿不報，遂至盜勢益張，涓涓不塞，終成江河，厥有由來。（註一）

這種現象，我們可以叫做「放任的政治」。按嚴氏所指的撫院，便是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巡撫廣西的梁章鉅。他是造成廣西放任政治局面的人。撫桂五年，到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始他調。繼梁氏撫桂的爲周之琦，周氏對於梁氏已成之局並不曾有所改變。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周氏去職，鄭祖琛繼任。鄭氏崇佛，有佛子之稱，放任的局面到了他的手裏，更變本加厲地釀成了無政府的局面出來。

這種以文酒徵逐爲豪舉，視懲辦盜案者爲多事的政治主張，我們從表面上看去，似乎不過是當日廣西二三大吏們的所謂名士風流的行動，但骨子裏卻實有其背景。咸豐初，臨桂人龍啓瑞上梅伯言先生書中曾經痛論道：

近年變端，殊大非前時意料所及。然先生文集中上汪尚書書已言之，良佩深識遠見。抑某竊有進者，姦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察一結盟聚黨之姦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擔代處分，又樂以容忍欺飾爲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毀飭之，使逆知吾意不敢爲。然督撫亦非，眞以爲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埸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毫髮細故，輒請動用。……爲督撫者類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遷擢，不能不借助於宰相，如不諾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戒，莫敢復言。蓋以某所聞，皆如是也。金田會匪萌芽於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爲樂。繼之者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則所謂窺時相意旨者是也。（註二）

龍氏的話，把梁章鉅之流爲着個人容身固寵計算而不得不逢迎君相意旨以採取放任政治的政策的心理，真個刻畫得入木三分。因爲當日廣西以邊疆之地，爲各省奸宄所聚，乃是個多事的省分。他們既無法來肅清匪亂又值鴉片戰後，清廷上下都以暫得苟安爲幸事之日，他們便不得不出此一著。這種放任政治的風氣，初時還只是畏治盜案，後來並把民事也看做俗務。於是在這個局面之下，廣西社會就釀出了下面兩種大變故：

（一）客土械鬬　「客」就是指從廣東嘉應州一帶移殖入廣西的客家人，「土」就是指廣西土著的居民。土人以耕種爲生，客家人到廣西來也是爲着墾殖田地，他們都是藉土而耕，所以到了人與地隘的時代，當然不免會時有利害衝突發生。而且，械鬬之風，又本是閩廣流行的風氣。因此，他們每爲着土田疆界等事，甚或睚眦小怨便常常掀起血鬬。這種因小故而起的械鬬，倘使有賢良的州縣官來替他們排解，自然不會擴大。但當日廣西州縣都仰承院司鼻息放任以爲治，把民間械鬬看做不當一回事；而貪官汚吏反借這個機會來橫索賄賂，於是客土間都不得其平，各結黨尋仇，尤其是客家人方面儼然形成了一個集團，在械鬬中，他們培植起了他們的實力。（註三）

（二）民變蠭起　廣西是個邊疆的省分，向來「劫掠莽伏之風，匪伊朝夕」，（註四）而自梁章鉅撫桂後，官吏畏於緝捕，盜賊更無忌憚。鴉片戰爭事起，廣東辦理防務，事定後，壯丁失業，水陸撤勇又勾結各省游匪潛入廣西來水陸橫行，劫掠村墟，截河抽稅。同時，天地會也乘時入廣西結盟拜會，密圖起事。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雷再浩在湖南起事，廣西各地黨徒都聞風響應。這時候的廣西，已經成爲叛徒們的「梁山泊」。到了道光二十九年

（一八四九）春天，廣西遇到了一個米價飛騰的年頭。（註五）在變動的社會中，再加上了食糧騰貴的恐怖，因此在那破碎的農村裏，又流離出一批批的饑民，他們千百成羣顛沛着，彷徨着，弱的向富豪伸出乞憐的手，強的竟聚衆鼓噪，沿門強索錢米。而那些處在危巢之上的富紳們，他們一方面更高擡米價以製造食糧騰貴的市場，另一方面又請州縣出示准許他們對付那些向他們強索錢米的饑民格殺勿論，用礮火來向赤手空拳的饑民橫加掃射，以保護他們身家的安全。（註六）在這個富豪與饑民對抗的情形之下，天地會與暴徒們都乘機起來，整個社會都走上了動亂的路。他們或以「替天行道」的口號來喚起羣衆，或以「劫富救貧」的旗幟來號召饑民，而貴縣大盜張嘉祥那四句——

上等的人欠我錢，
中等的人得覺眠，
下等的人跟我去，
好過租牛耕瘦田！（註七）

有名的口號，更是博得饑民與下層社會羣衆的擁護。當日嘉祥旗幟到處，民衆都踴躍加入，聲勢大振，潯州、橫州、賓州等州縣都給他騷動。（註八）同時，湖南天地會李元發又正在這個嚴重的時候攻入廣西來，於是狂波所到，反清的集團，到處起事：在慶遠的有張家福、鍾阿春，在柳州的有陳阿貴、陳阿分、陳山豬箭，在武宣的有梁阿九、劉官生，在

象州的有區振祖。其餘遙屯蟻聚的還有數十股。他們大概都是天地會的山堂，他們以天地會的名義起事而各自爲戰。他們任意戕官殺吏守街派捐佔據市鎮與州縣。

這兩個大變故都給太平天国金田發難預先貯滿了火藥，裝上了火線。洪秀全、馮雲山到廣西去，就在這樣的一個布滿革命種子的環境之下，去醞釀他們的革命運動，去發動他們的革命運動。

(註一)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八十一。

(註二)經德堂文集卷三。

(註三)據清史列傳周天爵傳李濱中興別記引周天爵致鄉人書，及參考龍啓瑞經德堂文集卷二專四團練輯略序。

(註四)嚴正基論粵西賊情兵事始末文中語。

(註五)道光二十九三十兩年，廣西全省米價騰貴，方志所載，私家所記，故老所傳都同。惟米價騰貴的原因是否由於災荒，則不可考。據道光朝東華續錄並無廣西報災的記載，據廣西方志僅貴縣志記有道光二十八年貴縣蝗災，而容縣志則記道光二十九年「歲非大歉」，北流縣志在同年的紀事裏也只有米價騰貴的記載而未言其故，姑記於此，以待博考。

(註六)據容縣志卷二十七。

(註七)手鈔本雙脊山荊棘叢談。

(註八)張嘉祥就是後來的江南提督張國樑。國樑是他招安後的改名。嘉祥在道光二十九年連敗清軍，後降於南寧協副將盛鈞，隨向榮差遣，以戰功著名。

三　金田發難

太平天国起事的地方叫做金田。金田是廣西省潯州府桂平縣的一個小村，離府城北五十多里。村後高峻的紫荆山峯迴嶂疊地蟠據着。在紫荆山中，有小路東通平南，北通武宣象州，乃關隘險阻易於攻守的所在，而金田村正扼入山的路口，在金田村東出，便是大黄江口。大黄江口爲潯江下流的孔道。黔鬱兩江千里奔騰，交會於潯州府城下，到此便成爲浩蕩的大川，西阻桂平，東扼平南，南連鬱林，北通武宣象州，儼然四戰之地。在歷史上，明代大藤峽猺人侯大狗、侯公丁都曾先後據此地作亂，用以震動遠近。所以洪秀全、馮雲山到廣西來活動，便在紫荆山上設立他們的總機關，以便居中指揮各地徒衆。在金田村中，借村中豪富韋昌輝的名義，預先築營寨，挖濠溝，做軍事上的準備，以做他日發難後各地徒衆的集合地。

道光二十四年，洪秀全、馮雲山入廣西，他們向這個不安的動亂的社會裏帶來了一個未來的福音。他們以客家人的關係，得以任意出入客家人的村落以及群衆間，他們到處以教學爲名，卻暗中勸人加入他們的上帝會。凡入會的一律平等，男稱兄弟，女稱姊妹。獨拜上帝，不得禮拜偶像。拜上帝的無災無難，天堂享福；不拜上帝的蛇咬虎傷，永沈地獄。這時農村一般群衆，正陷於水深火熱的禍亂中，他們在這無援無助的絕望的當前，忽地聽到了這麼一個福音，把他們目前的慘痛麻醉着了，他們又誰能不憧憬於未來的天堂以求得救呢！因此，不久之間，洪秀全、馮

雲山兩人在孤伶伶的人間旅途上，便獲得了廣大的羣衆的同情與擁護。到了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上帝會的勢力在地域方面，以桂平紫荊山爲中心，西到貴縣，東到平南藤縣，南到博白陸川，北到武宣象州，在黔鬱兩江流域千里之間的村落和山嶺裏，都散播了上帝會的種子。在人物方面，自富農子弟的石達開，做礦工的秦日綱，燒炭的楊秀清、蕭朝貴，以至士紳胡以晄、韋昌輝，儒生盧賢拔，訟棍黃玉崑，當舖老板周勝坤、吳可傾、林鳳祥、李開芳等所代表的各式各樣的社會裏都有接受上帝會宣傳的人，而以貧農和從農村流離出來的饑民或從貧農分子化身的流民、苦工、地痞、土棍爲其基本羣衆。於是太平天国的醞釀運動，到此已經到了水到渠成的時期，祇要等待一個機會的到來便爆發了。

就在道光三十年這一年的初冬時候，紫荊山前，大黃江上，有個專司緝捕的大黃江巡檢，這人叫做黃基。黃基是個貪婪的人。他被派帶兵勇往捕大盜陳阿貴回來，在紫荊山脈中的一個小山，叫做鵬隘山的下面經過。（註一）他帶領着一班無賴兵勇，用向來魚肉一般鄉人的手段要來勒索鵬隘山中燒炭的工人。這一羣勞苦工人，他們都早已接受了上帝會的宣傳，楊秀清、蕭朝貴便是他們的領袖。他們原是一堆革命的火種，這時無端給清兵橫加逼迫，於是便立刻把他們反抗的烈燄點着了起來。他們不約而集合的有一百三十多人。兵勇奈何他們不得，恨恨而去。有的故意大罵道：「奴才，拜上帝會的要造反，大兵就到了。全家鏟的，千剮萬剮的！老子要的錢若那時還能少分毫，不好等着看，再算帳！」這些毒咒給這班工人們聽了，他們更憤恨極了，大家鼓噪起來，紛紛商議應付的辦法。

先是洪秀全見廣西變亂已到處爆發，他也乘機密圖起事。他自己預先避到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密藏，而把紫荊山方面發動的事交馮雲山負責指揮。這時候，馮雲山得到了兵勇激怒羣衆的消息，他趕到加入這羣激憤了的羣衆中，他把他們領到金田村韋昌輝家去。他們在昌輝家大門前的廣場上集合，大家商量來應付目前的事變，一種不安的騷動立刻充滿在這個小村莊裏。雲山看見羣衆激憤已經到了沸點，知道時機已經成熟了，他就乘勢激變他們道：『衆兄弟們，請聽我說。現在，妖魔（註二）就要殺來了，我們要下地獄了！衆兄弟們，請你們想，細細的想：我們要等待妖魔來吞噬我們呢？還是秉天父的意旨大家起來誅滅妖魔，以求現世的平安與來世的光榮呢？想啊，衆兄弟們，我們祇有這一刻，我們祇有這一刻啊』！雲山的話剛纔說了，立刻『我們要誅妖』！『我們要誅妖』！一陣陣的鼓噪聲，在雲山的四周如雷的響應起來。於是金田發難的序幕便如此開展了。

當鵬隘山燒炭工人憤聚金田時，附近鄉團走報桂平縣知縣李孟羣。孟羣叫鄉團回里設法解散。鄉團調解的事還不曾進行，又有大黃江巡檢兵勇截留上帝會信徒陳玉書妾的事發生。陳玉書是桂平上灣的富人。他正在這個轟天動地的序幕在開展着的時候，帶他的家人路經紫荊山前的新墟。這時，巡守新墟的防兵，正是黃基的部下。這班無賴們，因日前在鵬隘山上勒索上帝會徒衆不遂，懷恨在心，知道陳玉書是上帝會信徒，就截留玉書妾來洩怨。玉書走報金田，徒衆憤恨更無可壓抑，大家一致決定：立刻集合紫荊山一帶的徒衆，同時，通令各地徒衆赴日來會，共舉大事。於是這一枝反清的追求人間天国的太平天国的旗幟就高揚於廣西省桂平縣金田村上。時，正道光

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註三）

（註一）鵬隘山李秀成供狀作平隘山，洪秀全詔旨作平在山，此處據潯州府志。世人著作多誤作鵬化山，按鵬化山乃桂平平南交界的一個山，而不是桂平武宣交界的紫荊山脈中的鵬隘山。

（註二）太平軍稱清軍清吏爲妖。

（註三）金田起事的日子有四種不同的說法：（一）光緒潯州府志繫在道光三十年夏四月紀事下，（二）李秀成供狀記爲道光三十年六月，（三）嚴正基論粵西賊情兵事始末記爲道光三十年十月，（四）無名氏金陵癸甲摭談記爲十一月初十日。綱按潯州府志因誤從平桂紀略記陳阿貴被捕在道光三十年正月，而所記金田發難的導火線乃起自捕陳阿貴歸來的兵勇，故把起義的日子繫在離正月不遠的四月紀事裏。考咸豐朝東華續錄陳阿貴被擒在道光三十年十月，故潯州府志所記日子顯然是錯誤的。李秀成是在廣西加入太平軍的人物，嚴正基是當日清朝軍前從征的大吏，他們的記載都值得我們相信。但第四種說法，更值得我們相信，因爲金陵癸甲摭談的作者曾得見太平天国實錄，實錄所記自道光二十八年戊申起到入金陵止（據作者自述），其記載自較其他諸說爲可靠。而且，我們以金陵癸甲摭談所記起事的日子，來和潯州府志所保存的因捕陳阿貴的兵丁路過鵬隘山激變燒炭工人的傳說相印證，時間適相符合。故本書金田發難的日子從金陵癸甲摭談所記，而金田發難的經過，則全據光緒潯州府志。

第四章　十五年戰爭的經過（上）

一　永安建國

自金田起事消息通告各地會衆後，各地上帝會徒衆都紛紛來會。其中最先到來的是那枝在貴縣北山里山中做礦工的數千靑年會衆。這枝隊伍，行到半路，與另一枝因械鬬戰敗無家可歸正在挈家投奔洪秀全的貴縣客家羣衆三千人及從博白來會的會衆相遇，他們會合在一處，浩浩蕩蕩加入金田來。跟着，桂平民變首領蘇十九聯合桂平客家羣衆，陸川賴九率領鬱林各屬上帝會徒衆，揭陽羅大綱率領潯江水盜都先後加入金田。於是在金田起事之初，太平軍就已經造成了如火如荼的勢力。在當日廣西的民變中，它是異軍突起；它有嚴密的組織與訓練，並且另有一個天堂樂國的共同目的在追尋。所以天地會的領導羣衆的領袖地位，便不得不被後來居上的太平軍所奪取了。

金田發難的佈置既定，馮雲山、楊秀淸往花洲迎洪秀全歸。次年，即咸豐元年（一八五一）二月，太平軍東出大黃江，洪秀全稱太平王於此。三月，北出武宣象州。六月，折回桂平新墟，扼紫荊山，據新墟，與淸軍相持。八月中秋，放

火燒新墟，全軍東出，大敗清軍於平南官村。清廣西提督向榮最先率軍退守平南城，諸軍相繼敗退。於是太平軍乃從平南經藤縣北出攻永安州，於閏八月初一日佔領永安。

永安州屬平樂府所轄。其地西界武宣象州，南界平南藤縣，東界昭平，北界荔浦及平樂府城，這裏，不是個險阻的地方，也不是個繁盛的州縣，祇因「永安」二字是個吉祥的稱謂，太平軍以地名的吉祥便在這個小小的山州土縣上建立國號曰「太平天国」。

太平軍建國號曰「太平天国」，其取義至爲鮮明：「太平」者，所以表示其革命的目的，「天国」者，所以表示其宗教的信仰。太平軍的經典中都曾經有過明白的解釋，所謂「太平」的意義，天朝田畝制度中說道：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煖也。……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眞主救世旨意也。

這便是太平軍所謂「太平」的意義的解釋，也就是太平軍革命的最終目的。這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煖」的太平世界的觀念，原是當日一般陷在水深火熱裏無衣無食多災多

難的農村羣衆所迫切追求的理想國。所以太平軍金田起事，就首揭「太平」的旗幟來號召。到了洪秀全在大黃江稱王也以「太平王」爲稱號。因此，這時候，永安建國便取「太平」兩字冠在國號之上以順應人心並表示其革命的目的。至於「天国」的意義，在新遺詔聖書馬太傳第四章「天国近矣」下注釋道：

天国是總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誤認單指天上天国。故天兄預詔云，「天国邇來」。蓋天国來在凡間，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創開天国是也。

從這一節注釋裏，最可以看出「天国」的意義。因爲洪秀全旣認「天国」是總天上地下而言，天上地下都同是神父「天国」，所以他創建新國，其新朝國號便明揭出「天国」兩字來表示其宗教的信仰，總之，「太平天国」四字，乃是太平軍所建的理想國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主張，與宗教的信仰最鮮明的表徵。

太平軍旣建國號曰太平天国，洪秀全也進號曰天王。卽以這一年爲太平天国元年。於是論功封爵，以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其餘有功將士都封爵有差。天王乃下詔道：

欽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各宜認實眞道而行。天父上主皇上帝，纔是眞神，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非神也。天父上主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樣樣上。又無一人非其所生所養，纔是上，纔是帝。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不得僭稱上，僭稱帝也。繼自今衆兵將呼稱朕爲主則止，不宜稱上，致冒犯天父也。天父是天聖父，天兄是救世聖主，天父天兄纔是聖也。繼自今衆兵將呼稱朕爲主則止，不宜稱聖，致冒犯天父天兄也。

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神爺，是认爺，前此左輔右弼前導後護各軍師朕命稱爲王爺，姑從凡間歪例，據眞道論，有些冒犯天父，天父纔是爺也。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爲東王，管治東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軍師爲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導副軍師爲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後護又副軍師爲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達胞爲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另詔后宮稱娘娘，貴妃稱王娘，並欽此。

這封詔書再三伸述當日所以稱爲天王而不建帝號的緣由，具見太平軍宗教信仰的濃郁。至於詔書中明令諸王都受東王節制一點，日後楊韋之亂的動機，已經種因在這個時候。

太平天国自建國號，行封爵後，數月間，頒布天朝田畝制度、定稱謂、改曆法、易服色、禁兵將私藏金錢，令人民蓄髮等詔令，相繼頒行。於是規模漸立，煥然一新朝了。

二　建都天京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二月，太平軍棄永安北出，大敗清軍於永安州的古蘇冲，乘勢進逼桂林。圍桂林一月，不能陷，乃解圍去，出興安，陷全州，悉銳以入湖南。

在北出途中，太平軍沿途頒布三道檄文，一曰奉天誅妖檄文，二曰諭救世人檄文，三曰奉天討胡檄文。其奉天誅妖檄道：

眞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爲奉天誅妖救世安民事：據舊遺詔聖書天父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出□人物，皇上帝是神爺，是魂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天下萬国，俱有記及皇上帝之權能。溯自皇上帝造有天地以來，皇上帝大發威怒屢矣，爾世人還未知乎？皇上帝第一次大怒，連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横流矣。第二次大怒，皇上帝降凡救以色列出麥西国矣。第三次大怒，皇上帝遣救世主耶穌降生猶太国替世人贖罪受苦矣。今次又大怒，丁酉歲，皇上帝遣天使接天王昇天，命誅妖，復差天王作主救人。戊申歲，皇上帝恩憐世人之陷溺，被妖魔之迷纏，三月，上主皇上帝降凡，九月，救世主耶穌降凡，顯出無數權能，誅盡幾多魔鬼，場場大戰，妖魔何能鬬得天過。且問皇上帝何怒？乃怒世人拜邪神，行邪事，大犯天條者也。爾世人還未醒乎？生逢其日，得見皇上帝榮光，爾世人何其大幸；生遇其時，得見太平天日，爾世人何其大幸。好醒矣，好醒矣！順天者存矣，逆天者亡矣。

今滿妖咸豐，原屬胡奴，乃我中国世讎，兼之率人類變妖類，拜邪神，逆眞神，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誅者也。嗟爾團勇，不知木本水源，情願足上首下，瞞高天之大德，反顏事讎，受蛇魔之迷纏，忘恩背主，不思己爲中国之善士，本屬天朝之良民，竟輕舉其足於亡滅之路，而不知愛惜也耶！況爾四民人等，原是中国人民，須知天生眞主，亟宜同心同力以滅妖，孰料良心盡泯，而反北面於讎敵者也！

今各省有志者萬殊之衆，名儒學士不少，英雄豪傑亦多，惟願各各起義，大振旌旗，報不共戴天之讎，共立勳

王之勳，本軍師有所厚望焉。本軍師體上帝好生之德，痌瘝在抱，行仁義之師，胞與爲懷，統帥將士盡忠報国，不得不徹始徹終實情諭爾等知悉也。獨不思天既生眞主以御民，自必扶天王以開国，縱妖魔百萬，詭計千端，焉能同天打鬭乎！但不教而誅，問心何忍；坐視不救，仁者弗爲。故特剴切曉諭，爾等凡民亟早回頭，拜眞神，丢邪神，復人類，脫妖類，庶幾常生有路，得享天福，倘仍執迷不悟，玉石俱焚，那時噬臍悔之晚矣。切切特諭。

其諭救世人檄道：

眞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諭救一切天生天養凡屬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者，又諭救一切中国人民，從前不知大義，悞幇妖胡，自害中国者曰：爾等盡是上帝子女，爾等知否？本軍師實情諭爾等，爾等肉身，是爾凡肉父母所生，爾等靈魂，是上帝所生，上帝是本軍師親爺，亦是爾等親爺，又亦是天下萬国人民親爺，此所以古語云：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也。今爾等丢親爺拜魔鬼，魔鬼是上帝親爺讎敵，亦是本軍師讎敵，又亦是爾等及天下萬国人民讎敵。魔鬼者何？就是爾等所拜祭各菩薩偶像也。各菩薩偶像者何？就是蛇魔紅眼睛「閻羅妖」之妖徒鬼卒也。蛇魔紅眼睛「閻羅妖」者何？就是皇上帝當初造天造地之時，所造生之老蛇。今既變爲妖怪，能變得十七八變，東海龍妖亦是他，正是妖頭鬼頭，專迷惑纏捉凡人靈魂，落十八重地獄，做他妖徒鬼卒，聽他受用淫汚者也。

爾等靜想，魔鬼旣是專迷惑纏捉上帝子女，就是專迷惑纏捉本軍師弟妹，非是本軍師讎敵，亦是爾等及天

下萬国人民讎敵而何？夫魔鬼既是讎敵，焚毀之不暇，反伸首就他，任其纏捉，俗語云「豆腐是水，閻羅是鬼」，又俗語云「走鬼走入廟」，爾等聽過否？爾等果有靈心未死，將此等俗語靜想，亦可以翻然醒悟，追悔丟了親爺莫大之罪，且中了讎敵詭計，後來墜入地獄沉淪，聽魔鬼淫污，狗咁賤，賤過狗矣。

今天父上主皇上帝恩憐凡人中魔鬼毒計，丁酉歲差天使接天王昇天，上帝親命天王誅妖，復差天王降凡，作主救人。戊申歲，三月上帝降凡主張，九月天兄耶穌降凡採救，今既五年矣。本軍師不實情諭明爾等，爾等無知反天逆天，致陷地獄，受千年萬萬載永苦，本軍師問心何忍，故今特剴切諭明爾等，速卽丟魔鬼歸親爺，方可受天爵祿也。本軍師又實情救爾等，爾等多是中国人民，既是中国人民，何其愚蠢，雉髮從妖，胡衣胡服，甘做妖胡奴狗，足上首下，尊卑顛倒，爾等知否？以中国制妖胡，主御奴也，順也；以妖胡制中国，奴欺主也，逆也。中国甚大，諒多明識大義之人。今幸上帝大開天恩，差天王降凡，作天下萬国太平真主，特諭中国人民，從前悞在妖營幫妖逆天，今聞本軍師諭，有能卽明大義，約同中国人民，擒斬妖胡頭目首級，親到天朝投降者，本軍師不獨赦宥爾等前愆，且將奏明天父，有大大天爵天祿封賞爾等。我主江山萬萬年，爾子爾孫世襲官爵萬萬年，且爾等本身既認識上帝親爺，脫鬼成人，在世榮耀無比，在天享福無疆，永遠威風，永遠尊貴，豈不勝過幫妖變鬼，生則受鬼迷纏，死則作鬼奴卒，受其淫污惡毒，變成大腫痳瘋，變成難看惡鬼，永遠在十八重地獄，受無窮無盡苦楚也。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如有能辨之人，速卽反戈替天誅妖，以遵上帝主

意，上帝幸甚。其自高天以下，實嘉爾等同心翊贊之力，本軍師決不食言，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各宜遵行。

其奉天討胡檄曰：

眞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爲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若曰：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爲怪，中国尙得爲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国之無人也！

夫中国首也，胡虜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虜妖人也。中国名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眞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虜目爲妖人者何？蛇魔「閻羅妖」，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国悉變妖魔，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汚，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彌天罪孽，予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国之人變爲禽獸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倫，前僞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

盡爲胡種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汚，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汚舌，是盡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條律，使我中国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国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言語，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国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莩流離，暴露如莽，是欲使中国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汚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興復中国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国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無所不用其極，巧矣哉！

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国，苻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兄堅使不攻中国。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惡極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乘中国之無人，盜據中夏，妖座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犁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艴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国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於十萬，亦孔之醜矣！

今幸天道好還，中国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而九五之眞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袒之心；或爲官，或爲民，當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詔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奬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妥懽於應昌，與復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韃子咸豐來獻者，或有能斬其首級來投者，或又有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国，誰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蝥弧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英雄無比，在天榮耀無疆，如或執迷不悟，保僞拒眞，生爲胡人，死爲胡鬼，順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上帝於高天乎！予興義兵，上爲上帝報瞞天之讎，下爲中国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這三道檄文，前兩道是敷陳教義，勸人丟邪神拜上帝，是專對一般民衆說的；最後一道是闡明民族觀念，痛述滿人壓迫漢族種種罪惡，以引起漢人的同仇敵愾，是專對士大夫說的。當日檄文所播，勢挾風雷，義聲所到，各地響應。五月，遂取道州。六月，分軍取江華、甯遠、嘉禾等縣，並陷桂陽州。七月，陷郴州。郴桂一帶工人、會黨、流氓、土匪，從者如歸。於是急趨長沙，圍兩月餘不能下，乃轉攻岳州，以十月陷岳州。十一月，下長江，占領北岸的漢陽，封鎖南岸的武昌省城。

十二月，占領武昌。在這裏過了幾年，整頓艤裝，然後蔽江直下，沿途勢如破竹，由九江之陷，至安慶之陷，不出一星期，蕪湖至太平不過一日。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二月十日，太平軍遂佔領金陵。在此建爲國都，號曰「天京」。計自金田起事至此，爲時不過兩年三個月，便以疾風迅雷之勢席捲了東南。

太平軍既定都天京，乃立法安民：首先嚴定男女隔別的制度，使男歸男行，女歸女行。復立諸匠營與典官處的制度，以收容百工，使百工技藝各有所歸。凡入民願隨營者隨營，不願隨營者各歸民家。凡安民之地，將兵有敢入民房者斬不赦。法嚴令行，民心悅服。至於軍政大事，在東王楊秀清總攬之下，整軍經武，除舊佈新，事事嚴肅，燦然一新國氣象。時英、法、美各國駐華負責者，聞太平軍建都天京的消息，都到天京來訪問。他們對太平軍的秩序與其訓練普及於民衆的情形，非常的驚佩，都以革命軍看待太平軍，因各以實在情形報告其政府，一致的主張在太平軍與清軍對抗之間，保守嚴格的局外中立。此時的太平天国實在已經取得了國際的地位。同時，各地民衆相繼響應：長江以北，皖豫之間，則捻衆蜂起。長江以南以至珠江流域，則天地會到處起事。捻首爲李士林、劉疙瘩、劉元吉、任二皮、聾瞎子，而張樂行尤爲羣捻之魁。天地會以起廣東佛山的陳開，起福建廈門的黃威，起上海的劉麗川爲首，而劉麗川的佔據上海，自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九月至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正月，爲時一年四月，更給清軍以嚴重的打擊。此外，各地不逞之徒，也動輒貼太平天国的誥諭，張太平軍的旗幟。甚至乞兒偸盜三五成羣，也敢倡言謀亂，毫無忌憚。於是太平軍乃乘此時勢，陳師未久，乃從新都先後分軍出征：一方出河南路山西以壓燕薊；一方由安徽

攻江西，以爭長江的上游，革命的高潮，立刻震盪到了整個的中國。

三　湘軍的興起與前半期的戰局

在這樣的一個大動亂的時代中，滿清政府的政權，已從動搖而日趨於崩潰。本來，在金田發難還沒有起來的時候，滿政府對廣西民變便已經手足無措，沒有方法應付。最先的欽差大臣爲林則徐，而則徐道歿。則徐死時，太平軍已起，乃以李星沅繼之，星沅與廣西巡撫周天爵不和，不久又因病發死於軍前。代李者爲大學士賽尙阿，賽復以庸懦失機，當太平軍圍長沙時被黜。於是又以兩廣總督徐廣縉代賽尙阿，徐氏又在武昌陷落時被革。期年之間，將帥屢易，前方軍事，遂成泛駕之局。徐氏既被逮治，乃以前廣西提督向榮爲欽差大臣，統率江南諸軍，並命河南巡撫琦善爲欽差大臣，從河南進兵長江。向榮在太平軍入金陵後的十天始抵金陵城外，結營城東孝陵衞，是爲「江南大營」。而琦善也率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各軍進至揚州，與直隸提督陳金綬，內閣學士勝保分營城外，是爲「江北大營」。這兩路淸軍，結營敵人的城下，簡直有類於矮子看戲，他們眼看着太平軍從城上分兵北伐中原，轉戰上游，而從不能稍限敵人的馬足。這時候，滿淸政府的政權已經到了日暮窮途的境地。正在這個最後關頭的時候，在士大夫統治的社會裏面忽地突起了一個新勢力，來向太平軍作殊死的鬬爭，漸漸的把革命勢力壓倒以至於撲滅。這個新勢力就是近百年史上有名的湘軍。

湘軍的領袖是曾國藩。國藩湖南湘鄉人，生於一個世代力農的小地主的家庭。他在道光十八年戊戌（一八三八）年二十八歲時就成進士，選庶吉士，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散館授檢討。以後官位日高，由侍講侍讀擢升內閣學士，歷任禮兵刑吏各部侍郎，又做過好幾次主考閱卷大臣。自道光二十三年到咸豐二年（一八四三——一八五二）丁憂回籍之日，前後十三年，他過着一帆風順的得意的仕途生活。他是士大夫社會裏的一個傑出的人材。他出自田家，他始終保持着他的勤儉的家風。他來自理學的故鄉，他不曾受到乾、嘉漢學末流的錮蔽。他到了京師，又得師友交游的啓示，而以受倭仁、唐鑑的影響最深。仁、鑑都是當時最著名的理學家，國藩跟他們講求義理之學，從他們學來主靜愼獨篤行實踐的工夫。所以這一段達官顯宦的生活，不但不曾毀滅了國藩的前途，反之，給國藩以學養的機會。舉凡國藩一生功業上的成就，所謂「耐」字訣、「恆」字訣、「拙」字訣、「誠」字訣，以及「紮硬寨打死仗」的精神，都是在這時期修養成的。並且，十多年的仕途生活，更給國藩認識士大夫社會的種種弱點，在金田起事的前夜，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三月初二日，他在應詔陳言疏裏，便已經痛切的指出當日士大夫的畏葸的柔靡的積習，以爲「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註一）他不但痛切陳言，而且還要以他個人的「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爲己任。（註二）到了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奉命典江西鄉試，以丁母憂歸。這時候，太平軍已連陷岳州漢陽，圍武昌，大江南北，民變蠭起。清廷詔諭湖南巡撫張亮基，令國藩幫同辦理本省團練，搜查土匪事宜。十二月二十一日，國藩奉命馳抵長沙。國藩到長沙的第二天，他就上疏力陳綠營不可用，

團練也不可恃，主張「今欲改弦更張，宜以練兵爲要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倣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註三）於是這個初時目的不過在勦捕本省土匪，後來居然藉以平定大亂的湘軍，就已經決定在曾國藩初出肩任巨艱之日。

湘軍的領袖曾國藩，是士大夫社會裏的傑出的人物。湘軍的幹部人物，則爲曾國藩所物色出來的還帶「鄉氣」的能勞苦有血性的儒生。湘軍的下級羣衆，則爲土著的農夫。湘軍的訓練，則以儒家的仁字禮字的精神去教訓。曾國藩自述訓練軍隊的方法道：

帶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仁者，即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發達之心，則人知恩矣。禮者，即所謂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註四）

所謂仁，就是儒者待下民的恩惠，所謂禮，就是儒家的法度，即上下尊卑之分。仁以撫衆，禮以威下，所以初期的湘軍，實可說是含有儒教色彩的軍隊。至於湘軍的精神與信條，我們從曾國藩的討粵匪檄中，更分明的看得出來。檄文道：

爲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

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衆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衆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敍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主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燬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燬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汚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勦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之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羣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為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註五）

曾氏此檄，一方面歷數太平軍攪亂社會的安寧，破壞中國固有的人倫與社會的制度，強迫人民信仰上帝教與焚燬神靈及寺廟。另一方面以地方性刺激兩湖三江的人民，以名教奇變刺激士大夫階級，以神佛刺激下級羣衆。湘軍的幹部人物為儒生，儒生階級所恃以為護符者為名教，湘軍的下級羣衆為農夫，農夫所信仰者為神佛，故曾氏此檄能夠同時喚起儒生與農夫的同情，教他們各為自己的地位或信仰而向敵人一致的鬬爭。湘軍的精神在此，

湘軍的信條也在此。所以湘軍與太平軍這兩個壁壘的鬪爭，一方面我們可以說是宗教的鬪爭，因爲湘軍的信仰是儒教與道教和佛教，而太平軍的信仰則爲上帝教。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鬪爭，因爲湘軍所代表者爲地主，而太平軍所代表者爲貧農，地主是要維持固有的社會制度，而貧農則企圖推翻現狀而另創一個平等的地上天國。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十二月末，曾國藩以湖南巡撫張亮基所檄調的湘鄉團丁爲基礎成立湘軍於長沙，號曰『湘勇』。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春平土寇於衡山，破太平軍支隊於桂東。其夏太平軍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鄉勇二千，寶慶勇千人，以羅澤南等率之東援，是爲湘軍越境作戰之始。其冬，國藩奉命籌備舟師，乃增募湘勇水陸萬人。咸豐四年（一八五四）二月，湘軍水陸夾湘而下，建旗東征。這時候，太平軍方面，北伐軍還馳騁於黃河流域，而出征長江上游的軍隊又遇着順利的發展，咸豐三年五月再克安慶，八月陷九江，九月，入湖北。四年正月，復取漢陽，包圍武昌，大隊且越武昌而上，以二月克岳州，入湘陰，陷寧鄉，復間道襲陷湘潭。於是兩軍遂交戰於湖湘之間。時湘軍新興，初當大敵，陸軍敗於岳州，曾國藩自將的水師也敗於靖港，其間雖有塔齊布湘潭意外的奇捷，而湘軍潰散的已不少。國藩經過這一次戰爭，深知弊在不精練，乃汰舊勇爲五千人，另增募精壯數千，親加訓練，以謀再舉。是年六月，太平軍再克武昌，國藩以事急，乃進兵岳州。七月，復岳州。八月，復武昌。同時，漢陽也爲荊州方面的清軍攻入。十月，大破太平軍於田家鎮，進圍九江。是時，湘軍新起，不及兩年，即略定兩湖，且進攻江西，當武昌捷奏到北京，清

咸豐帝手敕國藩道『覧奏感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逆料所及，朕惟兢業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註六）自是湘軍威名，聲振遠近。

但是，湘軍的速戰勝利，固然是由於新銳之勢，而也由於太平軍的主力軍未到。及湘軍進迫九江，使與太平軍名將石達開部隊相遇。兩軍大戰，湘軍水師輕進，一部被封鎖於鄱陽湖內，內湖外江兩水師分隔，湘軍的行動，不能一致。陸軍也戰敗。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太平軍北伐軍林鳳祥李開芳之衆，雖已給滿蒙軍隊撲滅於直隸山東境，而長江上游在石達開指揮下聲勢復大振，二月，三克武昌漢陽上下，再入太平軍的範圍。這時候，江西形勢上下都是太平軍勢力，湘軍孤懸其間，如在甕中。於是湘軍將領羅澤南乃獻策國藩，以爲東南大勢武漢爲其樞紐，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請自帥所部巡出崇通，據上游以圖武昌，取建瓴之勢。而後內湖水師，九江陸師，合力攻湖口以截敵船之上下。國藩從其策，遣五千人隨澤南西行。是年九月，羅澤南已連克通城崇陽，十月，與湖北巡撫胡林翼合軍趨武昌，屯軍城東洪山。咸豐六年（一八五六）三月，澤南戰死，其衆由弟子李續賓代領。而江西方面形勢益急，七府一州五十餘縣，都爲太平軍所有，惟南昌、廣信、饒州、南安五郡未下，國藩孤軍居敵中，屢向湖北乞援，胡林翼乃分軍四千回援江西，於是國藩規復武漢的計劃又生一頓折，湘軍的困危至是殆達到了極點。

當是時，長江千里，上自武漢，下至金陵，都在太平軍的掌握中，新下的州縣，民衆都爭獻糧册，輸錢米，聞風歸附，

清軍所到，則罷市以拒，人心大定。至於軍事方面，太平北伐軍雖不幸失敗，但並非主力軍，清軍八旗綠營都不堪首戰，太平軍唯一的敵人唯新興的湘軍，而湘軍已陷於重重的包圍，解決並非難事。這時候，太平天国革命的成功，只在指顧間。

(註一)曾文正公奏稿卷一。
(註二)曾文正公文集卷一。
(註三)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摺，見曾文正公奏稿卷一。
(註四)見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咸豐九年六月初四日。
(註五)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註六)官軍大捷武漢兩城同日克復摺，見曾文正公奏稿卷四。

第五章　十五年戰爭的經過（下）

一　楊韋之亂

在前半期的戰局，太平軍的聲勢是疾風迅雷地勃興，是風馳電捲地在掃蕩八旗與綠營，是四面楚歌地包圍着新興的湘軍，革命的新勢力已到了紅日當天。而在滿淸政府所代表的舊勢力方面，則快到了日落西山的境地。正在這樣的一個決定兩個壁壘最終命運的關頭，太平軍方面乃有內訌的大事變發生。爲了這一件大事變，太平軍自己來摧殘自己的勢力，使敵人得有機會喘過氣重新擡起頭來向自己壁壘反攻，終歸把自己撲滅了去。這一件內訌的大事變便是在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太平軍勝利聲中，奏演的楊韋之亂。

內訌之起，在天王的猜疑心，與東王楊秀清的跋扈。先是南王馮雲山戰死於全州，西王蕭朝貴戰死於長沙，起事諸王入金陵者，只餘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三人。北翼兩王乃受楊秀清所節制，而天王自奠都天京後，深居簡出軍政都取決於秀淸，故秀清大權在手，威壓全朝。這不但天王猜疑，卽北王也心懷怨恨。但當向榮頓兵城下的時候，敵人在着目前，大家都還隱忍不敢發作。到了咸豐六年（一八五六）五月，大破淸江南圍師於天

京城外，攻陷江南大營，盡克向軍舊壘。向榮收集潰卒退走丹陽，七月，憂憤病發卒於軍。於是數年來日迫肘腋的敵人既去，太平軍中兄弟內訌就跟着起來。七月末，天王與北王合謀，計殺東王楊秀清，並殺其全家徒黨於死。一時被殺的男女，據說多至二萬人以上。翼王石達開在安慶聞變遄歸，見韋昌輝殘殺情形，責昌輝。昌輝怒，謀併殺達開。機泄，達開乘夜縋城出走。昌輝以兵入達開家，盡殺達開家人。達開至安慶，召兵靖難。達開素有人望，而將士又憤昌輝暴行，於是諸軍都從，旌旗蔽江而下，師次甯國，天王大恐，乃殺昌輝傳首以謝達開，止靖難兵，並以溫詞召達開還。達開留軍甯國，輕騎入見。羣議令輔政，如東王故事。衆心悅服。天王見達開權重功高，將士歸心，因鑒楊韋之難，對達開又起猜忌，於是用其長兄安王洪仁發，次兄福王洪仁達，並掌朝政，以分達開權柄。安福兩王承天王旨每事輒挾制達開，使不得行其志。達開不自安，遂潛出天京，另成一軍，別途發展，從此不與天王通問。於是五王之中，南王西王死於戰役，東王北王死於內訌，所餘者惟翼王石達開一人，又被迫出走，太平朝的軍國大政，只交給安福兩王和一個平庸的蒙得恩的手上管理。自是政出私門，法敝令廢，紀綱敗壞，革命羣衆人人自危，各有散意。李秀成供狀記道：

「自翼王出京之後，殺東北王之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專，因東、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因聞清朝將兵凡拿是廣西之人，斬而不赦，是以各結為團，故未散也」。一個革命的集團，到了這個地步，已離亡的末日不遠了。

這樣的一個殘局，只因為革命的禍源還在源源地奔流，好比一個潰決的大癰當膿血未乾的時候一樣，還不

能生肌收口。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太平天国的後半期就靠着變亂的局面年年由天災人禍所釀造出來的飢民流亡，在兩個後起的傑出的人物，英王陳玉成與忠王李秀成指揮之下來支持着，從咸豐七年起直到同治三年（一八五七——一八六四）前後共七年之久。

二 後半期的戰局

自楊韋內訌後，兩軍的陣勢立刻轉變，成爲湘軍壓迫太平軍的局面。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十一月，湖北方面的湘軍，由胡林翼指揮攻克武昌，兩湖總督官文也同日復漢陽。武漢既下，胡林翼建平吳必先保鄂之策，以爲『武漢形勢壯闊，自古用武之地。荊襄爲南北之關鍵，而武漢爲荊襄之咽喉。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本根既搖。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國帑因而虛糜，民生因而凋敝，東南數省受害之烈，亦惟武漢爲尤甚矣。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代平吳，久謀荊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勳，鎮守武昌。宋臣岳飛李綱之謀書，岳鄂均以此爲高屋建瓴之勢，控制長江，惟鄂爲要，固東南一大都會矣。夫善鬬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惟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返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痍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在先保鄂郡矣』（註一）於是艱苦經營，武漢乃屹然爲重鎮。曾國藩亦藉以平金陵。在江西方面的湘軍，軍勢也日有起色。及胡林翼等克武漢，李續賓乃率征鄂湘軍回援江西，佔領九江城左右之地，陳兵九江城

下。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四月，卒克九江堅城。諸府州縣亦第克復。

當是時，江西湖南二省，已不見太平軍的旗影，湖北則有胡林翼的經營，餉足兵精。清帥和春張國樑也統率江南大營，再進逼天京，江北大營復同時攻下瓜州，清軍聲勢大振。太平軍方面，陳玉成李秀成兩軍方奔命於大江南北間以救援天京；惟石達開一軍從浙江轉江西，過福建，經湖南，入廣西，長驅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咸豐九年（一八五九）秋，石達開軍徘徊於黔、桂、湘邊地間，有入四川的企圖。清廷畏達開威名，下旨令曾國藩從江西移軍入蜀防守。同時，江南方面的太平軍，在陳玉成李秀成指揮之下，形勢又一變，於前一年攻陷江北大營，大敗清帥德興阿勝保軍於浦口，跟着殲滅湘軍的名將李續賓全軍於三河，至是又與捻軍聯合，皖北震動。於是清廷又下旨令國藩暫緩入川，相機籌畫，力顧全局。國藩乃上疏論道：「伏維自古辦竊號之賊與辦流賊不同：勦辦流賊法當預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勦辦竊號之賊，法當翦除枝葉，併搗老巢。今之洪秀全據金陵，陳玉成據安慶，私立正朔，僞稱王侯，竊號之賊也。石達開等之由浙而閩，而江，而湖南，而廣西，流賊之象也；宮張諸捻之股數衆多，分合無定，亦流賊之類也。自洪楊內亂，鎮江克復，金陵逆首兇燄久衰，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句結捻匪，廬州、浦口、三河等處疊挫我師，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江南之賊糧不絕。臣等竊以爲欲廓清諸路，必先攻破金陵，全局一振，而後江南大營之兵可以分勦數省，其餉亦可分潤數處。欲攻破金陵，必先駐重兵於滁和，而後可去江寧之外屏，斷蕪湖之糧路。欲駐兵滁和，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之所必救。誠能圍攻兩處，略取旁縣，該逆備多力分，不特不

敢恐力北窺齊豫，並不敢壹意東顧江、浦、六合，蓋稱號之賊，未有不竭死力以護其本根也」。（註二）淸廷從其議，於是定進攻安慶之策。咸豐十年（一八六〇）春，湘軍以曾國荃為主將進攻安慶

安慶地當長江中站，握皖北的樞紐，太平軍自失武漢九江後，上流重鎭，惟此獨存。連年陳玉成經營皖北，聯絡捻軍，救援天京，都以此為根據地。守安慶，則大江南北軍事往還有交通的孔道，蕪湖的糧道可以源源接濟天京。安慶失，則長江千里的險阻已盡為敵有，天京的屏蔽盡撤，軍事交通，糧道運輸都有立刻斷絕之患。故湘軍圖克金陵以攻安慶為第一策，太平軍守天京也以保安慶為最後防線。在這種局面下，兩軍的大戰便開始。太平軍方面的作戰計劃，上游以陳玉成為主將抗拒東下的湘軍以救安慶，下游以李秀成為主將攻江南大營以牽制上游湘軍的行動。大戰最先開始於下游，時江南大營勢張甚，淸帥和春張國樑傍城而軍，作長圍以困天京。天京被困日緊，李秀成因出奇計，定襲杭州之策以牽動江南大營。他以為淸軍餉源在蘇杭，今天京城外長濠已成內圍外牆，淸軍但有所藉攻之急難得志，不如輕兵從間道疾擣杭州。杭州危，蘇州必震動，淸軍懼絕其餉源，必分軍奔命以救杭州。然後乘淸軍大營虛弱，還軍急擊，蹋破淸營，則天京之圍自解，而蘇杭也必都為我有。天王從其策。咸豐十年（一八六〇）正月，李秀成率精兵從蕪湖出甯國，疾趨錢塘。二月，攻破杭州。淸軍果中計，從江南大營分軍遣提督張玉良統率援浙。三月，玉良率兵來，秀成偏插新幟以疑敵，玉良不敢逼，駐離城四十里的塘棲鎭。秀成乃全軍退出杭州，星夜由餘杭過臨安，行天目山出孝豐，抵廣德。玉良軍方圖掠杭州財物，止不追，遂達建平。秀成在此大集諸路援軍以建平為

臨時大本營，指揮諸軍向清軍江南大營分路進攻。時清軍自長圍成，意謂功在指顧，取金陵如拾芥，將士益驕蹇。又以餉糈艱難，議月減餉銀三分之一，待功成補給，軍心復攜貳。而張玉良援浙一軍，遷延逗遛，路遠回救不及，兵分力單，將士更無鬭志。於是諸營相繼陷落，閏三月，清軍江南大營盡潰，清帥和春張國樑收集殘卒退保丹陽。從此大江南北的綠營已潰敗不能成軍，清廷始不得不以征討太平軍的職任專付託於湘軍，而湘軍到此委任既專，而後事權方得歸一，不久遂平大敵。故江南大營的第二次陷落，雖爲太平軍末期軍事的勝利，而實則不過促成清廷一意專任湘軍而已。

當李秀成攻陷江南大營的時候，上游戰事亦急，潛山、太湖、宿松相繼爲湘軍所陷，湘軍前鋒垂垂迫近安慶，兩軍方大戰於皖北之間。秀成乃乘勝長驅東下，一意經營東南，以爲上游聲援。清帥和春張國樑相繼敗死於丹陽、常州間。時張玉良自杭州還救江南大營不及，迎戰於常州，復大敗。秀成驅軍追至無錫，四月，遂入蘇州。五月，進攻上海，其餘郡縣，都傳檄而定。清廷大震，褫兩江總督何桂清職，以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並屢下嚴諭促國藩自統各軍兼程東下，以保全東南大局。七月，實授國藩兩江總督並授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廷旨催促愈急，而時人之責望國藩者也更迫：或言宜直搗金陵，或言宜進規蘇常，或言宜分援杭湖，國藩一無所動。他上疏力論，以爲「蘇常未失，即宜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區，蘇常既失，則須通籌各路全局，擇下手之要著，求立腳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豐三年，金陵被陷，向榮、和春等皆督軍由東面進攻，原欲屏蔽蘇浙，因時制宜，而

屢進屢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轉失蘇常，非兵力之尚單，實形勢之未得也。今東南決裂，賊燄益張，欲復蘇常，南軍須從浙江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復金陵，北岸則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則須先克池州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若仍從東路入手，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覆轍，終無了期。臣所部萬餘人，已進薄安慶城下，深溝固壘，挖濬長濠，若一撤動，則多隆阿攻桐城之軍亦須撤回，即英山霍山防兵均須酌退，各路皆退，則軍氣餒而賊氣盛，不但鄂邊難以自保，即北路袁甲三翁同書各軍，亦覺孤立無援，是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為克復金陵之張本，此臣反覆籌思安慶城圍不可遽撤之實情也』。（註三）以故國藩仍力持先攻安慶之策，以求立腳的根據地。是年冬，遂合圍安慶。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春夏間，湘軍迭次苦戰，屢破陳玉成救援安慶的勁旅，八月，遂攻陷安慶。於是太平軍上游重鎮盡失，湘軍乃取建瓴之勢，以安慶為根據，進圖金陵，窺江浙。

這時候，太平軍上游軍事雖失敗，而下游軍事則仍着着勝利。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十二月，李秀成再陷杭州，浙江郡縣都望風投降。是月底，秀成回軍江蘇，沿途所經奉賢、南匯、川沙諸地都唾手佔領，軍威直迫上海。先是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七月，太平軍曾大舉圍上海，十一年五月，復攻上海，這兩役都因他路軍事緊急，未克致力於此。至是，江浙諸郡底定，惟此一隅獨存，太平軍定於來春將先奪取此地。上海人心大震。時英法兩國已與清廷換定天津條約，以太平軍久佔江南，影響其通商，故一變其從前的中立態度，而與清軍聯合，設會防局，訓練「常勝軍」，以敵太平軍。但是，此時上海外人的勢力究竟薄弱，太平軍勢大，上海仍岌岌可危。上海官紳見勢急，乃派代表往安

慶謁曾國藩，涕泣乞援，並自備餉銀，僱外國輪船入長江以濟師。於是曾國藩乃定三面進兵之策：以曾國荃軍從沿江進兵，以攻金陵。以左宗棠軍專任浙江軍事，以圖浙江。以李鴻章軍隨乞師代表乘外國輪船衝太平軍沿江營壘而過，直抵上海，以援淞滬並爲牽吳的張本。而國藩自駐安慶，以爲三路策應。

李鴻章軍以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三月抵上海。鴻章安徽人，所部新軍都爲淮人，成軍之初，一法湘軍編制，曾國藩並撥湘軍精銳數營以爲新軍模範；及既成軍，號曰『淮勇』。這一枝新軍，便是中國近世史上有名的代湘軍而興的淮軍。淮軍抵滬不久，太平軍即壓境，五月，兩軍大戰於虹橋，結果，太平軍敗北。跟着八月九月間，太平軍再度的接續的猛攻，淮軍復連破強敵於北新涇、四江口等處。自此，太平軍再不敢攻滬，而李鴻章便得以上海爲根據，從容佈置以攻蘇常。在浙江方面，是年五月，左宗棠軍大破太平將李世賢於衢州，於是嚴州、湯溪、武義、永康、東陽、義烏都相繼給湘軍克復。同時，沿江方面，曾國荃連克巢縣、含山、和州、裕溪口、西梁山、金柱關、東梁山、蕪湖、大勝關、秣陵關諸要隘，遂進軍金陵城外，駐營雨花臺以圍攻金陵。是年閏八月末，天王詔李秀成率諸軍入衞天京。秀成聞命，在蘇州大會諸路軍，以輔王楊輔清等軍攻甯國，以護王陳坤書等軍由太平府窺金柱關，而秀成則親率十三王號稱六十萬專注雨花臺湘軍營，東自方山，西至板橋鎮，旗幟如林，層層排列。曾國荃所部不滿二萬人，苦守四十六日，太平軍竟無法攻下。時湘軍方面議者多以國荃雖已卻敵，而孤軍蹈危地實爲失策，慮久圍金陵非計，國藩乃親按視沿江諸壘，以決進止。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正月，國藩自安慶出巡，歷池州、蕪湖、東西梁山、金柱關，登大勝關，入兩

花囊營，沿途察看軍情形勢，具疏入奏論道：「粵匪初興，粗有條理，頗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脅之衆，聽民耕種以安佔據之縣，民間耕稼與賊各分其半，故取江南數郡之糧運出金柱關，取江北數郡之糧運出裕溪口，並輸金陵。和春等雖合圍城外，而賊匪仍擅長江之利，掘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今則民聞賊至，痛憾椎心，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實處必窮之道，豈有能久之理。而東南要隘，如安慶、蕪湖、廬州、甯國、東西梁山、金柱關、裕溪口暨浙之金華、紹興，此皆山川筋脈必爭之地，但求此數處不再失守，終足以制該逆之死命。昔年粵賊所至，築壘如城，掘濠如川，堅深無匹，近亦日就草率。而官軍修壘濬濠，今實遠勝於昔。賊中羣酋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敗不相救。而官軍仰承聖謨，三江兩湖水陸各營頗能和衷共濟，呼應靈通。至百姓仰戴皇仁，淪肌浹髓，雖臣等撫綏無術，治軍無效，斯民久陷水火之中，曾不一聞怨咨之語，翹首而望平寇，盤壤而謳吾君」。(註四)以爲敵有必滅之理，我有必勝之勢，遂罷退兵之議。湘軍圍攻金陵之勢既穩固不移，太平軍從此便再沒有反攻的機會，最後的奮鬪唯有往來奔命拚死力來保守天京一隅，以圖苟存於旦夕。後半期兩軍的戰爭，到此已成定局。

(註一)見敬陳湖北兵政吏治疏，胡文忠公遺集卷十四。
(註二)見遵旨懸心籌酌摺，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三。
(註三)見通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摺，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三。
(註四)見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一。

三　天京的陷落與餘衆的被撲滅

自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湘軍三路進攻太平軍後太平軍的陣線便漸漸的縮小於江南。同時，在江北方面的英王陳玉成自援安慶失敗後，退守廬州，元年四月，廬州失守，逃至壽春，爲稱雄皖北的土豪苗沛霖誘擒送淸營誅死。在四川方面的翼王石達開，也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敗死於四川。太平軍這兩路勁旅，都給淸軍肅淸，惟餘李秀成一軍在江南支持着最後的殘局。

當是時，太平軍中雖以忠王李秀成爲軍事的首領，但諸王至九十餘人，名位相埒，各爭雄長，不相統屬，多不聽秀成調遣。且江浙連年大戰，民間逃亡，田畝拋荒，諸軍都無所得食。於是軍心離散，一部分兩湖三江的羣衆多獻城納械紛紛投降於湘淮軍前，有的不願降敵的則高喊「與其餓死江南，不如戰死江西」（註一）的口號，衝到江西去。

同治二年（一八六二）十月，李鴻章攻下蘇州。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二月，攻下嘉興。是月，左宗棠攻下杭州。四月，李鴻章攻下常州。於是江浙郡縣都次第給左李兩軍克復，而金陵方面曾國荃的圍師也同時益急。時天京城中糧久絕，軍民以草根樹皮爲食，天王見大勢已去，乃於四月末服毒自盡。到了六月十六日，龍脖子地道炸發，湘軍從煙彈裏直衝道口而入。兩軍在城中作劇烈的巷戰。城內太平軍十餘萬人，他們寧願犧牲他們的生命在敵人

的刀尖上，甚至聚衆自焚死在火堆裏，而沒有一個向敵人投降的人。他們在天京城中最後的一剎那，給他們手創的歷史留下最悲壯的最光榮的一頁！

先是當蘇常既下的時候，蘇常一帶的太平軍都經徽州與皖浙餘衆會合同入江西。及天京既陷，圍城中一部分餘衆也衝出重圍往江西相會。於是清廷乃以左宗棠總督諸軍追敵。太平軍餘衆，從江西轉戰閩廣，直到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十二月，纔在廣東嘉應州完全給湘軍撲滅。太平天國戰事到此總告終，上溯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金田起事之年，前後戰爭共經過了十五年。十五年戰爭的區域，從珠江流域而長江流域以至黃河流域蔓延了整個的中國本部。

（註一）沈葆楨的部署饒防片中語，見沈文肅公政書卷一。

第六章 『天朝田畝制度』下的社會之展望

一 『天朝田畝制度』的內容

太平天国的社會制度，是個理想的公有制度。這個制度的政策及其精神具見於癸好三年（一八五三）所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中。（註一）就天朝田畝制度全文的規定，其內容共分六方面，現分述於下：

第一，爲公田。公田制度是天朝田畝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太平天国的社會制度的靈魂。其辦法，先分田爲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爲尙尙（註二）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爲尙中田，可出一千斤者爲尙下田，可出九百斤者爲中尙田，可出八百斤者爲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爲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爲下尙田，可出五百斤者爲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爲下下田。尙尙田一畝當尙中田一畝一分，當尙下田一畝二分，當中尙田一畝三分五釐，當中中田一畝五分，當中下田一畝七分五釐，當下尙田二畝，當下中田二畝四分，當下下田三畝』。然後按照人口分田，『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一半』。其受田的辦法，定爲『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尙受田多踰十五歲以下一半，如十六歲

以尙分尙尙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尙尙田五分。又如十六歲以尙分下下田三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下下田一畝五分』。人民除耕耘外，應有一定的副業，『凡天下樹牆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至於人民每年收穫所得，除必需之外，禁止據爲私有，規定『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人民不但不能積蓄私財，即所受之田，也不得視爲個人私業，故『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其目的『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煖』。因爲『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眞主救世旨意也』。

第二，爲軍制與社會組織。太平天国寓兵於農，故其軍隊的組織也就是社會的組織，其設軍之法，規定『凡設軍，每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設一軍帥。次設軍帥所統五師帥。次設師帥所統五旅帥，共二十五旅帥。次設二十五旅帥各所統五卒長，共一百二十五卒長。次設一百二十五卒長各所統四兩司馬，共五百兩司馬。次設五百兩司馬各所統五伍長，共二千五百伍長。次設二千五百伍長各所統四伍卒，共一萬伍卒。通一軍人數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凡設軍以後，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另設一伍長。添多二十六家，另設一兩司馬。添多一百零五家，另設一卒

長。添多五百二十六家，另設一旅帥。添多二千六百三十一家，另設一師帥。共添多一萬三千五百六十家，另設一軍帥。未設軍帥前，其師帥以下官仍歸舊軍帥統屬。既設軍帥，則割歸本軍帥統屬』。設軍的基礎雖以一個家庭為單位，但其組織則以每二十五家為一單位，故又規定『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一切民事軍政都從二十五家做起，而以兩司馬來主持。

第三，為禮俗與教育。太平天国的社會，是個公有的社會，太平天国的信仰，是個上帝教的信仰，故其禮俗與教育都帶有公有的及宗教的色彩。其辦法規定『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為之，農隙治事。凡兩司馬辦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總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舊時歪例盡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禮拜堂，兩司馬教讀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及眞命詔旨書焉。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頌讚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

第四，為選舉與黜陟。選舉之制，定為『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舉得其人，保舉者受賞，舉非其人，保舉者受罰。其伍卒民有能遵守條命及力農者，兩司馬則列其行蹟，註其姓名，並自已保舉姓名於卒長。卒長細核其人於本百家中，果實，則詳其人，並舉姓名於旅帥。旅帥細核其人於本五百家中，果實，則詢其人，並保舉姓名於師帥。師

帥實核其人於本二千五百家中果實，則尙其人，並保舉姓名於監軍。監軍詳總制，總制次詳將軍侍衞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啓天王，天王降旨調選天下各軍所舉爲某旗或師帥或旅帥或卒長兩司馬伍長。凡濫保舉人者黜爲農」。至於黜陟之制，則定爲凡天下諸官，三歲一陞貶，以示天朝之公。凡濫保舉人及濫奏貶人者黜爲農。當陞貶年，各首領各保陞奏貶其統屬。自卒長以至欽命總制總核其所統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以次一同舉於將軍侍衞指揮檢點及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將各欽命總制及各監軍及各各軍帥以下官所保陞奏貶各姓名直啓天王主斷。天王乃降旨主斷，超陞或譴謫所保陞及奏貶諸人。監軍以下官俱是在上保陞奏貶在下，惟欽命總制一官，天王准其所統各監軍保陞奏貶欽命總制。天朝內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衞諸官，天王亦准其上下互相保陞奏貶，以剔上下相蒙之弊。至內外諸官若有大功大勳及大奸不法等事，天王准其上下不時保陞奏貶，不必拘陞貶之年。

第五，爲司法。司法制度規定凡「各家有爭訟，兩造赴兩司馬，兩司馬聽其曲直。不息，則兩司馬挈兩造赴卒長，卒長聽其曲直。不息，則卒長尙其事於旅帥師帥典執法及軍帥，軍帥會同典執法判斷之。既成獄辭，軍帥又必尙其事於監軍，監軍次詳總制將軍侍衞指揮檢點及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奏天王，天王降旨，命軍師丞相檢點及典執法等直啓天王主斷。天王乃降旨主斷，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軍師遵旨處決」。這種司法制度，使兩造有多次伸訴的

機會，並且使審判者不敢有受賄的餘地，這是一個進步的司法制度。

第六，爲人民服役。人民服役制度，規定凡天下每一夫有妻子女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則出一人爲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爲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爲農耕田奉上。至於其餘鰥寡孤獨廢疾者免役，都頒國庫以養。

（註一）法國東方語言學校圖書館所藏天朝田畝制度本有「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鐫」字樣，可見此制必頒布於這一年。

（註二）太平天国因避上帝諱，故諱「上」爲「尙」，「尙尙」即「上上」。

二 「天朝田畝制度」下的社會及其制度的來源

天朝田畝制度的內容，已經分述於上。現在，讓我們來向這個公有的社會加以展望。這個社會，是以每二十五家爲一單位，二十五家各自成爲一個集體，各自形成一個農村公社，在二十五家中，設有國庫一所，禮拜堂一所，統率二十五家的首領兩司馬就住在禮拜堂裏。兩司馬的職務，平時是監督各家耕種收穫，主持村中禮拜、婚姻、死喪、土木工程等事，審判村中爭端，並教育村中兒童，有事則率領二十五家伍卒出戰。他是一身而兼管民事、軍政、司法、宗教教育等等職務的。在每一村中，是一畝畝的已經分配了的公田，兩司馬領着二十五家伍卒在田中耕種或者收穫。在每一個村中，每家的牆下都種滿桑樹。女人們在門前餵着蠶兒，有時忙着織布帛，或者縫着衣裳。每家養有五母雞，兩母豬。村中收穫所得，由兩司馬督率伍長監視，除足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多餘的都歸國庫；就

是多餘的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與及錢銀也一樣的要送到國庫去。國庫是管理村中的公產機關。凡村中二十五家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通天下都一樣，不得多用一錢，因爲用之有節，纔得有所積蓄以備饑荒。每家婚娶吉喜等事都由兩司馬主持辦理，其儀式祇要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舊俗都除去，男女婚姻並不許講論財物。村中的土木工程，都在秋冬農隙的時候，由伍長和伍卒共同去工作村中的人，除了鰥寡孤獨廢疾者免役由國庫贍養外，每家都須出一人爲伍卒有事則爲兵殺敵，無事則爲農耕田。童子則每天須到禮拜堂去，由兩司馬教他們讀聖經（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和上諭（眞命詔旨書）。到了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女到禮拜堂去，分別男行女行聽講道理，頌讚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在這個社會裏司法是開明的，不會有官吏枉法豪強把持的冤獄的。在這個社會裏，每年選舉一次，祇要你有才能，你不怕沒有機會表現你自己的。同時，官吏也定三年一黜陟，使賢才可以上進，庸劣不致久居其位。在這個社會裏，一切都歸公有，祇要你盡了你的所能，你便可以享受你所應得的本分的。

這是一個理想的社會。這個社會制度的發生，在經濟背景方面，是由於自十八世紀以來，中國社會上土地問題與人口問題兩種現象的反映。洪秀全出自貧農之家，他身受目擊社會的不平，他想要在他的手裏創造出一個有田可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煖的太平天囯。他所創制的制度，正代表出當日一般貧農的願望。

這個社會制度的思想來源，則出自變相的耶穌教義。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訓中說道：

天下凡間，分言之則有萬国，統言之則實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理化，遠而番国亦然；遠而番国是皇上帝生養保佑，近而中国亦然。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并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奸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而今尚可望哉？然而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升矣。惟願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跳出邪謀之鬼門，循上帝之眞道，時凜天威，力遵天誡，相與淑身淑世，相與正己正人，相與作中流底柱，相與挽已倒之狂瀾，行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幾何乖漓澆薄之世其不一旦變而爲公平正直之世也？幾何陵奪鬬殺之世不一變而爲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苦怯之世也？

這個認理想的主宰者——上帝——爲天下大共之父，以力闢此疆彼界爾吞我并的封建觀念，而力伸天下一家的大同思想的教義，便是這個社會制度的思想的來源。所以天朝田畝制度中，一則說『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煖』，再則說『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

特命太平眞主救世旨意也』都是從教義方面闡明大同思想。可知變相的耶穌教義實爲太平天国這個公有的社會制度的思想的來源。

至於這個社會制度的根據，則大部分襲取周官的制度。天朝田畝制度記分田爲九等的辦法道：

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爲尙尙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爲尙中田，可出一千斤者爲尙下田，可出九百斤者爲中尙田，可出八百斤者爲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爲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爲下尙田，可出五百斤者爲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爲下下田。尙尙田一畝當尙中田一畝一分，當尙下田一畝二分，當中尙田一畝三分五釐，當中中田一畝五分，當中下田一畝七分五釐，當下尙田二畝，當下中田二畝四分，當下下田三畝。

這種辦法，卽採自周官『土均之法』。周官地官大司徒規定『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鄭注說：『五物，五地所宜之物。九等，上中下各三等也』。總論御纂說：『辨五物九等名曰土均之法者，田有一易再易，地有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必辨其等乃可均也。九等當如禹貢所差，但禹貢是九州之等，此則隨地而差之各有九等耳』。又如軍隊的編制，天朝田畝制度定爲：

凡設軍每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設一軍帥。次設軍帥所統五師帥。次設師帥所統五旅帥，共二十五旅帥。次設二十五旅帥各所統五卒長，共一百二十五卒長。次設一百二十五卒長各所統四兩司馬，共五百兩

司馬。次設五百兩司馬各所統五伍長共二千五百伍長。次設二千五百伍長各所統四伍卒，共一萬伍卒。通一軍人數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

這種編制，也與周官『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註一）的軍伍之制全同。至於軍帥的職權，天朝田畝制度定爲：

凡一軍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錢穀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師帥旅帥兼攝。當其任者掌其事，不當其事者亦贊其事。凡一軍一切生死黜陟等事，軍帥詳監軍，監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次詳將軍侍衛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奏天王，天王降旨，軍師遵行。

這也倣自周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註二）的成法。此外，如選舉黜陟的制度，則取自周官與賢舉能及大比六鄉（註三）之制，如人民服役的制度，則取自周官任役（註四）之制，鰥寡孤獨廢疾免役的辦法，也取自周官慈幼、養老、寬疾（註五）諸條。不過僅略有增改，如周官土均之法，以人民受地等級不同，分爲上地之家、中地之家與下地之家，而天朝田畝制度人民受地的辦法則改爲雜以九等，優劣參半，沒有上中下三等的分別，使人人都得受平等的待遇。又如周官軍伍之制中的『兩』，天朝田畝制度改爲『兩司馬』，而『兩司馬』的職權，以一身而兼管二十五家的民事、軍政、司法、宗教、教育等等職務，也遠較周官的『兩』爲重要。但是，其制度的根本精神，則完全是與周官相同的。

(註一)地官小司徒。

(註二)地官鄉大夫。

(註三)地官鄉大夫及小司徒。

(註四)地官小司徒。

(註五)地官大司徒。

三　「天朝田畝制度」的實施問題

最後，我們要討論到這個制度的實施問題。這問題應分民間與軍中兩方面去考察。在民間方面，據今日所見的史料看起來，這個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公田制度，是不曾實行的。公田制度的精神是沒收私有土地，重新由國家平均分配，太平天囯就不曾做得到。它還承認地主的地位，它與地主的關係，還是舊社會制度下的徵收糧賦的關係。在這些史料中，最重要的是一張周志記租捐執照。(註一)其全文照原款著錄於左：

> 今據周志記田主租捐報明計田十四畝八分此照
>
> 太平天囯辛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
>
> 限四日交
> 寶安局
> 不作爲憑

這張執照中周志記是地主戶名，實安局是周志記所在地的鄉官的公所。田畝的數目是由地主按實呈報，將來鄉官卽按這個數目來徵收糧稅的。故李秀成自述他在咸豐十年（一八六〇）解嘉興之圍後，回到蘇州安撫人民的情形有道：「蘇州百姓應納糧稅並未足收，田畝亦是聽其造納，並不深究」。（註二）鄉官公所是辦理催征糧稅處理民事的公所，是由歸順太平朝的人民自請設立的。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太平朝將林彩新諭寄岩徽勸諭民衆的話中有道：「勿以當妖爲榮，勿以團練爲事。照依舊規，請令設局，投誠捐糧」。（註三）太平天國這個承認地主地位，自背其所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的公田精神的按畝徵糧的政策，並不是始於咸豐十年以後。賊情彙纂保存有一篇楊秀淸、韋昌輝、石達開爲徵辦米糧以裕国課奏中有道：「弟等細思安徽江西米糧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如蒙恩准，弟等卽頒行諸諭」。洪秀全批道「卽照胞等所議是也，卽遣佐將施行」。（註四）可見在楊秀淸主政時代，便已如此。據賊情彙纂的記載，公田制度本來是曾經一度命令施行的，只因「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註五）故遂不得不仍改爲照舊交糧納稅的制度。至於這個制度中曾經在民間實行的部分，可考的惟有社會組織的一種制度，卽賊情彙纂所稱的鄉官之制。賊情彙纂記太平軍推行此制的情形道：「賊於各鄉徧置鄉官，以一萬二千五百家爲一軍，並頒給所刻僞軍册，責令塡註，責令詳造家册呈送」。（註六）又道：「初賊所破州縣，皆擄其財物，殘其人民而去，未嘗設官據守，自竊占江寧，分兵攻陷各府州縣，遂卽其地分軍立軍帥以下僞官，而統於監軍，鎭以總制，監軍總制皆命於僞朝，爲守土官。自軍帥至兩司馬爲鄉官，鄉官者以其鄉人

爲之也。先是大彰僞諭，聲以兵威，令各州縣並造戶册，卽於鄉里公舉軍帥旅帥等，議定書册，並各戶籍斂費呈於僞国宗檢點，由送江寧，是謂受降。其軍帥假以令旗，得操徵調之柄，催科理刑，皆專責成。自師帥至兩司馬悉設公堂刑具，建三角旗，以旗長短爲尊卑之分。軍帥得備彩輿，昇以四夫，旛蓋塞途，儀衞甚盛，最下兩司馬亦有隨從人護，擊斷鄉里，炫燿宗族，賊兼許以子孫承襲，世傳不替，而無恥之徒，不學之輩，爲其所誘，妄希顯榮，遂趨之如鶩，其間謹飭之士，爲衆姓所共推，委曲維持，志全鄉里，亦多爲所污，不能自脫，而土著生計，絲粟難隱，裹脅逃民，並得稽察，賊之牢籠人士，聯絡方域，計蓋無謫於此者』。（十七）從這兩段記載中，可以看出太平軍曾以其社會組織的制度推行於民間，並且著有成效。

至於在軍中方面，則與民間不同。在太平軍的集團中，對於這個制度，卻普遍的嚴厲的施行。如太平軍軍伍的組織，便是自始至終完全依照其軍制的組織，太平天朝在楊韋之亂以前的選舉與黜陟的制度，也是完全依照其選舉與黜陟的制度無須論列外，就是這個制度中最根本的最重要的那部不能實行於民間的公有制度，在軍中也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實行。這就是『聖庫』制度，及『諸匠營』與『典官』制度。

聖庫制度，就是天朝田畝制度中所說的國庫制度，是管理公產的機關。朝內官設有總聖庫，計正、副、又正、又副共四人，另有總聖庫協理二人，專管朝內的庫藏。軍中官則設有典聖庫正副二人，專管一軍的庫藏。（註八）這個制度，施行很早，在起事之初，當佔領永安州的時候，洪秀全便下詔令道：

天王詔令各軍各營衆兵將，各宜為公莫為私，總要一條草對緊天父天兄及朕也。繼自今，其令衆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欽此。

到了北出軍次長沙的時候，更定私藏金銀者斬首示衆之令，其詔令道：

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帶金寶，盡繳歸天朝聖庫。倘再私藏私帶，一經察出，斬首示衆，欽此。

這樣嚴厲的制止將士在攻城掠地時所得的財富據為私有，同時，又因天王以至散卒，都無俸給，所以朝內軍中人無私財一切財富都歸天朝聖庫公有，然後纔由天朝支配給各人。這個制度施行的結果，確曾奏了相當的功效。故賊情彙纂論道：「賊所入其道四五，迹其出祇口糧一事，此賊之所以不虞匱乏歟？偽官雖貴為王侯，並無常俸，惟食肉有制，偽天王日給肉十斤，以次遞減至總制半斤，以下無與焉。其偽朝內各官，一切衣食皆向各典官衙取給，軍中亦然」。（註九）可見在這個制度下，太平軍中是過着一種共有共享的生活。

諸匠營與典官制度，在天朝田畝制度中沒有規定。但是，這個制度的精神仍是從天朝田畝制度的公有精神出發，因為天朝田畝制度的目的，是使人得共有共享的，換言之，是使人得各取所需的，但要各取所需，其先決條件必須先各盡所能，而諸匠營與典官制度，乃是一個使人得各盡所能的制度，這正所以補天朝田畝制度辦法所未及而完成一個公有社會制度的組織。賊情彙纂偽軍制上總論記此制道：「立諸匠營及各典官，使被脅百工技藝

各有所歸，各效其職役』。(註一〇)諸匠營計有木營，其卒都是木工。金匠營，其卒都是金銀匠。織營，其卒都是織機匠。金轎匠，其卒都是轎篏匠。繡錦營，其卒都是男繡匠。鐫刻營，其卒都是刻字匠。各營都以指揮統[illegible]司馬上下相維的組織，也和軍制相同。(註一一)至於典官之制，名目至繁，大別可分爲三種：(一)專主出納的職守的，如典聖庫，典聖糧，典油鹽等屬之；(二)專給役天王與諸王的，如天朝各典官，東、西、南、北、翼各殿各典官等屬之；(三)專管製造者。前面兩種不在本文論列之內，本文所說的典官制度，乃是專指最後一種來說的。這一種典官，計有典金官，主鑄印並鎔金銀爲器飾。典玉局，主雕琢玉器。典繡錦，主督男綉工刺綉織錦。典角帽，主製造冠帽。典金靴，主製造靴鞋。典紅粉，主製造火藥。典硝，主煎熬硝磺。典鐵，統領鐵工製造兵器鐵器。典銅匠，主製造銅器。典木匠、典竹匠、典石匠都各領其所統工匠主製造各器具。(註一二)這一種典官制度，和諸匠營微有不同：第一，諸匠營祇專管製造，而不兼司收發，典官則『凡所典之事，俱兼司收發』。(註一三)第二諸匠營一準軍制之組織，典官處則『所屬人數多寡不一，有百人則置一卒長，分轄四兩司馬，二百人則置兩卒長，無軍帥旅帥諸僞官，故各衙聽使腰牌，無前營後營字樣』，(註一四)其組織不盡依照軍制。但是，其根本的精神則一，都同是管理百工技藝生產的機關。上面說的是男子生產的機關。至於女人也有他們的工作，也有主管他們工作的機關，其組織大概與男子的相同。賊情彙纂記道：『所擄婦女，皆以軍法部署，置總制諸官以統之。……其善女紅者，分入綉錦營，置指揮以下官領之。餘悉迫令解足任荷擔、開濠、濟濠、運土諸役，俱立官以督工』。(註一五)凡在諸匠營及這種典官處做工的散卒，他們祇是生產的工

人，隨營奏技，並不用去打仗。(註一六)這個制度施行的效果，據賊情彙纂的批評，稱爲『各儲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意』(註一七)贊美出自敵方的記載，其言當可置信。

不過，我們要注意到這兩個制度實行的期間。據太平天国文獻及賊情彙纂看起來，在咸豐六年前，確曾雷厲風行地實行的。(註一八)但到咸豐六年秋，楊韋之亂後，便漸漸的行不通了。咸豐十一年，江蘇金山有士人名顧深者，陷於太平軍忠王李秀成所轄的陳玉書部下，後乘間逃歸，著有虎穴生還記。據載所見太平軍情形，凡在攻城掠地時所得財物，除米糧、牛、羊、豬、雞等歸公外，其餘銀錢衣服，則各自收藏。這便根本推翻了昔日的聖庫制度。我們將此記與李秀成供狀互相印證，洪姓的貪贓斂財，固不用說，卽盡忠愛民的忠王李秀成，被洪秀全逼迫捐貲助餉，一次便獻出十萬兩之多，可知聖庫制度，早已破壞不存了。另一方面，我們在顧深此記中，所見太平軍中的工作人員，都雜居於一『館』，也和昔日百工技藝，各有所歸的諸匠營與典官制度下的情形不同。(註一九)如此，則不但聖庫制度行不通，卽諸匠營與典官制度也不同從前那樣嚴密的組織了。

我們根據上面的考述，可以看出這個公有制度究竟實行了若干部分，其實行的程度究竟到了怎樣的一個限度。這個公有制度的靈魂是公田制度，但公田制度的對象乃在民間，在干戈擾攘的時候，因爲人民不願遵行此制，洪秀全爲了要收拾人心，所以不敢冒昧施行以逆民情，這是公田制度所以無法實行的最大原因。但是在軍中，這個公有制度的政策及精神，洪秀全卻毫無顧慮地推行。軍中將士有的是攻城掠地時所得的財實，他便以嚴刑

峻法施行聖庫制度，命令軍中一切動產都繳歸聖庫，使人無私財，財歸公有，使人人同過一種共有共享的生活。同時，又施行諸匠營及典官制度，使他的集團中除了戰士外人人都有所用，用當其材，每人都是一個生產者。這樣的一個社會制度，便是中國古哲人所夢想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這個社會制度，雖僅得實行於軍中，雖僅短短幾年便成過去，但它卻給太平天国的歷史以永遠不滅的光芒。

（註一）此照長七寸二分，廣二寸三分，年月下蓋「寶安局」三字正方的圖記，竹紙書寫，為周作人先生所發現，現贈送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收藏。

（註二）李秀成供狀。

（註三）青巖禦寇錄。

（註四）卷七，賊文告。

（註五）卷十，賊糧。

（註六）卷四，偽軍制。

（註七）卷三，偽官制。

（註八）賊情彙纂卷三，偽官制。

（註九）卷十，口糧。

（註一〇）卷四，偽軍制上總論。

（註一一）賊情彙纂卷四，偽軍制附諸匠營。

（註一二）賊情彙纂卷三，偽官制。

(註一三)據同上。

(註一四)賊情彙纂卷四,偽軍制。

(註一五)卷三,偽官制。

(註一六)賊情彙纂卷四。

(註一七)卷四。

(註一八)考賊情彙纂自序於咸豐五年,而記事則及於咸豐偽京之亂前,故知在此時期前,這兩個制度還在實行。

(註一九)虎穴生還記最近發表於人文月刊第六卷第八期及第九期。

第七章　革命的性質及其失敗的原因

一　革命的性質

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是貧農的革命。這裏所說的貧農，不但只指農村裏的衣食艱難的農夫，就是從農村裏流離出來的人們，他們有的成爲穿州過縣的流民，有的去做開山掘礦伐木燒炭的苦工，有的成爲地痞土棍以至強盜，都包括在我們所說的貧農之內。這種種人物，就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基本羣衆，太平天国革命的動源。雖然這次革命運動，是有知識分子洪秀全、馮雲山，富農分子韋昌輝、石達開、胡以晄，富商分子周勝坤、吳可億，城市流氓分子黃玉崑等等所代表的各種各色的人物的參加，（註一）並且是由知識分子的洪秀全、馮雲山策動，但是，士人、富農、富商與城市流氓，在這個運動中不過佔少數，其基本羣衆卻以貧農爲主，我們從太平天国羣衆的來源裏可以很分明的看得出來。

在洪秀全、馮雲山入廣西傳教，革命醞釀時，最先接受洪秀全宣傳的便是村落中的貧農。李秀成供狀記道：

天王是廣東花縣人氏。花縣上到廣西潯州桂平、武宣象州、藤縣、陸川、博白，俱星羅數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內

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積多結成聚衆。

除了村落中的貧農之外，在金田發難前，太平軍還有兩個基本羣衆，一個是貴縣北山里礦山中的礦工人，一個是桂平平隘山中的燒炭工人。貴縣北山里礦工人早在道光年間，聞地方政府開掘縣北龍頭六班諸山銀礦，從各地聞風遠來尋找工作的客家人。（註二）桂平平隘山燒炭工人，乃是在清代康熙以來，從廣東嘉應州一帶陸續移殖過來的。（註三）他們都是從農村裏被排擠出來的貧農。金田發難的轟天雷便是從平隘山通班燒炭工人的手裏放出來，而由北山里礦工人最先來響應的。金田發難後，首先加入金田的是貴縣械鬭戰敗的客家村落羣衆三千餘人，和與桂平民變首領蘇十九聯合的桂平一部分的客家村落羣衆。（註四）他們都是生活寒苦的貧農。太平軍自金田起事，北出道州郴桂，經長沙、武昌、漢陽、安慶以至金陵，兼陷鎮江、揚州，沿途男婦老幼加入的人數，據賊情彙纂的統計，男丁共百八十萬，婦女共三十餘萬。（註五）其中自以有家室的農村貧苦羣衆以及出自貧農之家的羣衆爲佔絕大多數，當不待論。到了咸豐六年（一八五六），楊韋之亂後，太平軍內部已漸成土崩瓦解之勢，所藉以維持後半期動亂的局面的還是貧農與農村裏被災的飢民。曾國藩記江西方面的情形道：

金田老賊……現存悍賊惟石達開、韋俊、陳玉成數人，拚命各處，實有日就衰落之勢。所患江西民風柔弱，見各屬並陷，遂靡然以爲天傾地坼，不復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脅以從，而甘心蓄髮助戰，希圖充當軍帥旅帥

以訛索其鄉人，擄掠郡縣村鎮以各肥其私橐。是以每戰動盈數萬人，我軍爲之震駭。（註六）

官文胡林翼記安徽方面的情形道：

皖省賊匪因年荒糧盡，裹脅飢民數十萬，由黃梅、廣濟、蘄州、蘄水等處間道上竄。（註七）

貧農飽受寒苦生活的壓迫，他們在動亂中企圖要推翻現狀，所以不待太平軍去「迫脅以從，而甘心薙髮助戰」。飢民是在生死線上的掙扎者，他們爲的要在死裏求生，所以也都從亂如歸。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後，陳玉成縱橫江北，附從的飢民往往在十萬人左右。（註八）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湖北興國、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一帶民衆加入李秀成部下的有三十萬人。（註九）童容海從廣西脫離石達開北歸，沿途招集率領到浙江加入李秀成部下的，也有二十萬。（註一〇）所以李秀成之衆號稱百萬，用以縱橫皖、贛、鄂、江、浙五省，數月之間，長驅五千餘里，攻陷二十餘城。這些廣大的投入動亂中的羣衆，也都是那受够了人禍天災的貧農與飢民。所以太平天国羣衆的來源以貧農分子以及從農村流離出來的飢民或從貧農分子化身的流民、苦工、地痞、土棍以至強盜爲主體。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也可說是貧農的革命。

說起中國貧農革命的歷史，是很早的，可以回溯到二千年以前去。在秦朝末年，就有過陳勝、吳廣、劉邦等之亂。在西漢末年，有赤眉之亂。在東漢末年，有黃巾之亂。隋朝末年，有李密竇建德等之亂。北宋末年，有方臘之亂。元末有韓林兒、陳友諒、朱元璋等之亂。明末有李自成、張獻忠等之亂。清代乾嘉間，有白蓮教之亂，這些都是貧農的革命。太

平天国就是中國歷史上這種貧農革命中的一個。但是，我們要知道，太平天国革命運動和我們的時代最接近，它雖然是發生於遠東的中國社會裏，但已經受了若干西洋思潮的影響，團結這次革命勢力的上帝會便是一種變態的耶穌教。所以我們從它的革命所表現的意義及所頒行的制度的精神看起來，嚴格的說，這次革命運動，如上下一體，以兄弟姊妹稱呼，男女平等，女子有參政權，和公有的田畝制度、聖庫制度以及諸匠營典官處諸制度等等方面，都已經含有民主主義的要求，並且，參入了社會主義的主張。它在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貧農革命裏面，是另有它的特殊的地位和意義的。

（註一）諸人出身都據賊情彙纂本傳。

（註二）據光緒貴縣志、

（註三）據光緒潯州府志民國桂平志。

（註四）據光緒潯州府志。

（註五）卷十一，賦數。

（註六）曾文正公家書卷五，致沅浦九弟，咸豐六年九月十七日。

（註七）勘平粵匪方略卷一百七十七，官文胡林翼奏，咸豐七年六月。

（註八）見勘平粵匪方略卷一百七十五，官文胡林翼奏，咸豐七年閏五月；同書卷二百二十七，和春奏，咸豐九年十一月。

（註九）據李秀成供狀。

（註一〇）據李秀成供狀。

二　革命失敗的原因

太平天国革命運動的性質已經說明，現在，再進而討論太平天国革命運動因何而失敗。這個問題，並非難於解釋，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去考察。第一，在歷史方面，中國歷來的貧農革命就從來沒有一次得到成功。因爲貧農革命所表現的色彩有兩種特點：一、異端的信仰；二、爲本身求福利。這兩種色彩，都是最與士大夫社會勢不兩立的。而士大夫社會自秦漢以來就種下了深固的奠基石，貧農革命雖然狂飈似的興起於一時，但是終推翻不了這個士大夫統治的社會勢力，等到狂飈過了，一切又依然照舊，貧農的問題還一點不曾得到根本的解決。所以中國歷代的貧農革命，除非做領袖的人向士大夫社會妥協，把貧農本身的利益出賣，是從來不曾建立過新政權的。劉邦本是個最痛恨儒生的流氓，但他不得不用儒生以治天下。朱元璋本是韓林兒的部下，白蓮教徒衆的一員，但他的通告天下檄文卻不得不痛斥白蓮教爲邪教以順應士大夫的心理。劉漢朱明都是向士大夫社會投降，把貧農革命的色彩轉變了，把貧農革命的目的拋棄了，然後纔得建立新王朝的。這便是昭然若揭的明證。太平天国革命運動既是中國史上貧農革命中的一個，它也是有被儒家視爲異端的信仰與爲自身求福利的企圖的。而且，太平天国的信仰，和以前的貧農革命所崇奉的邪教更是不同，它是涵有高深的博大的教義使羣衆去追求，並對那維持士大夫社會的儒教加以攻擊的。同時，太平天国革命的目的不但和以前的貧農革命一樣有爲自身求福利的企圖，

他還進一步要創立一個新社會，創制根本推翻舊社會的新制度。洪秀全在他的革命進程中本着他的信仰與政策，向舊社會毫不妥協的進攻，但是舊社會的勢力還是這麼堅固，洪秀全的羣衆卻是那落後的農民，而洪秀全等出自貧農之家的人所受的教育又遠不如在士大夫社會所受的完備，因爲所受的教育程度不同，洪秀全等的智略自稍遜於曾國藩、李鴻章那班在士大夫社會裏受有高深教育的薰陶的人物那麼高明，王闓運論洪秀全、陳玉成之所以失敗，與曾國藩、李鴻章之所以成功的話有道：『洪寇勢大，非稍用智略不定。今之曾李，少勝洪陳，因收其功，亦非天幸。後之論者，未識幾人知此』？（註一）這句話很有相當的理由，後漢皇甫嵩、朱儁所以破滅黃巾，便是明證。

第二，我們在太平天国革命運動的本身錯誤上，也可以看出它所以不得不終歸失敗的緣由。其最大的原因有兩點，即：（一）政制組織中封建制度的殘留；（二）領袖的腐化及其內訌。我們上面說過，太平天国革命運動嚴格的說來，已經含有民主主義的要求，並且參入了社會主義的主張。這次革命運動的性質是急進的，向前的。但它的政制組織中卻有落後的反動的封建制度的殘留。在起事之初，永安建國的時候，便已定世襲的制度。太平天国辛開（一八五一）十月十二日天王諭通軍大小衆兵將詔有道：

今詔封從前及後一概打仗昇天功臣職同總制，世襲。掌打大旗昇天功臣職同將軍侍衞，世襲。現封及者袍帽遵依官制，未封及者風帽一概盡與兩司馬同。既封及者一體，未封及者一樣，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

山功勳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小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

同月二十五日又下封建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五人為東、西、南、北、翼五王的諭詔道：

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為東王，管治東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軍師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導副軍師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後護又副軍師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達胞為翼王，羽翼天朝。

同時，並頒布稱謂詔令，嚴定上下等級的稱呼。其論定上自天王與五王下而至於兩司馬的子女以及上自軍師下而至於兩司馬之妻的稱謂道：

王世子及東、西、南、北、翼各世子皆是管理世間者也，故均稱世子。宮城女及東、西、南、北、翼各女皆是貴如金者也，故均稱金，金、貴也，色美而不變者也。丞相至軍帥皆是公義之人，故均稱其子曰公子；又皆是虔潔之人，故均稱其女曰玉，玉、潔也，色潤而可寶者也。師帥至兩司馬皆是典兵之人，故均稱其子曰將子；又皆是清淨之人，故均稱其女曰雪，雪、清也，色白而可愛者也。……軍師妻呼稱王娘。丞相妻呼稱貴嬪。檢點妻呼稱貴姒。指揮妻呼稱貴姬。將軍妻呼稱貴嬙。欽命總制妻呼稱貴嫚。監軍妻呼稱貴奶。軍帥妻呼稱貴嫺。師帥妻呼稱貴嫻。旅帥妻呼稱貴婕。卒長妻呼稱貴妯。兩司馬妻呼稱貴妯。丞相妻至軍帥妻加稱貞人。師帥妻至兩司馬妻加稱夫人。

這種可笑的稱謂，實含有封建意義。此外，行營規式定有「內外強健將兵不得僭分干名」之律，（註二）條禁定有

凡諸王駕出，侯、丞相轎出，凡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兵士，如不迴避或不跪道旁者斬首不留；凡檢點指揮各官轎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規矩之分。（註三）這種儀節，也還是封建社會的禮制。我們須知道，太平天国的政制組織中這種落後的反動的封建制度的殘留，是有它的背景的。因為太平天国的隊伍是農村羣衆，農人的思想是落後的、反動的，中國封建社會的制度雖早已過去，但封妻蔭子的封建思想卻還深深的保留在農人的意識中。洪秀全、楊秀清諸人的思想就不曾超出這種封建制度下的裂土分封稱王世襲的幻夢，他們要利用羣衆，更不得不適應羣衆的要求。為了這樣，革命便不能朝着那一定的方向發展而終不得不歸於失敗。而況這種封建爵賞在開國初期的時候，雖還依功授與，頗協衆論，使羣衆樂於效死，但到後來，卻往往不免於濫竽，或輕於施與，並無定制，賊情彙纂論道：

官名位階，日新月易，雖其所自定，亦旋相矛盾。蓋狂狡無賴，偶竊偏隅，遽謂神器可盜而有，乞丐攫金，驕過秦封，授柄巨猾，深居自逸，日興制度，以快其恣睢。嘗一日封賞丞相檢點至數百人，如婦孺抔餅以餌羣嬉之兒。（註四）

或以近親而封，或以賄賂而得，不必由於建立功勳，李秀成供狀記道：

去年天王改政，……又改各王之號，此是天王失算。前封東、西、南、北、翼各王自殺東北王之後，永不封王。今封王者，因其弟洪仁玕九年之間而來，見其弟至，格外歡喜，到京未滿半月，封為軍師，號為干王，降詔天下，要人

悉歸其制。封過後，未見一謀，天王再而復思，又見各舊功臣久扶其國，心中不忿。天王見勢不同，自翼王他向保國者陳玉成與我爲首，那時英王名顯，我名未成，日日勤勞，幫爲運算，凡事不離。天王見封其弟兩月之久，一事無謀，已知愧過難對功臣，故先封陳玉成爲英王。封陳玉成之後，見我日有戰功，勤勞其事，對我不住，……降詔封我爲『萬古忠義』，親自用黃緞子書大字四個，稱『萬古忠義』四字，並賜綢緞前來，封我爲忠王。……自此之後，日封日多。然封這有功之人，又思那個前勞之不服，故而盡亂封之，不問何人，有人保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銀錢者，欲爲作樂者，用錢到部，而又保之。無功偷閒之人，各有封王。外帶兵之將，日夜勤勞之人，觀之不忿，力少從戎，人心不服，戰守各不爭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國之棟樑，主見失算，封出許多之王，言如箭發難收，又無法解，然後封王俱爲列王者，因此之由也。然後列王封多，又無可改，王加頭上三點，以爲⿱小王字之封。人心更不服，多有他圖，由此兩舉而散無涯也。

因此，又使羣衆解體。

至於領袖的腐化及其內訌，也同樣的決定使這次革命不得不終歸失敗的命運。洪楊諸人，自稱爲上帝之子，自己造成了一個特殊的階級他們沒收羣衆的財產歸入聖庫，而他們自己則積聚私蓄；他們禁止羣衆夫妻會合以爲觸犯天條，而他們自己則廣置妻妾。並且由於養尊處優的環境使他們之間又掀起了爭權奪利的暗鬭。在楊韋火併之前，賊情彙纂的編者在韋昌輝傳中便已經預言了。（註五）他在僞朝儀一節中也論道：『夫首逆數人，起

自草莽結盟，寢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於一室，得計便機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勢。今踞江寧，爲繁華迷惑，養尊處優，專務於聲色貨利，往之倚爲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告，氣脈不通，已成痲痺不仁之象。賊之滅亡，可燭照而數計矣」。（註六）到了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內訌果然起來，韋昌輝殺了楊秀清，洪秀全、石達開又殺了韋昌輝，不久，洪秀全又把石達開迫走了。這一次內訌，給太平天国的命運以致命的創傷。楊韋內訌以前，羣衆是團結的，是萬衆一心的。楊韋內訌以後，羣衆纔開始解體。楊韋內訌起於咸豐六年七月，是年十一月江西方面的太平軍便有降清的事件發生。駱秉章援江官軍克復袁州分宜郡縣兩城摺記道：「臣維逆賊金田倡亂以來，糜爛半天下，徒恃其黨堅交祕，足以鈐束羣賊，就其驅使，而僞目兇渠又各以威詐脅其黨衆，令其顚倒於鋒鏑之中，而末由自拔。軍興以來，克復城池雖多，究未有賊渠獻城乞命之事，一則劫於賊之積威隱忍不決，一則自知罪孽太深終恐難逃顯戮也。此次降賊李能通本係賊中著名頭目，因袁州援盡食絕，始幡然決計投誠，與尋常自拔來歸者有間，然密囑其黨開門延納官軍，似其贖罪之誠尚可信。現在江西踞城各股多係老賊，與廣東新附之賊相參，知李能通投誠之事，則彼此之猜端必起，機或可乘，未嘗非用奇之一助也」。（註七）跟着，咸豐八年（一八五八），李昭壽獻滁州，咸豐九年（一八五九），薛之元獻江浦。同年，名將韋俊獻池州。著名將領多投降到清軍去。及到末年，除了少數的廣西的隊伍外，其餘大多數的兩湖三江的羣衆，都聞風投降清軍。李鴻章復曾沅浦方伯書說：「敝鄉人陷在忠黨（註八）最多，來歸者相望於路。詢賊情人人欲散，忠逆亦不自持」。（註九）上

曾相書說：「平乍嘉興之賊，紛紛說降」。(註一〇)復吳仲僊漕帥書論李秀成失蘇州後的軍情文說：「所部多兩湖三江，各有攜志」。(註一一)這種土崩瓦解的覆滅，其實早已起於楊韋內訌之日。據李秀成供狀所記，當日人心都各有散意，如果不是清軍將帥對太平軍中的廣西人特別施以屠殺，羣衆早已解散了。

我們從上面的論述看起來，可以知道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還是貧農革命。而這次革命所以終不得不給曾國藩所代表的士大夫社會打倒，十五年來貧農們所流的鮮血只替歷史上添上「同治中興」四個字的緣故，我們在歷來貧農革命的結果上，在這次革命運動的本身錯誤上，便已經很分明的看得出它的必然的命運。

(註一)湘綺樓日記，同治十年二月初七日日記。

(註二)見賊情彙纂卷四，賊行營規式

(註三)見賊情彙纂卷八，偽律諸條禁。

(註四)卷三，偽官制。

(註五)卷一。

(註六)卷六。

(註七)駱文忠公奏議。

(註八)「忠黨」即指李秀成部下，因李秀成封忠王，故曰「忠黨」。下文「忠逆」同。

(註九)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

(註一〇)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四。

(註一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四。

第八章　革命的影響

一　軍制方面

太平天国起事於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天京給湘軍攻下，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餘衆在廣東嘉應州全部給左宗棠撲滅。起事的地域，始於珠江流域的廣西省潯州府桂平縣金田村，而戰事的區域，則自珠江流域而長江流域，復以長江流域的金陵爲中心，建爲國都，分軍北伐，而直達黃河流域。這一役大革命，時間延長至十五年，戰區蔓延到了全中國本部各行省。所以大亂之後，無論在軍制上、政治上、社會上、財政上、以及後來的文化運動革命運動上，都留有它的影響。我們在這最後的一章中，將逐一地敘述於後。

太平天国革命第一個重大的影響，便是軍制方面。我們在第二章革命的背景下中說過，在太平天国以前，清代的軍制是綠營與八旗的軍制，但八旗入關不久，便已沒落，國家的常備軍其實只有綠營，而綠營到了嘉慶、道光時代，暮氣日深，積弊日重，將弁則薰染官習，兵卒則驕頑疲弱，也不可復用。所以金田事起，廣西綠營即無法應付。是時廣西額兵二萬三千，土兵一萬四千，兵數不算少，清廷復羽檄交馳，紛紛徵調外兵，各省綠營雲集廣西。乃一敗於

平南官村，而永安陷再敗於永安古東口，而桂林被圍。於是太平軍遂長驅北伐，經兩湖，出長江，其時淸廷防湖防江的綠營，都聞風先潰，而欽差大臣賽尙阿、徐廣縉、向榮諸人先後所統的大營軍隊，常落在敵後，只成尾追之勢，故太平軍便得以疾風掃落葉的聲勢，不過兩年工夫，就席捲了東南，佔領了金陵。

這時候，綠營的戰鬪力已完全不可用，舊社會的統治勢不能再繼續維持下去，士大夫社會裏有識的人士漸有見及必須另建新軍的必要。咸豐二年（一八五二），曾國藩奉命辦理湖南團練搜查土匪事宜，國藩奉命之初，卽奏陳改弦更張另練新軍的意見，於是治兵於長沙，以儒生領山農，創立湘軍。咸豐四年（一八五四），曾國藩奉命統率湘軍出征，八月克復武昌漢陽兩城。十月，大敗太平軍於田家鎭。太平軍到了這個時候，纔第一次遇到他們的強敵。咸豐六年（一八五六），湘軍再克武昌，湘軍的聲威震動中外。其時淸廷對湘軍雖有所顧忌，但終不得不寄湘軍以平定大亂的重任。綜計太平天国之役，湘軍所至，如王鑫、劉騰鴻、蕭啓江、蔣益澧的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如李續賓、李續宜的轉戰皖北，如張運蘭、唐義訓的轉戰皖南，如曾國荃的克復安慶、金陵，如左宗棠的用湘軍平浙江，定福建，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的旌旗。其西南諸道則蕭啓江率師入蜀，而劉蓉嘤平蜀亂，劉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其後陳湜防守山西，劉松山追逐捻匪於河南、山東、直隸，遠征陝西、甘肅，湘軍且到了西北諸道。一軍之衆，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至於繼湘軍而起的淮軍，淮軍本由曾國藩所手創，其營制乃一依湘軍，卽當日湘淮軍外其他勇營，也紛紛索取湘軍營制，倣照湘軍的組織。故到太平天国覆滅及捻匪平定後，由湘淮軍改編成的

「防軍」使代替了綠營。清史稿兵志記防軍的起源道：

防軍初皆召募，於八旗綠營以外別自成營，兵數多寡不定，分布郡縣，遇寇警則隸於專征將帥，二百年間，調發徵戍咸出於此。若乾隆年臺灣之役，乾嘉間黔楚征苗之役，嘉慶間川陝教匪之役，道光年洋艘征撫之役，皆暫募勇營，事平旋撤。故嘉慶七年，楚北初設提督，卽以勇丁充補標兵，道光十七年以練勇隸於鎭筸鎭標，二十三年以防守海疆之水陸義勇三萬六千人仍遣回本籍，無防練軍之名也。道咸間，粵匪事起，各省多募勇自衞，張國樑募潮州勇丁最多。咸豐二年，命曾國藩治湖南練勇，定湘軍營哨之制，爲防軍營制所昉。迨國藩奉命東征，湘勇外益以淮勇，多至二百營，左宗棠平西陲，所部楚軍亦百數十營。軍事甫定，各省險要，悉以勇營留防，舊日綠營，遂同虛設。綠營、兵月餉不及防營四分之一，升擢濡滯，咸辭兵就勇。粵捻既平，左宗棠諸臣建議，防營誠爲勁旅，有事則兵不如勇，無事則分汛巡守，宜以制兵爲練兵，而於直隸江淮南北扼要之處，留勇營屯駐，遂有防軍之稱。（註一）

不但防軍爲湘淮軍的轉變，卽所謂「練軍」，雖在綠營內選擇訓練，而其營哨餉章悉準湘淮軍制，與防營同。其屯聚以散爲整，重在防守要地，其用也與防軍同，而與綠營分布列郡汛地的防守制度異。故練軍卽防軍，也就是從湘淮軍轉變而來。清史稿兵志記練軍的起源道：

練軍始自咸豐間，以勇營日多，屢命統兵大臣以勇補兵額，而以餘勇備緩急，尙無別練之師。至同治元年，始

令各鎭吏，練勇人數口糧悉數報部稽核。是年於天津創練洋槍隊。二年以直隸額兵酌改練軍。四年兵部戶部諸臣會議選練直隸六軍，始定練軍之名。各省練軍乃踵行之。

練軍雖在額設制兵內選擇，而營哨餉章悉準湘淮軍制，與防營同。其綠營制兵分布列郡汛地，練軍則屯聚於通都重鎭，餉器械，勤訓練，以散爲整，重在屯防要地，其用亦與防軍同。故練軍亦防軍也。（註二）

自同治以後，綠營兵屢加裁汰，綠營制度遂同虛設，國家衛戍之責遂專屬於防練軍。其後防練軍雖改爲巡防隊，又再改爲陸軍，而要其源都從湘淮軍這一個系統演變下來。所以論有清一代的軍制，當以湘軍爲轉變的關鍵。

湘軍既代替了綠營，湘軍的制度既代替了綠營的制度，於是清代的兵制便起了根本的改革，結果便造成了後來軍閥勢力的起源。我們知道，綠營制度的特點是官皆選補，兵皆土著。此制利弊各半，好的地方是兵非弁之所自招，弁非將之親信，軍隊自不會成爲私人的勢力。壞的地方是以傳舍之官，馭世業的兵，正如州縣之於吏役，欲其整飭訓練，服教從風，必不可得。而且，綠營調發的制度，此營一百，彼營五十，徵兵一千，已抽選數營或十數營之多，其卒與卒已不相習，而統領之將又不是平日本管之官，一省所調如此，他省也相同。即同一營伍，或今年一次調百人赴粤，明年一次調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後，赴防有遠近，勞逸也遂乖然不能以相入。因此勝則相忌，敗不相救，積漸而成風氣。故咸同以前，國家沒有軍人跋扈的事件，但綠營也驕悍疲弱不可用。湘軍之興，曾國藩奮然以召募易行伍，即首先對綠營的制度，加以根本的改革。故湘軍之制，勇皆營官之所自招，營官皆將之親信，上下相維『將卒親睦，

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註三）湘軍所以終能收平定太平天国的大功，其軍制使於指揮訓練，能用人死力實爲最大的原因。所以李鴻章論湘軍成功之由與和春張國樑綠營覆敗之故的話有道：『用兵十餘年，至近日而稍見功者，委任專而事權一也。若以此軍隸別部，兵與將不習，上與下相猜，必不能用人之死力。從前江南和張大營多此辦法，卒至顚覆。楚軍曾、胡、李諸公本一家人，通力合作，遂以成功』。（註四）但是，軍制自經過這個根本的改革後，從前本是國家的軍隊，而今便逐漸地從國家的轉到私人的手中去了。

這種傾向，我們專從湘軍還不很看得出來，因爲湘軍初起諸傑，如羅澤南、王鑫、李續賓、楊岳斌諸人，都自負才氣，羅、王、李、楊諸人與曾國藩的關係，和後來的所謂大帥之與統領營官頗有不同，他們之間只以道義相維繫，可去可留，故羅、王、李、楊諸人都各有自樹一幟的志願，不盡以曾國藩之馬首是瞻。到了淮軍便不同了。李鴻章以大帥統轄淮軍，與湘軍初起時的曾國藩以一無權無勢的在籍侍郎只以道義相號召，常居客寄地位來指揮湘軍的情形不同，而淮軍諸將領與羅、王、李、楊諸人氣概既有分別，他們所處的地位也與羅、王、李、楊諸人不同，故淮軍諸將都沒有自闢乾坤之志，而惟在李鴻章的腳下盤旋，曾國藩在征捻之役，對此點曾向李鴻章說過他的感慨道：『淮勇各軍既歸敝處統轄，則閣下當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處私有請求者，批令概由敝處核奪，則號令一切驅使較靈。以後鄙人於淮軍除遣撤營頭必先商左右外，其餘或進、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參、或添募、或休息假歸，皆敝處徑自主持，如有不妥，請閣下密函見告。自問衰年氣弱，但恐失之過寬，斷無失之過嚴，常存爲父爲師之心腸，或責之，或激之，無

非望子弟成一命名作一好人耳。昔麻衣道者論易云，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跟下盤旋。前此湘軍如羅羅山、王璞山、李希菴、楊厚菴輩，皆思自立門戶，不肯寄人籬下，不願在鄙人及胡駱等腳下盤旋。淮軍如劉潘等氣非不盛，而無自闢乾坤之志，多在台從腳下盤旋，豈閣下善於制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註五）淮軍的軍制，卽沿襲湘軍的軍制，湘淮軍制都是使軍隊會成爲私人勢力的制度，湘軍將領不盡以曾國藩爲歸依，而淮軍將領則惟在李鴻章腳跟下盤旋，乃曾李所處情勢先後不同，並不是由於李鴻章個人善於制馭軍隊出藍勝藍之故。在李鴻章時代，李鴻章所統的淮軍幾乎可說是李氏一人的勢力。故以曾國藩的威望，且爲淮軍的創立者，勦捻之役，他統轄淮軍還不能指揮如意，而不得不乞求李鴻章兄弟出來幫他督率。他懇求李鴻章道：『區區微忱，非強賢昆仲以所難，實見捻匪非淮勇不能滅，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註六）細繹曾氏此語弦外之音，可見淮軍在興起初期，就已經成爲私人的軍隊。後來李鴻章老死，袁世凱承繼他的勢力，卒移清祚。故論北洋系勢力的起源，以及民國以後軍閥的據地自雄造成割據局面的由來，實以湘軍對綠營制度的改革爲起點，而湘軍之興，則由於太平天国戰役時勢所造成。

（註一）兵志三。

（註二）兵志二。

（註三）王闓運論湘軍營制語，見湘軍志營制篇第十五。

（註四）復方比部信中語，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六。

（註五）覆李宮保，見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五。

（註六）復李宮保，見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五。

二　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有兩種重大的影響：（一）從滿人統治的政權移到漢人之手，（二）從中央集權漸轉到地方分權。

我們在第二章革命的背景中說過，在太平天国興起以前，清廷將相要職，漢人從無居之者，中國的政權是全握在滿人的手中。到了金田發難，賽尚阿以大學士視師，遷延失機，令敵坐大。賽尚阿既黜，琦善繼爲欽差大臣督師江北，復老師縱敵。清廷無法維持其統治，纔不得不以平亂之責寄於漢人。同治初元，曾國藩總督兩江，管轄四省，長江三千里幾無一船不張曾氏旗幟，四省釐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東南財賦之區盡歸曾氏一人掌握。當日湘軍一系人物『苟能軍無不將帥者，苟能事無不軒冕者』。（註一）繼起的淮軍，其勢力也差相埒。故到太平天国既平，封疆大吏漢人居其強半，固不待說，即內而樞府，自沈桂芬入掌軍機，開漢人執政的先例，其後李鴻藻、翁同龢、孫毓汶、徐同儀繼之，政府實權，也歸漢人掌握。於是從前滿人統治的局面，便換了漢人統治的局面。

至於從中央集權漸轉到地方分權這一點上，我們也同樣的很明顯地看得出來。本來，中央集權的政制，中國

自宋明以來，便已經很鞏固了，國家權力都集中於中央政府，內外彼此互相牽制，而天子執長鞭以笞畜之，所以雖侍中十年開府千里，而一詔朝下，印綬夕解，束手就吏，無異匹夫。清繼前代，中央政府的權力，較宋明爲尤重。道光時人梅曾亮在上方伯書中曾論道：『竊念國家熾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驚，一百七十年於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凜凜，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揉制若子孫。非從中覆者，雖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倫比』。（註二）這種局面，經過太平天國之役也轉變了。咸豐十年（一八六〇），江南大營再潰，江浙郡縣相繼陷落，江南糜爛日甚。次年十月十八日，戶科掌印給事中林之望奏言：『軍興以來，賊勢披猖，幾無完省，而三江兩湖用兵最久，總由各路統兵大臣意存畛域，不能統籌大局，呼吸相通，以致此攻彼竄。若以曾國藩經略三江兩湖，俾得事權歸一，挽回積習，庶幾迅奏膚功，惟用人操之自上，非臣下所敢妄議，應否欽派經略之處，出自聖裁』。（註三）此奏既上，朝議贊同，於是同日上諭內閣曰：『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悉歸節制』。（註四）曾國藩奉詔後再三陳請收回成命，他的欽奉恩諭再辭節制四省摺中，明白指出此例一開，將啟他日外重內輕之漸。他奏道：『至於節制四省之名，仍懇聖恩收回成命，臣非因浙事既已決裂，預存諉過之意，倘左宗棠辦理毫無成效，臣當分任其咎。所以不願（即制四省）再三瀆陳者，實因大亂未平，用兵至十餘省之多，諸道出師，將帥聯翩，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係甚大，區區愚忱，

仰祈聖明鑒納」。（註五）淸廷不許其請，對曾國藩的謙卑遜順，慮遠思深大加褒獎，以爲「若非曾國藩之悃忱真摯，亦豈能輕假事權？……」國家用人行政自有權衡，各路統帥諒不敢妄行矜詡，希假事權，以瑣屑陳奏上煩朝廷裁抑也」。（註六）但是到了太平天国既平，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諸人都手握重兵，分膺疆寄，曾國藩雖以避嫌忌諱，在克復金陵後，立卽解散湘軍。但湘淮兩軍，曾李兩家原屬一氣，代興的淮軍還是曾氏勢力的保障。（註七）至於淮軍之爲李鴻章個人的勢力，左宗棠之威震西陲，更不用說。此時將帥間雖然沒有爭權競勢之風，而兵權在握，國家實權已操在這班所謂中興名臣的漢人手中。故淸廷每遇國家大事自不得不問他們徵求意見，於是中央政府大權逐漸的傍落，地方的權力一天天的加重，中央集權的政治便漸漸的轉到地方分權上去。後來庚子義和團之役，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等東南疆吏不奉朝命與八國聯軍訂立東南互保的條約，便是近代中國中央集權勢力的沒落與地方分權勢力第一次的擡頭，而其導源已起於太平天国戰役時期。

* * * * *

我們在本節中，應該附帶提及在太平天国戰役時期所造成的上海公共租界制度的事件。上海公共租界爲根據南京條約而來。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由英領巴爾富（Balfour）與上海道宮慕久訂立「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劃定居留地界，是爲租界的起源。但其時租界制度的基礎都還沒有建立。到了太平天国建都金陵，佔領鎭江後，接着天地會支派小刀會首領劉麗川佔據上海，在滬外人，深感上海危迫，以淸吏無力保

護，而又不願依國際慣例自行離境，乃以『需要』與『自衛』爲藉口，不顧違背約章，擅自擴充權力，以維持租界的中立。先是清吏對於管理外人及建設市政、自治等項自始卽漠不關心，至是外人乃越俎代庖，自行管理建設。此外，並向居住租界的華人徵稅，除地捐碼頭捐外，房屋也須納捐。華人以進租界居住多爲逃難，故只知納稅，不知爭代表權，以後遂沿而不改。同時，租界內一切較輕案件，都須先由英領審理，並由英領處以拘役等刑，其較重者始移送界外清吏訊判。凡清吏欲拘捕居住租界內的華人，必須先得該租界領事的同意，其拘票非先經領事加簽，不得拘捕界內任何人等。此時領事裁判華人之權，已爲外人所攫得。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上海道並派員至英領事館與英領事組織一法庭，稱爲洋涇浜北首理事衙門，此卽會審公廨的起源。於是中國對於租界內的主權、行政權、司法權都逐漸的喪失，今日上海公共租界制度的基礎使建立於此時。所以密勒（Millard）氏稱『上海居留地現在性質之原則與先例，多樹其根基於太平天国戰役』（註八）的觀察，是不錯的。

（註一）郭嵩燾與曾沅浦書中論同治初元湖南人才的話，見養知書屋文集卷十。
（註二）柏梘山房文集卷二。
（註三）勦平粵匪方略卷二百七十六。
（註四）同上。
（註五）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
（註六）勦平粵匪方略卷二百八十九。

（註七）曾國藩致沅弟書中語，見曾文正家書卷十。又曾國藩致李鴻章書中有道「來示謂中外倚鄙人為砥柱，僕實視淮軍閣下為轉移，淮軍利，閣下安，僕則砥柱也；淮軍鈍，閣下危，則僕累卵也」。（致李宮保，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六）都是曾國藩倚靠淮軍的勢力以為保障的自白。

（註八）見 China, Where it is and Why! p. 257.

三　財政經濟方面

（1）釐金制度的興起

清代咸豐以前，財政的主要歲收為地丁、錢漕、關稅、鹽課四項，而地丁一項約佔全部收入三分之二。故在這個時期清廷每年歲費，可謂大部仰給於地丁。到了金田發難，太平軍橫掃東南，佔領了金陵，並且分軍北伐，被兵各省，人民流離失所，地丁多不足額，稅課竟存虛名。同時，所藉以應付急需的庫藏，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為一千二百四十萬兩，到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減為八百餘萬兩，到咸豐二年（一八五二），軍興剛兩年，已用去五百餘萬兩，於是歲入既缺額甚巨，而庫藏復竭，所賴以補助財政者惟捐輸一項。計自咸豐二年二月起至次年正月止，一年所得凡五百餘萬兩。此款用來彌補其時財政的缺額，仍有少不濟用，緩不應急之勢。且，捐係由富人自動捐貲，年年都在一定的區域內勸行，為時若久，則未有不失功效的。故在此情形下，釐金制度的興起與貨幣膨脹政策的實行，都由此產生。後來在通商口岸的上海，因餉源斷絕，向外商借債維持，又開了外債的嚆矢。另一方面，最初是

爲着軍需緊急，減賦令人民踴躍樂輸，與爲着收拾人心，不得不減輕人民負擔以示惠。後來大亂既平，又因爲兵燹後田畝拋荒，壯丁死喪，政府不能竭澤而漁，又不得不體恤民困而減輕田賦。於是長江流域在大亂期中與亂平之後，便有減賦運動。此外，上海的海關，因爲上海陷落，淸吏無法行使職權，不得不任由外國領事代收，由是在英、法、美領事要挾之下，成立了外人管理海關的制度。故太平天国一役，對財政方面的變革有關係者有五方面，卽：（一）釐金制度的興起，（二）外人管理海關制度的成立，（三）貨幣制度的變動，（四）長江流域的減賦，（五）外債的嚆矢。

這五種變革最先起來的爲釐金制度。釐金制度創始於刑部侍郎雷以諴。咸豐三年（一八五三）雷以諴治軍揚州，以保東路裏下河各州縣門戶，因軍餉無着，乃於是年九月創立抽釐之法，初時在附近揚州城的仙女鎮、邵伯、宜陵等鎮試行，至咸豐四年（一八五四）三月，始行奏報，並請於江蘇省各府州縣也仿行勸辦。今錄其請推廣釐捐助餉疏中的大要於下：

> 竊自粵匪竄擾以來，地已十省，時及四年。各處添兵，卽各處需餉，兼之鹽引停運，關稅難征，地丁錢粮復間因兵荒而蠲免緩征，國家經費有常入少出多，勢必日形支絀，而逆匪蔓延，又不知何時平定，有餉無兵，尙可招募，有兵無餉，更難支持。……臣晝夜思維，求其無損於民，有益於餉，並可經久而使民者，則莫如商賈捐釐一法。因裏下河百產之區，米多價賤，曾飭委員於附近揚州城之仙女鎮、邵伯、宜陵、張綱溝各鎮，略仿前總督林

則徐一文愿之法，勸諭米行，捐釐助餉，每米一石捐錢五十文，計一升僅捐半文，於民生毫無關礙，而聚之則多，計自去歲九月至今，祇此數鎮米行，幾捐至二萬貫。既不擾民，又不累商，數月以來，商民相安，如同無事。……臣因此法商民兩便，且細水長流，源遠不竭，於軍需實有裨益，是以現在將此法推之裏下河各州縣米行，並各大行舖戶，一律照捐，大約每百分僅一分，甚有不及一分者，令各州縣會同委員斟酌妥議，稟明出示起捐其小舖戶及手藝人等概行蠲免，以示體恤，現在仙女廟各行舖戶均已議妥，業於三月初十日起捐，並將該鎮所立章程刊刻刷印，發交各州縣照辦，俟裏下河各處勸齊起捐後，究竟可以收捐若干，自應隨時據實奏聞，如果爲數較多，不惟臣營可資守禦，並可協濟琦善軍營之需。……惟裏下河特彈丸一隅，乃河臣楊以增勸捐於斯，此去彼來，商民幾無所適從。其實臣捐釐之處，僅止揚通兩屬，其大江南北各府州縣未經勸辦者尚多，如果江蘇督撫及河臣各就防堵地方分委廉明公正之員會同各該府州縣於城市鎮集之各大行舖戶，照所擬捐釐章程，一律勸辦，俟於江南北軍務告竣，再行停止。(註一)

在此疏中，可以看見雷氏創辦釐金的經過情形。他分釐金爲二種，卽活釐與板釐。活釐也叫做行釐，板釐也叫做坐釐。前者爲通過稅，抽之於行商，後者爲貿易稅，抽之於坐賈。他所定的稅率，按原則說，乃以從價爲標準，卽值百抽一，但在實質上，因抽釐的貨物多爲日用品及必需品，此項物品的數量多而價值少，變遷爲省手續起見，故有一大部分貨物都改爲從量抽釐，僅一部價值稍高的物品仍按價抽釐。當日雷以誠奏報之摺既上，旋奉上諭道：

諭軍機大臣等：當以誠奏試行捐釐助餉業有成效請推廣照辦以裕軍儲並開列章程呈覽一摺，粵逆竄擾以來，需餉浩繁，勢不能不借資民力，歷經各路統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撫奏請設局捐輸均已允行。茲據雷以誠所奏捐釐章程係於勸諭捐輸之中，設法變通，以冀衆擎易舉。據稱裏下河一帶辦有成效，其餘各州縣情形，復不甚相遠，著怡良、許乃釗、楊以增各就江南北地方情形妥速商酌，若事屬可行，即督飭所屬勸諭紳董籌辦，其有應行變通之處，亦須悉心斟酌，總期於事有濟，亦不致滋擾累，方爲妥善。（註二）

同年十一月，欽差大臣勝保遂較雷以誠更進一層，奏請推行釐金於各省。戶部奉旨議覆，對勝保的樂觀態度雖有疑慮，但對勝保的主張卻贊同。戶部的意見是：『應請旨飭下各省督撫專委道府大員督同州縣揀派公正紳董各就地方情形，妥爲籌度，……所有用兵省分酌量抽釐之處，應由各該督撫籌議具奏。……所收錢文，悉數解充兵餉，亦不准地方擅自挪移，啓影射侵漁之弊』。（註三）各省接戶部咨文後，湖南仿行最先，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四月，由湖南巡撫駱秉章奏辦，設立釐金總局於長沙。同年八月，曾國藩督師江西，奏請在江西試辦釐金，協濟軍餉。十一月，湖北巡撫胡林翼仿行於湖北。十二月，四川總督黃宗漢創辦鹽釐於四川。咸豐六年（一八五六），烏魯木齊與奉天跟着試辦。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吉林、安徽、福建三省也都相繼仿行。同年六月，勝保復上一疏，請飭各省普律抽釐。此次戶部議覆，便完全贊同勝保的意見，主張『應請旨飭下各該督撫體察情形，慎選廉明之吏，於水陸交衝地方，妥籌酌辦』。（註四）此議一定，釐金制度便漸漸的遍行於全國。

這一個稅收制度，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戰爭中，供給了一項巨大的軍費。軍興十多年，各路軍營都靠這一項收入來維持軍餉，而湘軍的餉源，便幾乎都出自釐金。（註五）到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釐金收入總數約在一千萬兩以上，佔咸豐前國家歲入總數四分之一強。故終清一代，不曾撤消，直到民國十九年國民政府纔明令廢止。這個制度，在中國財政史上，自咸豐三年至民國十九年（一八五三——一九三〇），共有七十七年的歷史。（註六）

（2）外人管理海關制度的成立

外人管理海關制度的緣起，由於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八月，小刀會響應太平軍起事佔領上海城後。當時地方官吏逃亡一空，徵稅機關，完全停止。遂由英領事阿利國（R. Alcock）與當時在上海貿易有密切關係的美法兩國領事協商，提議在秩序未恢復以前，採用領事代徵的辦法，暫代中國官吏向外商徵稅，美法兩國領事都贊同此議。但此項辦法，在英、美、法三國商人看起來，頗有不公平的地方，因三國船舶都須正式納稅，而他國船舶，則出入自由，可不納稅。故施行不久，美領事即起而反對此不公平的徵收方法，脫出臨時協定，首先許美船兩隻無稅出港。英法兩領事也知單獨強制本國商人納稅為不利，於是此協定遂歸於破壞。

領事代徵的辦法既經破壞，至咸豐四年（一八五四）正月，上海道吳健彰得英領阿利國以援助相許，在租界內一關棧設立臨時稅關，開始徵稅事務，於是海關行政復歸清吏掌握。但是，開關後不久，英領以臨時海關行政腐敗，雖曾屢有勸告清吏，迄未得滿意的答復，至三月時遂決計允許英船自由出入，各國效尤，上海遂成為絕對自

由港，不過上海之成爲自由港，並不是阿利國的本意，後來，阿利國創議，主張海關任用外人，以清積弊，吳氏從其議。是年六月，吳氏與英領事阿利國、美領事麥菲（Murphy）、法領事愛棠（Edan）簽訂關於上海江海關組織的協定九條，其關於任用外人的是第一和第五兩條：

第一條　海關監督最困難事爲不能廣羅誠實精明熟悉外國語言人員以執行徵收事務及履行條約。惟補救此點之法，爲引用外邦人才於海關，由關道選擇任用，授與權柄，以行使其職權。

第五條　外國委員如有勒索賄賂辦事疏忽等情，一經查出，即由道臺會同英、美、法三國領事審理，以定去留。（註七）

依原案本應指令法人史密斯(A. Smith)爲三國的代表，嗣從吳氏的希望，三國各出一人組織關稅管理委員會(Board of Inspector)。是月，新制度即開始實行。各國派員英爲威妥瑪（T. F. Wade）、美爲卡爾（L. Carr）、法爲史密斯（A. Smith）。然而三頭政治，僅一名目而已，其實權未幾即歸於英國委員之手。一年後，三國派員都有更動，英國的威妥瑪回任副領事原職，由領事館通譯官李國泰（H. N. Lay）接任，實權仍在英人掌握中。此即後來海關制度的起源，後依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天津條約善後通商章程，此制度遂推行於新舊各商埠。（註八）

（3）貨幣制度的變動

貨幣制度的變動，也起於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咸豐以前，清代的貨幣制度本是銀銅並用的雙本位的制

度。到了這時候，因爲財政的困難，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時期，加以銅斤與銀並爲淸代貨幣制度的基礎，銅斤例由產銅的雲南每年解運至北京，以供鼓鑄戶工兩局（寶泉寶源二鑄局）歲需銅爲六百十六萬三百二十斤，因爲軍事的影響，道路阻塞，又無法應時解到。淸廷想要挽救此時祇有實行貨幣膨脹的政策——鼓鑄大錢，濫發紙幣，結果便產生了一個複雜的幣制。

計當日施行的幣制可分爲兩大類，一爲紙幣，一爲硬幣。而每類中復可分爲兩種，卽紙幣包括銀票與錢票，硬幣包括銅大錢與鐵錢。這四種幣制，都創於咸豐三年中，但都不能長久的穩定的推行。壽命最短促者爲當百以上銅大錢，行不一年卽行收回，次之爲鐵錢，行至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卽行停鑄，又次之爲錢票，至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也卽廢止。惟銅當十錢與銀票通行較久，前者至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時政府始行停鑄，後者在同治末年也仍通行。故這個貨幣制度的變動，爲時並不久，到同治時已經漸復舊觀。不過因爲幣制的複雜，以致金融紊亂，社會民生已交受其苦了。（註九）

（4）長江流域的減賦

長江流域的減賦，起於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湖南巡撫駱秉章。咸豐七年（一八五七），湖北繼起。於是江西、安徽、浙江、江蘇四省都跟着起來做減賦運動。江西實行於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安徽實行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浙江實行於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同年，江蘇也實行。

這次減賦的性質，可分爲兩方面：一、裁減浮收，僅酌留州縣辦公費；二、減定江浙重賦的浮額。至於這次長江六省裁減漕額及浮收等項，合計銀一百五十萬餘兩，錢六百四十萬餘串，米一百七十萬餘石。同治三四年時，江浙米價每石約值銀二兩五錢，每銀一兩約值錢一千三百餘文，我們以這市價爲估計的標準，將上面的總數化成以銀兩爲單位，則共達一千零七十五萬餘兩。這估計因各地市價不同，卽同地的市價也時有漲落，自然不能精確，但至少給我們以一個大概的印象，使我們知道這個數目的巨大。不過，政府雖替人民省了這許多錢，國庫的收入，卻並不受到多大影響，因爲所裁減的都是那些官吏中飽的浮收，其中僅有江浙減額八十萬石，約合銀百餘萬兩，算是國庫收入的損失而已。

這次減賦運動行於長江流域，長江流域是太平天国戰區的中心，受禍最重的地方，亂後民生一旦得釋去浮收與過重的糧賦，田主固受其惠，卽一部分的佃農，因減賦運動者的主張，以爲『租以供賦，減賦自宜減租』(註一〇)的理由，因而佃農也受到減租的惠賜，如江蘇省的情形。於是殘破的農村，纔逐漸得到復興。所以咸同間長江流域的減賦，可說是同治中興的一個原因。(註一一)

（5）外債的嚆矢

外債的嚆矢，始於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底，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進攻上海的時候。清軍淞滬各防軍餉，本以稅釐爲大宗；時上海給太平軍重重包圍，各路梗阻，商販裹足不前，上海市貿易停頓，以致釐捐無收，軍餉來

源斷絕，清吏無法維持，便由江海關道吳煦經手，以江海關出票擔保，並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江海關洋稅中攤還，其數目為三十萬兩。於是中國外債的歷史卽於此時開始，而成立了第一次的外債。

跟着同治元年，福建巡撫瑞璸先後向英法各國商人兩次借款，計連息銀共為四十萬四千八百八十兩。嗣任巡撫徐宗幹復續向洋商借銀十萬兩，內貼息銀一萬一千兩，三次共計五十萬四千八百八十兩，都由閩海關擔保，其中由粵海關攤還二十萬，由閩海關攤還三十萬四千八百八十兩。同年，江蘇因軍餉支絀，復向洋商借款，由江海關道吳煦向洋商墊借，數目為二十五萬四千五十五兩，也在該關洋稅項下攤還。

這樣，便漸漸的啓示中國人利用外債的路。（註一二）

（註一）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三十七。

（註二）咸豐朝東華續錄卷二十六。

（註三）見皇朝經濟文編卷五十五所載戶部遵議勝保一摺。

（註四）見皇朝經濟文編卷五十五，戶部遵議勝保奏請各省普律抽釐疏。

（註五）據王闓運湘軍志籌餉篇。

（註六）本節據自羅玉東先生釐金制度之起源及其理論，見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一卷第一期。

（註七）見江恆源編中國關稅史料第三編。

（註八）本節根據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及高柳松一郎的中國關稅制度論兩書。

（註九）本節據湯象龍先生咸豐朝的貨幣，見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二卷第一期。

（註一〇）馮桂芬江蘇減賦記中語見顯志堂稿卷四

（註一一）本節據夏鼐先生太平天国前後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見清華學報第十卷第二期。

（註一二）本節據湯象龍先生民國以前關稅擔保之外債，見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一期，及中國第一次外債，見天津益世報史學第四期兩文。

四　社會方面

在社會方面，太平天国亂後的社會民生有兩種大變動：（一）人口減少，（二）田畝拋荒。

我們在第一章革命的背景上中說過，清代人口自康熙以來年年增加，到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全國人口已達四萬一千四百四十九萬三千八百九十九名口。（註一）這一年，太平軍初起，作戰的範圍祇在廣西潯州一帶，各省還不曾受到兵燹，所以人口仍有增加，到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只一年之間，便增到四萬三千二百十六萬四千四百四十七名口。（註二）但自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太平軍北出兩湖，進攻江南後，戰區擴大，所以這一年的人口便立刻減退到三萬三千四百四十萬三千三十五名口。（註三）自此以後，十多年的大亂，到了同治四年（一八六四），太平天国平定後，中國人口便只剩下二萬三千七百四十五萬八千五名口。（註四）據此統計，中國人口在大戰中差不多死亡了二分之一。這個統計是根據東華續錄的記載，我們固然不能信為十分精確，但清代自乾隆以後，戶口調查的方法頗嚴密，其報告必與實際情形大致相近。所以當日社會上便發生了人口稀少的現象：有

昔日八十多萬人口的都市，亂後陸續來歸及存留遺民合計不過數萬口者，如浙江的杭州。（註五）有幾個府縣本地居民幾至靡有孑遺者，如江蘇的鎮江府。（註六）有昔日本是『半里一村，三里一鎮，炊煙相望，雞犬相聞』的區域，『今則一望平蕪，荆榛塞路，有數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如江蘇的嘉定、太倉、青浦、華亭、婁縣各境。（註七）有向來繁榮的宗族，亂後人口僅存五分之一者，如安徽績溪、八都胡氏一族本五千餘人，亂後僅存千二百餘人。（註八）

田畝拋荒的情形，如李鴻章克復常州情形摺奏『查常州爲護逆分地，脅從最多，荼毒最甚。臣沿途察看，百數十里內，村市平毀，農田全荒，白骨荆榛，絕無居人』。（註九）左宗棠瀝陳餉項支絀籌辦艱難情形摺奏所見浙江情形道：『頻年屢遭兵燹，小民死喪流亡，田荒屋燬』。（註一〇）富明阿奏皖北情形道：『臣去年督兵皖北，竊見蒙、潁、鳳、泗之間，曠土閒田，比比皆是』。（註一一）曾國藩喬松年奏安徽的情形道：『查安徽全省，賊擾殆徧，創鉅痛深，地方雖有已復之名，田畝多係不耕之土』。（註一二）這些拋荒田畝的數目雖然沒有統計，但據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彭玉麟的敬陳管見籌自強之計摺還以墾復亂後江、浙、安徽等省荒田爲自強大計之一，（註一三）則當日大亂初平時拋荒田畝數額的巨大可知。

這兩個大變動，給中國社會的繁榮以巨大的影響是不待說的。近代蘇州的衰落，人文學者認太平天國之亂的摧殘敗壞爲其原因中的一個，（註一四）便是最顯著的例子。至於就著者所知，如安徽、浙江等省當年最激烈的

地方，有些村落至今還不曾恢復亂前人口的盛況，有些村落在大亂時被摧燬的田地廬舍，至今還是滿目荒榛，七十多年來還不曾恢復元氣。這是中國近世史上第一場大遭劫！但是，我們從另一方面看起來，這兩個大變動，卻使亂後的社會民生得到一時昭蘇的景象。因爲這時候，人口死亡差不多到了一半，各處亂後蕭條殘破，人口稀少，克復地方都在舉辦招集流亡復興地方的善後事務，孑遺歸來，既沒有生活上的競爭，又得到地方官吏多少的補助，故謀生自易。同時，廣大的拋荒田畝又正需要人工去開墾，社會上祇患有荒田而無人去開墾，而不會有人力而無田可耕的事。這正和大亂前人與地隘無地可耕的情形兩樣。社會上的人，既都有業可營，有地可耕，有工可做，社會民生狀況便得到好轉，大亂餘生，又重見昇平。同光時人胡傳上皖南道袁爽秋觀察書記他的身經目睹的情形道：

> 傳生長草野，身經大難，復睹平世，親見同治五六年間，自徽州以達寧太數百里之內，孑遺之家，倉有粟，廚有肉，甕有酒，各醉飽以樂昇平，幾於道不拾遺，戶不夜閉。(註一五)

大亂之後，民間卻換來這樣的一個昇平的世界。於此，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中國歷史上自秦漢以來『治久必亂，亂久必治』的公式，在太平天国事件的表現上，還無二致。我們史家所豔稱的同治中興時代，便是這麼一回事！

除了上述兩個大變動外，如上海附近人民在大亂中向上海租界逃難，造成了後來租界華洋雜處的制度。如江蘇鎮江一帶的居民，給太平軍驅逐了，或屠殺了，衙門及土地册籍被焚燬了，所以這一帶地方，自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以後，便沒有大地主，那些佔有土地者都是握有田主的文契而又多年耕種過土地的人。(註一六)又如

著者所知廣西省潯州府貴縣林羅兩姓的情形，在大亂前，兩姓典當業徧全縣墟鎮，大亂後，兩姓當鋪都被夷爲平地，無法恢復，卽到今天，那些新興的典當業者還遠趕不上當年兩姓的盛況。這些變動，或者引起一個新制度的起源，或者對一部分地方的地主或富豪的財富起了變遷，自然這都不過是一地一隅的變革，但其影響所及，對於社會民生卻都不免有所波動。這也是我們應該注意到的。

(註一)內有江蘇、福建等處未經册報，未算在內，據咸豐朝東華續錄卷六。

(註二)內有江蘇、湖南、湖北未經册報，未算在內，據咸豐朝東華續錄卷十二。

(註三)內有江蘇、湖北、湖南未經册報，未算在內，據咸豐朝東華續錄卷十八。

(註四)內有直隸、江蘇、安徽、浙江、福建、陝西、甘肅、廣西、雲南、貴州、巴里坤、烏魯木齊未經册報，未算在內，據同治朝東華續錄卷五十五。

(註五)據左宗棠陳明進駐省垣設局賑撫籌辦情形片，左文襄公奏疏初編卷十四。

(註六)據何桂清奏，見勦平粵匪方略卷一百八十六。

(註七)據李鴻章籌賑收復地方並酌請蠲免漕糧片，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

(註八)據胡傳重建宗祠記，見鐵花文集胡氏家藏未刊本。

(註九 見勦平粵匪方略卷三百七十一。

(註一〇)見左文襄公奏疏初編卷二。

(註一一)見勦平粵匪方略卷三百七十八。

(註一二)見勦平粵匪方略卷四百一。

(註一三 見彭剛直公奏稿卷二。

(註一四)請參看潘光旦先生的近代蘇州的人才一文的結語，見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第一卷第一期。

(註一五)見胡傳鐵花官牘。

(註一六)見李一塵先生太平天国革命運動史引一八八八年英國亞洲通訊社中國分部指導員哲米遜(Dgimison)在中國各省調查農村關係的江蘇省通訊中的報告。

五　文化運動及革命運動方面

太平天国革命對於後來的文化運動及革命運動的影響，是一件昭彰的事實，不用我們再加闡說的。在這裏，我們只把這種昭彰的事實舉幾件出來說說，以明其影響的深遠。

在文化運動方面如提倡一夫一婦的制度，禁絕娼妓，(註一)強迫放足，(註二)女人有參政的權利，(註三)是對婦女方面的解放。如厲行新生活，嚴禁吸鴉片、吃黃煙、飲酒、賭博等等惡習，(註四)是對舊習慣的改革。如施行太平新曆，(註五)剷除宜忌吉凶的迷信，提倡通俗文字，主張删浮文而用質言，去古典而貴明曉，標出「文以紀實，言貴從心」的文學革命的理論，(註六)是對風俗的思想的革命。這種種的改革，都給後來的辛亥革命時代，以至五四運動時代的文化運動，以深重的影響。

在革命運動方面，太平天国革命已開民主主義的先河，樹民族革命的先聲，後來辛亥革命就是承接這次革命運動的淵源而來的。至於這次革命時代所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在其集團中所實行的共有共享各盡所

能各取所需的制度，就著者在第六章中的考證，實符合孫中山先生所說：「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還沒有完全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過了。洪秀全所行的經濟制度，是共產的事實不是言論」。（註七）這個地上天國，這個理想世界，到今天還是一些人們所追求的鵠的。

總之，太平天国雖然過去了，雖然在七十年前便如急浪驟潮般的消逝了，但是，太平天国所留的影響卻永遠磨滅不了。它的革命的目的，它的典章制度，有的後來的革命者已經給它實現了，有的餘波所及至今還有人在憧憬着，追求着，以至於渺茫的將來！

（註一）據天朝田畝提督軍務韋石會銜諭告，見賊情彙纂卷七，賊文告。

（註二）據賊情彙纂卷三，僞女官。

（註三）太平天国有女官及女軍之設，女子有參政及從軍的權利，其制度具見賊情彙纂卷三僞官制僞女官及卷十一賊數女官女軍數兩條

（註四）據賊情彙纂卷八，賊文告僞律。

（註五）太平新曆爲洪秀全所創制的一種新曆法。其造新曆法的目的爲要剷除陰曆中所列的吉凶宜忌的迷信，而主張「年、月、日、時皆是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時時亦總是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揀擇」的新說法。其曆法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立春、清明、芒種、立秋、寒露、大雪等六氣節，定爲十六日餘俱十五日。恰與陽曆的閏年相當，但每四年則不得不有三日之差，後亦覺此曆不合用，至太平九年十月由干王洪仁玕等奏請，改爲四十年一斡旋，斡年每月二十八日，則四十年中三十日之差，可以由以補足，如是周而復始。至於此曆法實行情形，據太平文書以及私乘所載，確曾推行及於民間。惟原刻時憲全書，今日已不

可復見，所存者僅癸好（即癸丑）三年的影印殘篇（見太平天国史料八種，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及甲寅四年諸王請頒新曆之奏（見賊情彙纂卷六僞時憲書）與己未九年天王的詔旨兩件（見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種）而已。故太平曆日子與陰曆陽曆的對照，已不可確考，而清官書所載私乘所記又復參差不齊，本書紀時不用太平曆而用陰曆者，實由此故。

（註六）據干王洪幼贊王蒙忠誠貳天將李會衡誼諭合朝內外官員書士人等，見太平天国詔諭。

（註七）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